向着光·岭南情

文 / 杨克

聚·民族之光

我们相信，美好值得全力以赴
每一次奔赴，终将追寻光的方向

微光成炬，一次次出发，一次次飞翔
一代又一代海外侨胞，乘风破浪而来
向着光、迎着光、追着光
铸成了侨胞生命向上的底气

聚民族之光，是山河的辉煌
是千百年的传承，是智能时代的希望
那一片片金黄的稻田，一座座雄伟的高楼
是我们走过的岁月，是我们的荣耀与骄傲

岭南的天空，闪耀着侨胞梦中的彩虹
那温暖的阳光，照在每个寻梦人身上
艇上的小贩，叫卖最纯的味道
白云山顶，是广东人的情怀和太阳

海外的侨胞，千里迢迢归来
广州的街头，永远为你留一盏灯

南洋，欧风美雨，唐人街
海外华侨华人，洋装穿在身
中国文脉一直在血液中
循环流淌，在心中成为火光

我在那渔船上，闻到了海的咸味
那是华侨的泪，和海水交融的记忆

向着光，岭南的花开
每一个心跳，都是对家的思念

光芒之中，越洋归来
跨越星汉，逐晨曦微露
璀璨的彩霞拂面，带着故乡的气息
归心似箭，追逐那久违的馨香

追·时代之光

海的那边，是神州的烟雨
风火轮载着我，越过时空
穿梭在珠江的波纹，回到了鱼米之乡
那热腾腾的煲汤，那韵味独特的早茶
仿佛在嘴角，召唤着游子的心跳

广州的旧街新区，夜色微凉
我看到灯火里，旧日的模样
街角的茶楼，点两件一盅
饮一口单枞，瞬间回到了从前的岭南

杨克，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中国诗歌学会会长。

我在一朵木棉上，看到花城的鲜艳
我在一颗荔枝中，嚼出南粤的甘甜
汗珠滑落，竹帘摇曳，凉风微扬
那是广州，那是家的方向

飘过的炊烟，是妈妈熬制的毋米粥
每一只虾饺，都是对家的味道
海鲜，是归心最深的慰藉

街头的河粉，巷尾的凉茶
是寻根问祖，是寻味思乡
东莞的沉香，深圳的灯火
在这片热土，我感受到初心的温暖

凤凰花开，象征着灿烂的艳阳天
桥下的渔歌，那最真实的声音
告诉我，这里是我的根，我生命的源泉

光芒之上，接过南风的长鞭
骑上科技的快马，追时代之光
在这充满机遇的今天，我们不再徘徊
智能的翅膀，带我们飞向新的天台

在岭南的风下，听榕树轻语
那是岭南母亲的摇篮歌
我们手牵手，步履不停
不畏前路的艰难，不怕风雨的袭击
因为我们有梦，有信仰，有希望
只要心中有光，就能照亮这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沐·文明之光

深夜的星河中，一点曙光初晨
如蝴蝶之翼，翩翩而起，指引彼方
那是民族的灵魂，凝聚成晶莹之泪
如同玉石经过岁月，研磨成珍

沐浴文明的阳光，我们读懂了岁月
那每一页的故事，都是走过的路
那束光，不是简单的照明
在这广袤的宇宙，我们追寻华夏之光
它照亮前行，也点亮了每一个心房

铁流化为金花，汗水浇成盛景
小蛮腰的灯火，点亮了大湾区的光芒
在开发区的边缘，繁荣的轮廓逐渐清晰
华侨的奉献，连通四海的金色桥梁

带来海外的风潮
融入这片古老的土地
伴随改革开放，东莞、佛山闪亮起来
靠着海的港口，未来的梦，犹如潮水般汹涌

四十年，短暂又漫长，
广东，这片沃土，因为华侨倍加丰饶
感谢那片熟悉的海，连接了过去与未来
每一片模版，每一座厂房，背后都有一个故事
跋涉万里，带来的技术和商机
广东的沙土，因此而闪耀金光

在这盛大的交响曲中
我们是那唯一的旋律，是那无尽的激情
奔向那热烈的光
因为那光，是生命的歌，是爱的永恒

那桥，如同历史的纽带，连接着时空
城市的霓虹，与古寺的灯火交相辉映
岭南的烟雨，如画中的水墨
轻轻洒在每一块青石板，让过去与现在亲吻
海上丝绸之路，侨胞的身影越来越高大
迎着光，带着光，成为光

目录

2023 年 12 月 | 总 234 期

《华夏》编委会

名誉主任　李　丰

主任　戴文威

副主任　邵　慧　刘迪生

编委　柯广宁　钟敏仪

总编辑　刘迪生

副总编辑　钟敏仪

总编辑助理　赵阳欢

社址　广州市天河区体育东路 140—148 号省侨联大厦 6 楼 602 室

邮编　510620

电话　020-38879808

邮箱　gdqlhx@163.com

国内统一刊号　CN44-1171/D

国际标准刊号　ISSN1003-7373

广告经营许可证　440000100021

发行范围　国内外公开发行

印刷装帧　东莞市比比印刷有限公司

定价　¥30　HK$40　NT$128　$20

侨歌晓唱

1　向着光 • 岭南情 / 杨克

侨海时政

93　广东侨联纪事 / 粤乔宣

时代风流

101　陈燕铭：长路漫漫，“医”心向糖 / 赵阳欢

107　黄建华：字里人生，编舟渡海 / 钟敏仪

侨史钩玄

113　侨批档案：抱诚为本传万里邮　守信立业牵游子情 / 刘雅琦　蔡燕婷

117　潮人过番 / 谢秋强

侨路拾贝

121　寻找归侨之歌创作者 / 钟敏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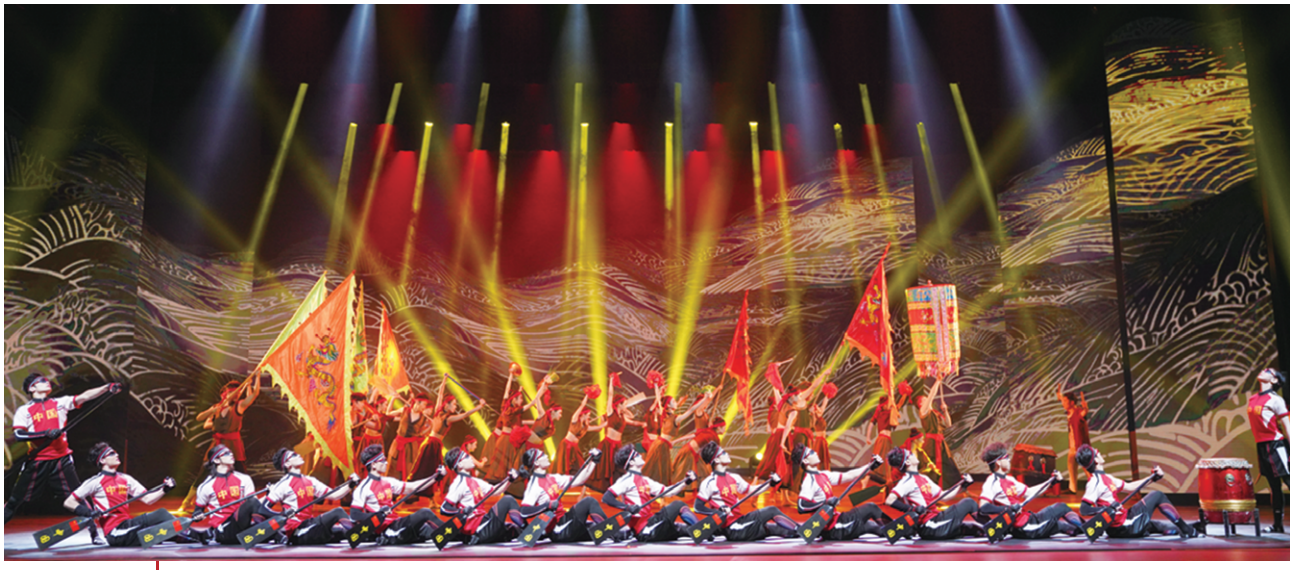
书香万里

128　美真兼得“煮清香” / 彭俐

131　旅美作家冰凌小说《同屋男女》论述 / 顾偕

名家专栏

134　异乡人 / 郑植楠



P7 独家策划

人文湾区

2023 年 11 月 13 日至 15 日，“亲情中华 · 风韵南粤”第九届（广州）华人文化艺术节隆重举行，200 名海外侨胞归来，和国内侨界群众齐聚一堂，共享文化盛会。

14 归来，华人文化艺术节 / 祝顺祥

21 近代广东何以能“异军突起”
——从广东精神谈起 / 刘斯奋

25 晚近大湾区文学观察 / 郭小东

37 一座华侨文学的丰碑 / 张文峰

40 文化名人刘斯奋 / 谢岳雄

44 林贤治：笔落惊风雨　墨舞文坛事
/ 陈锡忠

48 文学广州的无边风月
——读张欣新作《如风似璧》
/ 陈思和

51 一叶轻舟探烟霞
——《烟霞里》读札 / 黎燕雄

57 生活或者战斗
——关于世宾和他的诗歌 / 游子衿

62 从长篇历史小说《赵佗归汉》看张况的历史题材创作 / 苟文彬

68 荧屏凤凰侯玉婷 / 牛涛

72 流淌在血液中的律动
——陈菊芬的客家山歌情
/ 谈天凌　赵梓茵　张晓新

76 寻找现代舞精神
——刘琦印象 / 白岚　陈锐军

81 “筝”情天地间 / 黄祖悦

84 珠江潮汐美 / 陈东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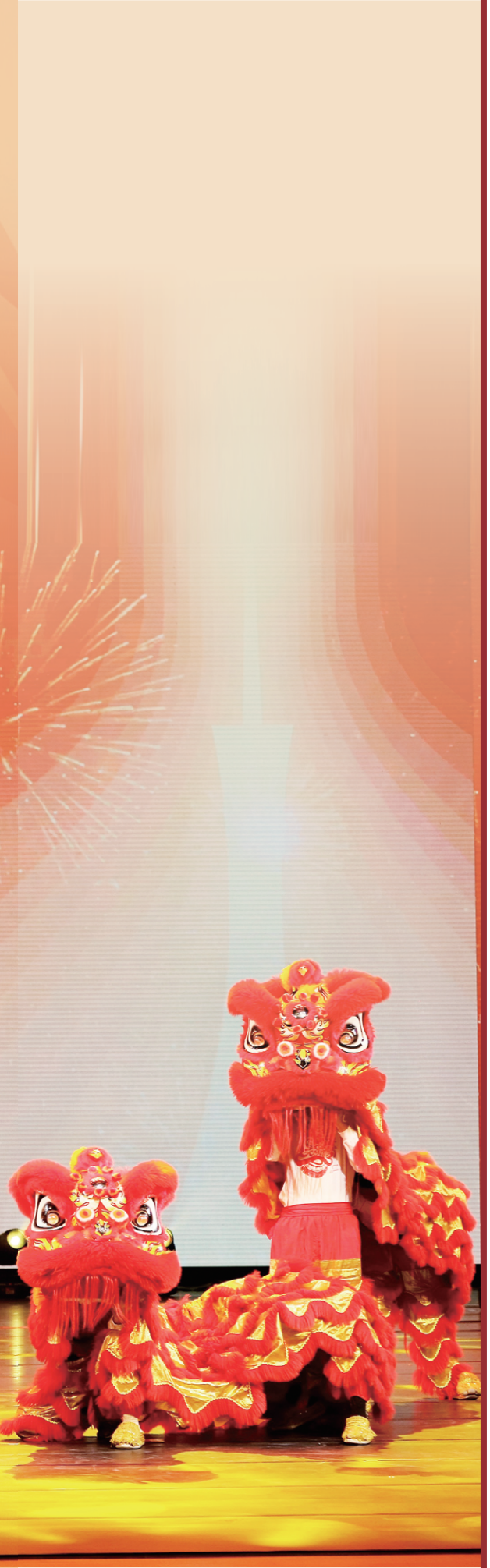
90 广府饮茶文化与生活方式解读 / 王焱　房家妍

亲情中华·风韵南粤
第九届(广州)华人文化艺术节
The 9th
Chinese Culture & Art Festival
Guangzhou China

人文湾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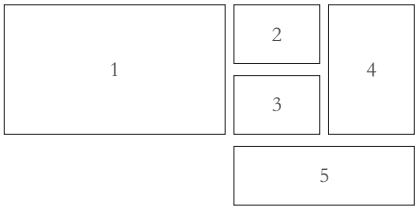
策划 / 《华夏》编辑部

“你我流着相同的血，今日相逢在故乡”——时隔三年，由广东省归国华侨联合会与广州市归国华侨联合会共同主办的“亲情中华·风韵南粤”第九届（广州）华人文化艺术节在广州举行，这是新冠肺炎疫情之后国内规模最大的侨界文化艺术活动。活动期间，近千名海外侨领、侨界艺术家和归侨侨眷代表参加活动，其中来自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200 位侨领代表专程回到中国、回到广东。耳熟能详的粤曲，氤氲弥漫的茶香，色彩鲜明的广绣等系列富有岭南特色的传统文化，共同唤起了海内外华侨脑海中最动人的回忆。本期独家策划推介了一批有风骨的文化名人和有温度的大湾区文艺作品，让广东人文精神的光芒照亮我们的未来。



2023 年 11 月 13 日，中国侨联副主席、广东省侨联党组书记、主席李丰（左三），广州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王世彤（右三），中华海外联谊会副会长梁冠军（左二），中国侨联副主席、澳门归侨总会永远会长刘艺良（右二），中国侨联顾问、广东省侨联原主席黎静（左一），广州市侨联党组书记、主席卞勇（右一）出席亲情中华·风韵南粤”第九届（广州）华人文化艺术节开幕式

第九届（广州）华人文化艺术节图片由广州市侨联提供



1. 广州歌舞剧院岭南舞蹈《明月·湾》
2. 海外侨领步入会场观看“向着光”主题文艺展演
3. 海外侨领在文化体验活动现场作画
4. 海外侨领体验汉服之美
5. 百年侨校暨南大学华侨学生、港澳学生以“一同走过”国粤语金曲串烧重温流金岁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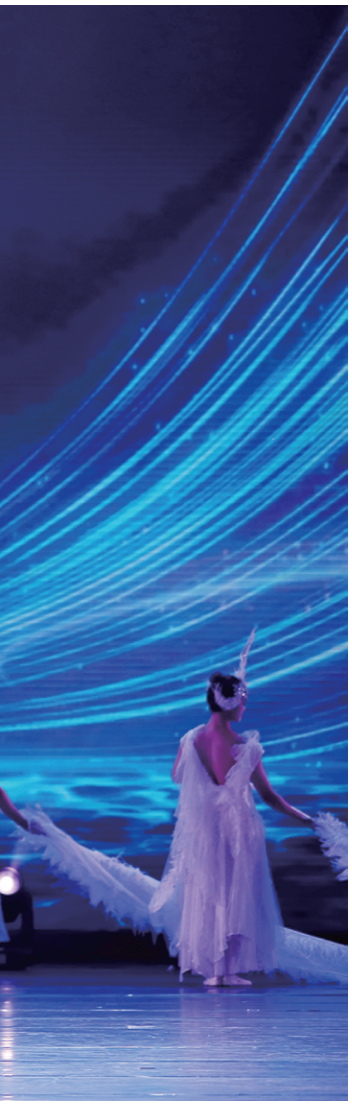
亲情中华·风韵南粤
第九届(广州)华人文化艺术节
The 9th

亲情中华·风韵南粤
第九届(广州)华人文化艺术节
The 9th
Chinese Culture & Art Festival
Guangzhou China

1. 享有国际声誉的华人演奏家中山智先生专程回国，以一曲小提琴独奏《梁祝》拉开文艺展演帷幕
2. 参加活动的海外侨领现场拍照打卡
3. 国潮街舞《咏春》融合国家级非遗与新时代的精气神

1	2
	3
	4

1. 来自广州杂技艺术剧院的“肩上芭蕾传承人”李梦楠、龙云侠，主演杂技剧《飞翔》，节目将西方古典芭蕾和中国传统杂技完美结合
2. 海外侨领参观永庆坊
3. 粤剧名家倪惠英携手儿子黄智毅带来原创粤语歌曲《花田不见君》
4. 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崔峥嵘联合全场华侨华人大合唱《我爱你，中国》



永鹿坊
“亲情中华·风韵南粤”第九届(广州)华人文化艺术节故乡行

归来，华人文化艺术节

文 / 祝顺祥（广东省侨联文化部）

2023 年 11 月 13 日至 15 日，“亲情中华 • 风韵南粤”第九届（广州）华人文化艺术节隆重举行，200 名海外侨胞归来，和国内侨界群众齐聚一堂，共享文化盛会。

2005 年，广东省侨联与广州市侨联联合举办首届（广州）华人文化艺术节，此后每两年举办一次。自 2007 年起，我开始参与每一届华人文化艺术节的筹备活动，从活动策划、工作协调，到起草各类文稿等，事无巨细。2021 年，华人文化艺术节组委会（以下简称组委会）启动了第九届（广州）华人文化艺术节筹备工作，却因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要求推迟举办。2023 年初，疫情逐渐平缓下来，第九届（广州）华人文化艺术节再度启动。

选址文化馆

与历届文化艺术节不同，这次文化艺术节在多个场景展现。首先，组委会将文化艺术节的文艺展演选在广州市文化馆新馆举行。广州市文化馆新馆与其说是一座现代化文化馆，还不如说是一座绝美的岭南园林。

广州市文化馆新馆的设计独具匠心，由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倪阳操刀，巧妙地融入了岭南典型的“山、水、田、塘”等风景元素。整个建筑群落不仅展现了广州深厚的历史韵味和岭南水乡园林的经典景观，还充分体现了广府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魅力。新馆的景观设计别具一格，以四季景观为背景，同时结合岭南园林布局特色，打造出一处广府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园林建筑与自然风景完美融合的经典景观。这里有五组主题仿古建筑庭院群落，包括公共文化中心、曲艺园、广府园、翰墨园和广绣园，让大家在欣赏美景的同时，领略到广州城市中轴线南端独特的文化魅力。馆内庭院深深，可以游赏曲径通幽的山庭水湾，体验文脉传承的工艺沙龙，感受绿色自然的生态文化正能量，领略岭南传统文化的韵味。

据介绍，广府园的园林设计借鉴了岭南四大名园的特点，南侧水庭中央的画舫借鉴了东莞可园的平亭造型，东侧水池景观借鉴了顺德清晖园的荷花池特色。庭院以湖、岛、船舫、六角亭、临水阁、观鱼亭、望月楼等园林元素构成富有层次特色的广府庭院空间，并与外部一湾水形成“园外有园”的景观相融，道路曲折环绕，宛如迷宫。

11 月 6 日，第九届（广州）华人文化艺术节媒体见面会在广府园召开。作为疫情后国内规模最大的侨界文化艺术活动，将由一场主题文艺演出、一场故事分享会、两场互动式文化体验交流组成，以侨界文化盛筵会五湖四海八方好友，同叙血脉情谊。

全国侨界十杰、中国工程院院士何镜堂为华人文化艺术节致贺信：“我们要热烈欢迎各位侨胞朋友回到侨乡广州，大家一齐听乡音、看粤剧、品粤菜、耍舞狮。让我们以侨为桥，一起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点亮广州塔

组委会对本届文化艺术节从内容和形式上进行全面创新。“广州塔亮灯”让文化艺术节以更加炫丽的形式向公众呈现侨界这一文化盛事。

11 月 12 日晚，广州塔熠熠生辉，为华人文化艺术节点亮了夜空。与此同时，二沙岛上空的大型主题无人机表演与广州塔亮灯交相辉映，呈现出一幅壮丽的画卷。无人机编队在空中飞舞，拼出“华人文化艺术节”“海外赤子心”“根魂梦”等主题文字，并勾勒出“大雁归来”“红头船”以及“白云山珠江水”等生动画面，分别寓意着游子归乡、华侨精神和深深的家乡情，让市民感受到华侨文化氛围，让海外侨胞感受到根的情怀。

广州为华人文化艺术节亮灯，为华侨华人亮灯。组委会通过视频直播与全世界的华侨华人分享这一璀璨时刻。参加活动的侨胞代表留言说：“在海外，祖国就是

无人机编队在花城广场空中拼出“根魂梦”“海外赤子心”“红头船”等生动画面，与广州塔交相辉映

在“归来吧”——侨见岭南文化体验活动上，广绣技艺非遗传承人唐晓玲展示广绣技法

一座永远照亮心间的灯塔。”

侨见岭南

11 月 13 日下午，在广州白云宾馆举行的“归来吧”——侨见岭南中华传统文化体验活动，正式拉开了本届文化艺术节的序幕。活动现场，侨胞们沉浸在一杯清茶与一曲琴音所营造的宁静氛围中。活动以“古韵悠扬满芬芳”“妙手生花绣年华”“丹青点点洒真情”为主题，让与会侨胞沉浸式地感受岭南文化，领略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在岭南古琴的悠扬旋律中，侨胞们纷纷驻足欣赏由侨界艺术家、著名生活美学家顾玉华带来的花艺展示，感受宋代点茶的高雅神韵。

尼日利亚粤港澳同乡会会长郑志坚在体验了茶艺、书法等文化项目后表示：“此次文化艺术节的形式非常特别，让来宾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体验到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他表示会将在这里体验到的中华传统文化带回非洲，与当地友人共同分享。

在合影区，组委会特别布置了一面礼物展示墙，邀请海外侨领带一份具有住在国特色或有故事价值的物品，向大家展示。阿联酋广东商会暨同乡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元永佳带来了一幅曾获得阿拉伯

金奖的书法作品《中阿友谊长存》。元永佳是一名书法爱好者，在迪拜一直致力于推广中国书法的公益事业，希望通过文化交流增进两国人民感情。

活动现场诞生了两份特别的“赠礼”，一份是以木棉花为表现对象的广绣作品；另一份则是海外侨胞与广州书法家协会副主席陈立华共同书写的《亲情中华·风韵南粤》书法作品。这两份礼物不仅凝聚了海外侨胞对中华文化的热爱和敬意，也象征着他们与祖国的深厚情谊和紧密联系。

组委会策划了“朋友圈中的艺术节”，通过花道、竹艺等元素营造具有中华国风雅韵的场景，将体验项目以更具当代感的方式演绎阐释。这一环节充分激发了侨胞们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热爱和自豪感，他们纷纷打卡体验、拍照留念，并主动将照片分享给朋友圈。

与会嘉宾穿着汉服在宋代点茶体验区体验中国茶文化

当晚的“家宴”更是让远道而来海外侨胞感受到了“归家”的亲切和温暖。组委会用清甜的家乡水、正宗的家乡菜、熟悉的家乡话为侨胞们营造了一个温馨而亲切的氛围。许多侨胞感慨道：“时隔三年，终于跨越山海与祖国相约在家乡相聚真好！”

向着光

11 月 14 日上午，第九届（广州）华人文化艺术节“向着光”文艺展演在广州市文化馆新馆举行。广州书法家协会主席李鹏程特意挥毫题写“向着光”主题书法作品；中国诗歌学会会长杨克倾情创作同题诗歌《向着光》，诗意阐释了华侨华人与祖国同心同行的感人情怀；朗诵家王虹带领广州市华侨外国语学校的学子演绎了这首诗歌。整场活动分为“聚·民族之光”“追·时代之光”“沐·文明之光”三个篇章，以岭南特色舞剧《龙·舟》打头，通过粤港澳大湾区龙舟青年的精彩演绎，寓意广大华侨华人与祖（籍）国同舟共济、奋勇向前。

文艺展演在华人演奏家中山智的小提琴独奏《梁祝》中拉开序幕。旅英歌剧女高音歌唱家王蓓蓓独唱歌曲《故乡》，抒发海外华侨华人对故乡的情愫。国潮街舞

著名朗诵家王虹和广州市华侨外国语学校学生倾情演绎主题诗歌朗诵《向着光》

《咏春》传递了中外文化的融合和辉映之美。从《上海滩》《万水千山总是情》到《朋友》《故乡的云》，由暨南大学学生艺术团演绎的“一同走过”金曲串烧，以耳熟能详的曲目唤起海内外乡亲记忆深处的动人旋律。广州歌舞剧院带来的歌舞《明月·湾》传递出游子追光辉、湾月照我还的情感共鸣。由粤剧名家倪惠英携手儿子黄智毅带来粤剧新编《花田不见君》，通过传统粤剧唱腔与流行音乐的跨界融合，展示出岭南文化守正创新、活力传承的昂扬风貌。来自广州杂技艺术剧院的李梦楠、龙云侠带来杂技剧《飞翔》，把西方古典芭蕾和中国传统杂技完美结合，赢得阵阵掌声。最后，由歌唱家崔峥嵘领唱，现场近千人深情合唱的《我爱你，中国》，将场演出推向高潮，凝聚了奋进的力量。

体验文化科技

11 月 14 日下午，为了让海外侨胞真切感受新时代粤港澳大湾区的“心”与“新”，并将这些美好印象带至住在国，组委会特别设置了“文化”和“科技”两条参观体验路线。

广州华侨博物馆是全国首家利用百年老建筑建设的华侨专题博物馆，长堤华侨

历史文化街区是华侨实业救国、参与广州近代商业发展的“实践地”，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永庆坊则是广州致力实现“老城市新活力”的最佳样本。参加体验的侨胞们在广州的“侨”文化地标深刻感受到华侨华人与广州不可分割的深厚情谊。法国番禺富善社社长方显秋表示：“今天我们了解到了广州华侨的光辉事迹，我们更加感到一定要讲好中国故事，让海内外侨胞和海外朋友们了解真实的中国，以侨为桥，推动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交流。”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魂，而日新月异的科技实力则彰显出中华民族正走在伟大复兴的光辉大道上。科技创新考察团参观了广州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试验区与广汽研究院。侨胞们亲身感受到广州推动制造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打造自主品牌的杰出成就。他们深切地感受到广州作为大湾区核心引擎的实力和影响力。

我和祖国有个约会

11 月 15 日，“我和祖国有个约会”华侨华人故事分享会在白云宾馆举行。活动中，多位侨领分享了传承中华文化、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故事。

2023 年 8 月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南非约翰内斯堡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五次会晤，并对南非进行国事访问。旅南华侨华人高举“中南友谊万岁”等横幅，自发在沿途街道等候。南非广州商贸文化交流协会会长陈玉玲作为当中的一员，分享了这段经历：“中国繁荣富强，我们海外华人华侨是直接的受益者。中国和南非的友好交往，更是给南非的侨胞带来了新的机遇。”陈玉玲时隔三年首次返穗，她表示，将继续积极发挥海外侨团在经贸合作、融通中外的桥梁纽带作用，向世界展示家乡新貌和中国新颜。

古巴华侨陈秀莲是拉丁美洲音乐学院的亚洲代表，一直致力于将中华文化和古巴文化相融合，寻求音乐艺术突破，同时，借助音乐这一共通的艺术形式，增进中巴两国人民友谊。她分享道：“2020 年，在全国上下同心抗疫的时候，我们华侨虽然身在海外，但心系祖国。我和华裔歌手泰拉共同创作了歌曲《不倒的巨人》支持中国抗疫。”这首歌曲以古巴手打节奏和纯人声说唱方式呈现，通过歌词“没有任何事可以难倒这个巨人，现在更是不可能，因为他们比以往更加团结”“我们

海外侨领参观广州华侨博物馆

侨胞代表陈玉玲、康永华、陈秀莲分享与祖国的“约会”故事（钟敏仪 / 摄）

拉丁美洲和中国在一起”等激昂的表白传递了宝贵的友谊和信心。古巴华裔泰拉也前来参加了这次活动，并带来独唱《月亮代表我的心》。她和泰拉等人正着手将古巴神话故事和中国传统故事相融合，并尝试结合中国传统音乐和古巴传统音乐及现代电音，继续探索中巴音乐文化融合传播的更多形式。

广州海归才智合唱团带来了歌曲《故乡的云》《绒花》表演。该团由从乌克兰回国的海归博士魏俊和妻子维多利亚牵头成立。魏俊表示，他们汇集了一群爱好合唱艺术的广州各界海归和友人们，希望这些从不同地方归国的朋友携起手来，为中外人文交流搭建一座桥梁，尽所能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加拿大蒙特利尔华商会主席张仕根也为活动带来了二胡表演。

从“百人家宴”到中华传统文化体验、文化科技创新体验，从“向着光”文艺展演到“我和祖国有个约会”华侨华人故事分享会，文化艺术节以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激发侨胞“爱国爱乡爱自己的家人”赤子情怀，以多元深入的文化交流互鉴促进民心相融相通，携手海内外侨胞讲好中国故事、粤港澳大湾区故事、广东故事。

这场华人文化艺术节不仅是一场文化的盛宴，更是一次心灵的归途。

近代广东何以能“异军突起”
——从广东精神谈起

文 / 刘斯奋（广东省原文联主席，茅盾文学奖得主）

地处五岭之南的广东，虽然早自秦朝一统天下的年代起，就已经成为中国一个以“南海”命名的郡。但是，由于远离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并且隔着颇难逾越的崇山峻岭之故，在其后很长的岁月里，却一直被视为蛮荒之地。事实也是如此，在整个农耕文明时代，尽管广东也在不断发展，但一直到清代初期，广东不要说无法与中原、江南这些发达的地区相比，甚至也远落后于邻近的湖南和江西。这一点，只要看一看从宋代到明代，光是江西，就曾涌现出王安石、欧阳修、黄庭坚、朱熹、杨万里、宋应星、汤显祖等一大批著名人物，便不难窥见其背后的经济文化发展状况。

的确，在中国的古代，广东是一块相对后进的地区。然而，当世界进入十九世纪中叶，情况却发生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变化。广东由于拥有广州这个当时惟一的对外通商口岸，首先受到工业文明风潮和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双重鼓荡和夹击，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乃至民众的日常生活，都开始发生裂变。尽管这种变化在其初始阶段，并不完全是自觉和主动的，但无可否认，却具有开启中国近代史的意义。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由此萌生的各种新鲜事物、发生的各种前所未闻的事件，包括其先知先觉人物的一系列思想、言论和行动，便以各种方式和渠道不断向内地传播辐射，在全国引起强烈的关注和影响。同样以人物为例，这一时期的广东，破天荒地出现了洪秀全、容闳、郑观应、黄遵宪、邓世昌、康有为、詹天佑、梁启超、孙中山等等具有全国影响的人物。这些人物的成批涌现，无疑同样是广东社会发展的一个集中反映。它显示着广东从此由农业文明时代的后发地区，一跃而成为中国工业文明的出发点，开始在启蒙和实践两个方面，发挥着引领时代潮流的作用。这确实是一次异军突起，而且是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异军突起。因为在中国以往的历史上，尽管也不止一次发生过异军突起的情形，包括江南地区取代中原成为全国经济、文化乃至政治中心那样重大的变迁，但都无一不是发生于农耕文明的范畴之内；而出现在广东的这一次，却体现了中国从传统的农耕文明向新兴的工业文明突破的历史要求，是文明的一次质的飞跃，无论是思想观念、生产方式还是社会治理方法等等方面都面临根本性改造，就其深刻程度而言，是以往那些变迁所不能比拟的。那

么，这样一种历史使命，为何会首先落到广东这片土地上，使之在近代史上扮演异军突起的角色？要回答这个问题，无疑可以也必须从多个方面进行探究，而其中绕不开的一点，则是它与广东精神的一种内在联系。

说到精神，无疑是一切社会变革的首要条件。它产生于一定的经济发展土壤，又反过来推动和引领社会的变革。广东地处五岭以南，这个地区的文化大致说来，是由三个源头“杂交”形成。首先是当地百越族人创造的以蛇图腾、断发纹身习俗和干栏式巢居建筑等为特征的原生态文化；其次是纳入全国大一统版图之后的两千多年间，通过历代的驻兵和移民，源源不绝地输入的中原先进文化；三是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发源地，来自西洋、南洋，甚至非洲、美洲等地的异域文化。当然，三个源头中，中原文化长期以来作为一种先进的高位文化，其渗透力和同化力之强自不待言；而最终成为主流，也是理所当然的事。不过尽管如此，作为一种居于南海之滨，并由几个源头杂交融合而成的文化，广东在中国文化的大格局中是颇为独特的，为内陆单一型文化所少有。其内涵可以说更为多样，个性更为独特，生命力更加顽强，适应性也更加广泛。也正因如此，当西方文明的强力进入时，与中国的其他地区往往是深闭固拒相比，广东人却有着不同的态度。而正是这种态度，最终导致广东在中国近代化的道路上率先迈出了第一步。

那么广东人的精神表现在哪里呢？首先，较之中国其他地区，广东人的秉性可以说更加务实；做人做事，不盲目迷信条条框框；判断是非、决定取舍时特别注重实效，并且善于审时度势，权衡利弊，及时做出调整。当时中原人在交通十分落后的情况下，远涉千山万水，移民到岭南来，说到底就是为了谋生，为了寻找新的活路，这就决定了他们必须打破一成不变的旧有观念，放弃循规蹈矩的生存方式，想方设法适应新的环境，以图在激烈的生存竞争中站稳脚跟。另外，不断涌入的外来移民往往来自不同地域，再加上大量土著居民，观念和习俗的差异使彼此的关系变得格外复杂，也只有秉持不拘一格的心态，才能互相适应，相处共存。其次，广东精神里还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多元和包容的心态。这源于岭南文化是“杂交”生成的，本身就是多元的产物，因此导致它天然地具有包容性。而且这种包容性不是一种居高临下式的仁慈与恩赐，而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横向的平民意识。说来这与其移民历史也颇有关系。就当时来说，所谓移民，说到底，绝大多数都是出于各种原因不得不远走他乡的“落难者”，而对于土著居民来说，他们又是毫无根基的“外来者”，因此谁也不比谁更优越、更显贵一些，于是自然就得用一种较为平等谦和的态度来处理彼此的关系了。事实上，移民离乡别井到了岭南，原有的一切都不复存在，也不被承认，一切都得重头开始。你想站稳脚跟，就得自力更生。而由于远离政治权力中心，门阀等级的防范限制相对薄弱，只要有真本事，也就容易有出头之

日。在这种生存环境下，加上海外贸易的发展，民间的依附心理也随之淡化，相反催生出一种较普遍的平民意识和自立意识。至于岭南精神的第三个特点，就是不保守，愿意尝试和冒险。为了生存和发展，不惜经常变换生活的环境和方式。这可以说也是一种典型的移民心态——当年离开故土，就是因为不肯固守一隅，坐以待毙。因此为了活得更好，不断转换方式也是理所当然的事。如果岭南活得不顺心，他们就干脆跑到海外去。

强烈的务实、包容、和进取的精神。明白了这几大特点，那么回过头来看广东人在近代以来的表现，就不难发现，广东能在这个历史的大转折关头异军突起，并不是偶然的。事实上，思想观念方面，则是争取自由、民主、科学。而要实现这种变革，从当时中国的社会实际出发，最主要则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突破——改变对商业行为的鄙视，促使市场经济的发育；打破对科学技术的恐惧，促使落后的生产方式向先进的生产方式转化；冲破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的观念的束缚，提倡民主和自由，促使传统的宗法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此外，联系到中国当时的国际处境，还必须完成政治上反抗侵略，争取民族独立。

这是十分重要的课题。

从以上几大历史任务来看，可以说，在历经世事沧桑所积淀下来的广东精神里，已经较充分地蕴含着实现突破的原动力。例如对于发展商品经济，在内地还普遍实行重农抑商国策时，远处岭南的广东，商业氛围就一直在蓬勃滋长。特别是对外贸易，起码远自唐代起，就基本没有间断过。直到清代十三行之设，广州更成了全国惟一的对外通商口岸。这对民众心理的影响无疑是广泛和深远的。而重商精神，则是近代化的很重要的催生条件。又如在接纳先进的科学技术方面，当时清朝统治者推崇程朱理学，主张“存天理，灭人欲”，排斥所谓“奇技淫巧”，科学技术的发展长期得不到重视，极大地阻碍了生产力的提高和突破。而广东，作为南北中外杂处的移民地区，社会风气有着更强的务实性。当时的移民，之所以冒着千难万险到岭南来找活路，就是出于对现世生活的强烈、执著追求。对他们来说，最有吸引力的不是空洞的说教，而是能实实在在提高他们生活质量的方法。因此，他们对于一切有利于提高生产力的新科学新技术，有着一种天然的热情。这同样为近代社会的进入准备了心理条件。

至于近代化所要求的自由和民主，也与广东文化的平民精神有共通之处。广东自古没有传统意义的高门望族，等级观念远不如岭北内地浓厚。人们的精神气质，也是不卑不亢，不讲究出身，也不太重师承和来历，信奉平等精神。广东社会平民化、大众化的色彩极强，对于人也好，文化也好，天然的没有门槛，谁都很容易进来，进来以后凭自己的本事立足；好比一片阳光灿烂的沃土，最适合来自各方的种子普遍发芽，草木自由生长。广东人甚至对“参天大树”有一种天然的排斥心态，似乎担心它遮蔽了阳光，剥夺了众多草木

岭南印象园

的生长权利。这样一种深入骨髓的平民特质，同样为近代社会的生成提供了天然的土壤。

最后，还要说到反抗侵略，争取民族解放的课题。这在广东精神里同样有着深厚的传统。作为历代中原移民的最后退守地之一，广东精神中有一股公认的雄直之气。无论是宋末元初，还是明末清初，广东都是把反抗民族压迫坚持到最后的地方之一。而鸦片战争首先在广东打响，同样证明了这一点。

基于以上分析，也就毫不奇怪，在中国进入近代以后，广东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出现一种全方位的井喷现象。除了前面说到的那一大批具有全国影响的人物之外，还出现了《资政新篇》这样最早提出的完整资本主义建国方略；出现了四批留美幼童中，广东籍占百分之八十的盛况；出现了第一间采用先进机械生产的民营资本企业、第一批新式买办和现代公司，并提出“商战”的战略性思想；还涌现出第一批从事现代技术研究的科学家、第一批学习西洋技法的画家、第一家新闻报刊、第一所新式学校、第一个电影家、第一个摄影家等等。与此同时，广东还成为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国共合作的策源地，其中黄埔军校的创立，对现代历史的贡献更是直接而巨大。至此，广东确实无可争议地成为一支突起的“异军”。

也正是由于沿袭了这个传统，直到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实行新历史时期的改革开放以后，广东在经济发展方式和生活观念变革、制度创新等等方面才会继续发挥务实、求真、包容，以及敢闯敢试的创新精神，义无反顾，奋身先行，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做出同样是有目共睹的贡献。

晚近大湾区文学观察

文 / 郭小东（著名作家、文艺评论家、教授）

理性的就是真实的。南方人的生活，比之北方，如胡适所言，终日在棕榈树下白日做梦，这是高度抽象的一种南方存在。看起来荒诞，想起来深刻。人的这种精神状况，引至文学风格，迹近所谓的新南方文学书写。

胡适之前，是旧文明旧文化旧文学旧传统，之后是鲁迅的新文明新文化新文学新传统。略去其间短暂的冲突与转折，僭越至当下，如果南北方书写依然成立，则新南方之前，必然有旧南方。旧与旧的转折，由胡适鲁迅去代表，而新与新的发轫，姑且为大湾区来预设。

所谓新南方书写，是边界模糊且多源文化合流的预设，但目标清正明晰，意在守正创新。

新南方？简言之可谓大湾区视野。中心意思是：当下广东或岭南本土的历史变动，文学动向、现象及表现，包括文本，叙事话语以及创作方式等等。它们与湾区史前文化文学及当下，有怎样的关联？

我以为，最大的区别，就是平民史观的蕴蓄，强调平民的生活，也就是一以贯之的为人民服务的英雄史观。熊育群、魏微、吴君、陈崇正、葛亮、王威廉、郑钟海的近期作品，都不同程度地浸润这种思想。

大湾区文学的提出，不仅仅是单纯以地理优势为前导的区域视野，而是努力预设一种由此而生的平民的文化高地，从而实现一种跨界式，多元地域文化的使命感。使命是行动，它的践行有明确的经济目标，文学在这里，充当了文化翻侧与历史确认的文学书记官。

小说《平安批》，演绎的是大湾区史前文化的噬食与反哺的优越性，动辄百年为界。小说企图以宏大的事件，反证宵小的成功，这种小说叙事的圈套，还是传统的北方思维。因此《平安批》尤其强烈地获得青睐并得以封神，它的叙事来源于对革命的迷信——个人生活的任何方式，都必须通过重大事件的革命性，去证明意义的正确。它们以题材（侨批、食性）的反复翻拍，去实现这种迷信，并以不迷信的方式，实现迷信的教义。主人公的“侨批”历史，如果没有融入抗日战争这个重大事件，则将黯然失色，至于潮汕文化，侨批精神，因其描述的浅简，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事实是，平安批的逻辑，似乎还不足以揭示侨批的初萌，也不是侨批的本质价值。侨批的历史高度是契约和诚信，原本

郭小东

在银和信之上，报平安不是侨批的核心价值，把侨批降级到尺牍的平面，有点遗憾。侨批是与中国先秦的贵族精神、汉唐以来的江湖侠客、近代中国的钱庄镖局、西方十七世纪以降的社会契约，等等，一脉相承的精神产物……它在中国民间社会，是自证个体人性的心灵高贵，自救个体人生的坎坷命运，呈现社会缺失的个体贡献。侨批，在骨子里，就是人的自渡与自安，一种伟大的文明方式，岂止于平安两字。世人常以侨批的结果，来反证其过程，却往往忘记侨批的出发和它的目的。对于潮汕人来说，闯荡南洋，没有银，就不会有信，也就不言平安，而“批”是银和信的代词与使者。当然，这些并不影响《平安批》作为北方文学及好小说的封神依据。

小说《金墟》，努力讲述的是一种证明，证明作家重视的这段历史，在理性真实的过程中，曾经的走失与回归，开平因此成为南方向外突围的旗帜，寂寞的碉楼，正是个人在历史上落寞的象征，而湾区才是集体热闹的未来。

作者熊育群说：“我写的内容需要现实与历史结合，时间跨度一百多年，甚至延伸到了几百年，空间从东方到西方，两大家族牵涉的人物众多，还有家族之外的传奇人物、参与项目开发的镇政府与两家大公司……但我并不慌，我对自己的写作是有信心的，就跟万物生长一样，自有它生长的规律，我要做的便是随物赋形。”他激发了每一个情节细节的先验与超验，有一种不可定势的未来感。旅游和碉楼的斗争，游动与固守的冲突，都在理性的真实（存在即合理）中，予讨论以空间，递进为阔大。

小说主角一是民国建城的司徒文倡，一是现任镇长司徒誉，前者是后者的曾祖父。两者所处不同时空，小说中他们以偶数章与奇数章交替出现，彼此象征、印证、呼应与对话，在一种轮回中表现人类一些生存的真相，传承着一种精神，特别是时间让死亡呈现，命运也获得了清晰。

民国建城与现代开发，从性质上言，并无二致，而其目标，是平民的历史创造与民生的立场。主要人物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英雄，却是现代文明与价值观的体现者，这是熊育群把捉的历史重点。

魏微作品《烟霞里》，表达人心在文化预设中的萌动与艰困，人类最重要的成员——女性在人类文明之路上的自证与求索，是何等艰难。她的自觉一旦成立，则将以生命为代价，去谋略人性的自由。首先是语言的自由。语言即思想。

中国大多数当下作家，在语言上没有过关，缺失中国古典文言的素养，不能娴熟地运用现代汉语的古典元素，通识上古文字的简约、通假的深刻含义……学养的跛足，语言粗鄙和暴力的潜移默化，漠视中国语言的敬语与礼治的文化史造诣，都使这种不自由，浪荡在文学表达上。

魏微进入广东经年，她在艰困的累蓄中，终于悟觉并践行了她的所是。她写道："我青年时代的写作尤其忧伤，年少不经事儿，'为赋新词强说愁'是有的；并且太在意语言，推敲之下，小说就显得紧了。诗人杜绿绿读了《烟霞里》，也留心到了二三十年间我的语言变化，她打了个比方，说我从前的写作像少女，到了《烟霞里》，语言上成了悍妇。我深以为然。主要是自在了，爽朗了，偶尔还会爆粗口，这在以前的写作里是难以想象的。"

"语言的变化，说到底还是人在变化。人与文字的关系，最理想的状态是能做到形影不离，我没能做到，具体表现在，我一路前行，文字却跟不上，于是只好沉默。至于有些作家，几十年间叫人看不出他风格上的变化，我私下揣度，要么是他止步不前，要么是他没有语言。"

"如今回望《烟霞里》，我承认它有毛病，太多不尽如人意处，我痛苦得不能消受。但唯一庆幸的，是我打破了桎梏，从言说、汉字、语言里获得了自由，那是我写作几十年从未有过的自由，我被禁锢得太久了，因为爱，所以宁可当囚徒。《烟霞里》的写作，充分证明爱是禁锢，也是自由，有时忘了它，反而会漫山遍野，纷至沓来。"

把《烟霞里》看作文本创新之举，其叙述话语几乎颠覆了传统小说的叙述方式，志人志史，并把作者沉潜其中，既成为叙述人又是被叙述者，最大限度消没作者的立场，议论的对方，也包括了作者自己。

此篇因她而起，却不为她所写；通篇都是她，却无关她。这就是魏微的文学观，魏微倨傲地将自己划出其他，而终将有望经典。

吴君作品《同乐街》《万福》所证明的是，历史的人文躁动，只有通过现实的人性欲望，并以理性的真实，去实现人性的妥协与投降。即伊索寓言中，钓鱼人的自渡与自嗨！

吴君在寒凉的叙述里，几乎没有了加油的温度，却饱饱地涌动着吸附的煎迫，向灰暗焦虑的心情，拂去一丝凉意。她对钓鱼人通达世事的欣赏，急逼在悄然的无血色的白描之中。

别林斯基在《一八四七年俄罗斯文学一瞥》中谈到自然派，是站在俄罗斯文学的最前列，是通过自然派作家，俄罗斯文学走上了一条确实的、真正的道路，面向了灵感与理想的独创的源流……别林斯基

将“自然派”的确定和胜利，看作俄罗斯文学的合乎规律的历史发展。而作为“自然派”的中坚作家普希金，也因此成为俄罗斯现代文学的起点。

自然派指的是现实主义，在这里，强调理性的就是真实的，湾区收租人的真实，是满意并自得于收租的生活方式。这是北方文学《分马》的逻辑（周立波《暴风骤雨》）所无法认同的南方伦理。看似低矮的人生诉求，却是伟大的个体目标，遑论高下？平民的安妥，难道不是政治家的理想吗？

别林斯基在这篇论文中还特别指明，本身就是目的的“纯艺术”，无论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都是不存在的。他明确认为，把艺术设想成活在自己的小天地里，和生活的其他方面毫无共通之点的纯粹的、独立的东西，这种想法是抽象而空幻的。

魏微说：“至于有些作家，几十年间叫人看不出他风格上的变化，我私下揣度，要么是他止步不前，要么是他没有语言。”魏微的深刻，在她严厉的自审。这是一个有作为的作家的痛点。

确实是没有语言。它的潜台词是思想。湾区思想是它理性的真实生活。吴君晚近的创作，呈现的这种思考，是深刻的。

生命陪伴生命，生命影响生命，这是一个关于唤醒和引领的故事，躺平家庭的重新站立，身后是一个群体的众志成城。

《同乐街》是小说家吴君继《我们不是一个人类》《万福》之后第三部反映时代变迁中小人物成长蜕变的长篇力作。小说除了塑造了一个大历史下的新人形象钟欣欣，还刻画了陈有光这个一心想回到过去的男人。陈有光当年是村委主任的仔，是外来加工厂的厂长，是外来女工的神。十几年来，他一直与同乐的发展唱对台戏。同乐路的对面是京基百纳，是深南大道。如果过马路需要绕个大弯。同乐的年轻人支持社区的意见，准备修座人行天桥。可是这个计划被同乐的陈有光从中阻拦了。原因是他不希望同乐发展得太快，和大都市接轨，而无人理他的历史遗留问题。

钟欣欣是一个潇洒自由的 90 后，申请到社区是远离机关的各种压力，她希望自己放空，自在。到了同乐后的工作之一便是说服陈有光学习技能，鼓励叛逆的陈小桥安心学习，同时调解婆媳关系，劝告外来媳妇欧影面对家暴敢说不。由于缺乏工作经验的钟欣欣简单粗暴，导致陈家矛盾公开并升级。为了改变因自己失误带来的影响，钟欣欣只能求教前任同乐社区主任，过程中钟欣欣了解了基层工作的艰难，锻炼了自己处理问题的能力，同时成功解救了被诈骗团伙蒙骗勒索的陈有光一家。作品展现了 40 年同乐的变迁和三代同乐当家人各自不同的命运，《同乐街》小说试图写出乡村政治与新生代的崛起和浪子回归集体的故事。

吴君的叙事立场与话语方式，其人物性情之平实，阅世之沉浸，文学处事之太极，令人吃惊。女性作家一旦看清了自己作为人的诸多角色，诸多方面，则犀利与

温婉并存……

深圳是一个始终被人看，又可以深刻地看到人的内心的地方。城市人性的四面八方，让人的内心，无处遮掩躲藏，一天无钱，你就暴露得体无完肤。吴君对深圳的热情，是一种巫女的洞穿。其实，她最大的情怀，就是对深圳的疑问，在歌者并不重要的时代，她爱深圳，就拍拍它的脸颊。她之起名“同乐街”“万福”，既是祝福，其力道，更在顺应的太极中。她把女作家的“自然派”发挥至极处。

大湾区文学预设，因这些作品，而有了人文及历史的依据……她和笔下的人物一起成长，她在语言风度及思想演化上的本土性，使湾区这个原本卡顿在区域理论概念上的命名，起码有了文学存在的理由……

陈崇正、王威廉、郑钟海的书写故事，有一点神异的味道，所以我说他们是“故事”。

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特别是俄罗斯文学，在经历了十二月党人的革命和西伯利亚的流放之后，自然派的英雄主义目光，直接折射到小人物，中间人物或反类型化的芸芸众生之中，或复杂变态或宵小平庸的人物内心，似乎更能透视“理性的真实”的存在。从赫尔岑的人物随笔到列宾的油画以及一切与十二月党人有精神谱系关联的作品，贵族的平民化及平民的英雄观，成为那一时期的重要特征。中国“五四”之后的文学，也深受浸润，如蒋光慈的《咆哮了的土地》，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等等。

“新南方写作让南方以南的作家具有了主场意识，也开启了属于不确定的创作美学。我们得以从容地审视开阔的南方，南方以南的土地上曾经诞生过奇迹。在百多年间，南方曾是历史的主场，也应是文学的主场。”

整体性审读所谓“新南方写作”，是合时的。因为，在未曾明确提出“大湾区文学”“新南方写作”之前，珠三角以及泛珠化写作，至少存在了二三百年。《三家巷》《香飘四季》《金沙洲》《山乡风云录》《黄金海岸》《欧阳海之歌》《红色娘子军》《绿竹村风云》《松柏长青》《我应该怎么办》《商界》《雅马哈鱼档》《中国高第街》《中国铁路协奏曲》《山还是山》……近期厚圃的《拖神》、陈柳金《彼岸岛》、卢欣《时间修复师》、它们都是平实的南方写作。他们的写作天际线，一直在下沉下移。从革命文学沉浸到高第街的小商小贩，雅马哈鱼档，乡村纪事，这真是绝妙的演化。

“对于文学理论而言，确定的理解一定更容易把握，而面对不确定，更多的人会产生畏惧。新南方写作所构建的也正是关于可能性的美学，或者说，正是因为克服了对不确定的畏惧，新南方写作才能走得更远。与北方方正规整的街道相比，南方的街道歪歪扭扭；与那些明确的板凳和桌子相比，新南方是林木葱郁的雨林，是鸣蝉，是蒲公英和含羞草，是树根通向树冠的力，是相对于实数的虚数，是允许多解的运算。”

南方的树很高，人很矮，视野更以想

象的方式，白日做梦的方式，获得一个更丰富广阔的世界，神鬼人的世界。即便乱世，要想一马平川地屠城也不是易事。面对生存，不狡黠、不逢源不是事实。南方拥有小块土地的自耕农很多，小地主也不少，社会和谐来源于互济共存……而且有绵远的耕读诗礼的传统，文学的可能性，更多发生在族群事端上，家族色彩及地方文化小说，晚近也有长足的发展。重点在于，能否在古旧的存在里，发见一种未来的驱动力。在神鬼人的共融中，遥见终极的科学亦是神的存在。

陈崇正说："潮汕地区确实重视鬼神，我们村子周围大大小小应该也有几十路神仙了，逢年过节总要各种拜祭。有一天我看到一份关于平行宇宙的资料，突然发现这帮科学家慢慢成为玄学家了，同时也就想起我小时候那个巫婆。此后一段时间，我试图将科学理论和故乡那些神神鬼鬼的故事进行对接，于是有了《黑镜分身术》。"

郑钟海的《潮汕烟雨》，是一部地域性作品。潮汕文化非常独特，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一部分，这种文化精神，高度呈现潮汕人的文化认知。

郑钟海说："我是潮汕人，我熟悉我所了解、认知的潮汕，以及我所生活的潮汕地区，所以我以对文学的虔诚和对潮汕文化的推崇，呕心沥血地创作了《潮汕烟雨》。作品好坏，我给不了答案，但我热爱这种创作，因为就我个人而言，这种富有地方色彩的乡土小说，是我个人的精神寄托，而放于整个潮汕来说，或许也更能凸显出文化的独立性，从而对地域文化的自豪感。"

"关于文学创作，我想我会立足于潮汕土壤，不遗余力地关注、审美、解读、推广潮汕文化，已出版的《潮汕烟雨》如斯，即将付梓的《藏》亦如斯。换言之，我将文化上的故乡作为自己情感的中心，深耕于此，会让我找到自己的价值，更会让我感受到潮汕文化的魅力。"

新南方写作归根结底是地域或地方性写作，跟其他地方有差异化、差别化，这才是文学的多样性，毕竟中华民族就是多民族的国家，所有的个体文化，只有融入于民族整体，才能完整呈现其历史，充分凸显其意义。

王威廉在谈《你的目光》时认为，"新南方写作"实际上也是一个关于"目光"的问题，距离往往可以帮助人们产生新的发现。

作为来自西北的作家，王威廉的个人体验："新南方四季常绿，生机勃勃，人与自然的关系极为密切，这里的文化有着兼收并蓄的包容性，作家们应该充分开掘自己的'目光'，关注新南方独特的历史文化资源，结合时代潮流，充分展现出湾区这片世界目光汇聚之地的深厚内涵与勃勃生机。"

我之所以列举这些作家，是他们把自己最真实的一面，通过作品展示给读者。尽管他们的作品，可能也有不真实非真诚的表达，但那些是属于讲述的太极部分，可能为未来，预埋证伪的机会。

这就是素朴的理性，也是现实主义的

题旨之一，它们为作家及笔下的世界所共融而为人物的灵魂。灵魂没有对错，但有高贵或卑微。如他们笔下那些大湾区历史时间里的人们，是由丰饶或贫瘠的南方，可能丰衣足食的现状，而逐渐形成、积累起来的人生观，也即安命。对于大多数安分守己的人而言，厌弃战争，安于一隅的南方，安命并不意味着消极。因为维持安命，就必须包含必要的改革，也即并不排斥有限度的改良。这非常适切城中村暴发户的心态。这是南方最为形而下的生存诉求，也是最卑微的精神高贵。人们已经见怪不怪且认同，街上拖鞋短裤却可能财富自由的人生。

这里展现的，是晚近老中青三代作家，在湾区文学这个大命题中的思虑。这样说有些残忍，但是，时间就是这样，本来就不存在的东西，却在每一个个体身上，包括灵魂，深刻地体现着各自的差别。这种差别，在过去十分缓长，二十年一代，而在此刻，五年，最多十年，今天青春，明天就老去。有时会反过来，九十岁的当下，三十岁的明清，十五岁的汉唐。时间以没有，不曾有，或以形而上的姿态，颠三倒四地浸润在与外表全然不同的灵魂里。老的青春，和年轻的苍老，像咖喱的合成一样，把无数香料混合在一起，但是，细心如你，经验如你，你还是可以在沉静中，嗅辨出除了姜黄之外的芫荽籽、桂皮、辣椒、白胡椒、小茴香、八角、孜然等等。

30 年代人的苏晨《常砺集》，黄树森《广东九章》，范若丁《皂角树》，章以武《风一样开阔的男人》；40 年代人的卢锡铭《枕水听涛》；50 年代人的陈俊年《南边的岸》，黄国钦《潮州传》；60 年代人的熊育群《金墟》，陈继明《平安批》；70 年代人的魏微《烟霞里》，吴君《万福》；80 年代人的王威廉《你的目光》，陈崇正《悬浮术》，郑钟海《潮汕烟雨》，葛亮《燕食记》等；特别指出的是，90 后的张闻昕在 20 岁时出版长篇小说《问青春》，李敬泽在序言中说张闻昕是“气象不凡的作家，临近高考的那一年那群孩子那些事，竟被她写出了人间辽阔、人情丰饶”。上述作家，在大湾区未被命名之前，早已创作满弓，却在大湾区的文学构成与共同的仪式下各自表演。他们的文学呈现，消失了年龄的时间历史，而在同一时态中，以湾区的名义书写。这就是，所谓新南方书写的理论实践。或者反过来说，先有湾区形态的文学，然后有湾区的行政命名。

2023 年五月的龙舟，瞬间成为五月的文学象征。与往年不同的是，这一年很少提到屈子。甚至有言：始有端阳，后有屈原投江的传说，而非相反！无论如何，大的龙舟，引申到大湾区的文学关系，是一种新形势下的气象。这是湾区之外，难以复制的文学事实和现象。

有些特别的是，2023 年的龙舟分外热闹，体力和仪式胜于任何年份，可算龙舟的丰年。作为人心与精神气质描述的文学，在五月也恰逢丰年，南方文事，诸如花城文学院的成立，包括新南方文学书写的推出，都类似龙舟的“飘移”。

湾区的特质是连结，把相近百公里的城市连结起来，形成一种“圈”的势能，各座城市，各种优势汇流，共融，平衡，互补，强有力地输出与输入。文学在这种形势中，就处于一种类似龙舟，在各种形态复杂的湾流中飘移的技巧和能力。

你能想象一条 25 米长的龙船，坐 40 多人，在宽度不到 6 米且九曲十三弯的河涌内高速过弯吗？叠滘人真的能做到？有人说看过叠滘龙船玩儿漂移。再也不用看速度与激情，那全国这么多地方都在赛龙舟，为什么会漂移的只有佛山叠滘的龙舟呢？它自古以来形成的，船对水，人对环境的破解——飘移。

飘移的解释，包含了“漂移”和“飘移”，重点在拐弯处的用力与方向。水上漂则就势，陆上飘则止速。在拐弯时点刹车与倒车，形成飘移……

中国文学是讲求心智的，也即灵魂的力量。在复杂多变，不可预知的湾区现实，文学的立场与态度，以及描写讲述的对象、方法方式，都耐人寻味。不是简单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可能囊括。湾区的开放精神和改革现实，激情与速度，需要一种合适的心态，这个问题交给文学。

人对生命的迷茫，具体表现为“躺平”或“内卷”乃至突围。表面的、粗浅的如“打工文学”，是人与铁的矛盾。内在的、本质的是“飘移”的文学。它不缺打工的内容，精髓在面对生活的无数拐弯，吴君的《万福》正是其中的飘移者。

大湾区，作为地理概念也作为区域行政概念，更是全新行政的先行区域，它的预设、认知，包括生活方式，理念诉求以及文学的相应表达，不管认知如何新颖，它都必须是建基于它的历史基础。从小渔村出发，通过三十年改开，借求各种地缘优势而为的结果。从蓝图开始的湾区，首先是人文的湾区发见，文学首当其冲。吴君始于《万福》的系列著作，是发见湾区人文、底层平民生活的卓见之作，在某种程度上，她比沉没于湾区底层生活的原住民作家，更沉浸于这片日新月异的土地，那种不断沉淀发酵着的市民（农民）生活。这种生活植根于不断变换着的环境和政策机遇。宝安机场、前海……每一次现代辗转，不单改变他们的生存方式，也改变着他们的观念，堆砌着他们的福气，所谓万福。

更重要的是，吴君令这种堆砌福气的文学叙事成为一种改变生活方式，且行且珍惜的精神气质。由于富有，文化有了传承，人因此变得宽容、平和、友善，从而刷新了社会风气，抵抗戾气及恶性效果。这种文学的可贵品质及道德增殖，曾经长期被文学教条所规避，被所谓英雄主义所忽略，让空泛的所谓“主义”所冲击，而降格了文学的人民性和世俗关怀、良性的社会风气与良知，永远是最悲悯也最伟岸的文学话语。

吴君无愧湾区的历史，且提点了湾区人文的真实，精粹了人性认知。她小说里的人物，貌似慵懒平淡的生活，根源在于富足，在于对富足的散淡。后者特别重要。吴君的小说，一开始就远离“打工文学”的狭隘和农耕思维，阶层与阶级的隔

阂和仇恨。所以，她小说的文学格局，是在小渔村的未来蓝图上展开的。她根绝雄阔多气的北方写法，沉溺于市井特别是让城市包裹得密不透风的城中村，在握手楼的困顿中，去寻觅巴掌大的一线天。消弭仇恨的良药是温暖，是关于湾区特有的敬语和手信，人与人之间的尊重，是一座又一座原始而现代的宅基小楼之间的牵手，而不是高楼大厦门对门的冷漠与嫌恶。湾区小镇的生活与人文，是巨型办公楼冷硬的消化。

熊育群的《金墟》，亦在努力营构这种人文关系。如果说吴君的小说是温水煮青蛙，熊育群则是猛火炒薄壳。

倒是魏微，入粤这么多年，未见有粤地深潜之作，忽然来了《烟霞里》，把一个小女子四十年之困，一袭流水账式的人生行脚，多角度，多层次，多重叙事，多重话语，娓娓道来，充满着广东本土的精神品质：安分和进取。要不是早逝，田庄在广东最后十年及之后的人生，《烟霞里》会有巨著发生。

如果说真有新南方写作，其发生不在当下，而在历史。从《香飘四季》《三家巷》开始，广东作家一直在努力，几代人的摸索，首先在岭南小说散文杂文随笔上取得成就，秦牧、紫风、吴有恒、陈残云、黄秋耘、林遐、杜埃、苏晨、黄雨、杨樾、魏钢焰、伊始、杨干华等等，这些老派的广东作家，他们的作品始终在新南方写作的探索之路上。深沉并热爱广东，方有南方书写。

章以武以《风一样开阔的男人》为岭南散文创作画上一个喜人的暂时的句号，也可以说，他悄无声息地开启新南方写作的散文指向。南方都市，本质上是女性风格风致的城市，不管男人女人，主导城市生活格式与风气的，自然是女性，遑论老幼。西关是老广州的时髦，而东山记挂的，还是西关的小姐。人性问题，百年前后，没太大区别。

卢锡铭的《枕水听涛》使我读出了我与我的同龄人的童年、少年和中年，那些窘迫的或者欢欣的时间，油然而生一些感同身受的艰辛或欢娱。许多平常人在书页中走进走出，却走出非常的人生，有想象的人生。他们和读者一起完成了阅读，完成了生命的旅程。这种文学文本的质地，生长着对历史的抒情，对乡土的礼赞，对人生素朴的浪漫，对千百人日常生存的白描，对故乡、对亲人、对友朋的眷顾，对乡土的愁绪，对自己的珍重。卢锡铭的艺术才情，就在这种质朴但不失隽永的描状中，从“我”出发，以热烈情愫，包裹人和世界。

沉溺于《枕水听涛》，是多年来我对散文的矫情与虚假，极度厌倦之后的一次留驻。我看见一个踽踽独行的男人背影，在沙田水秀的荫蔽中，在桑基蕉雨，花尾渡和阿驼三宝中，沉郁而又兴奋地讲述，说着一些我们熟悉而又陌生的南方故事，一些为之共鸣的情绪，一些沉埋岁月多时的风物……

一个家族，一个村庄，以至于村庄以外，一个广袤的世界，它们终将以沉寂的纸面上的行为，成为许多人的个人记忆，

同时或清晰，或模糊着历史的面貌。但是，这一切的逝去与失落所构成的文明，在文学的想象与象征上，却有望被真实，而不是事实地活跃起来，存在下去，并以抒情的方式，讲述与呈现。卢锡铭的散文集《枕水听涛》，非常出色地实现这种真实，理性的真实。

对于陈俊年的《南边的岸》，用江冰的话说："可视作广东乃至中国文坛全景式书写珠江的上佳名篇。大气磅礴，视野恢宏，极具时代气息。一连串比喻如珠似玉，令人惊叹！奇妙处直追历代古典名篇。真可谓摄珠江之魂，形神兼济，丰盈充沛，浑然天成。文采斐然已成次要，以对历史的溯源和现代的挚爱编织成珠江美名更深一层的文化经纬：丝丝缕缕，饱含真情，富有灼见。"

"《我的文学和出版经历》一文，作者高度概括了自己的文学创作和编辑历程。其中诸多名师对他的哺育与关怀，历历在目。新时期伊始，中国当代文化喷薄而出，文化的黄金岁月由此诞生。作者的幸运，恰于此时见证了改革开放的潮象。陈俊年的特点于文字中呈现。"

"他的散文，常有小说的情节细节，读来饶有吸引力；且含杂文的思辨辛辣，富有思想的冲击力；也带诗歌的意境韵律。"

黄树森的评析最是透彻："俊年放笔直干，纵情挥洒，以广东一连串地级市名无不在水一方，带水成名入题。进而状写广州、梅州、惠州，貌似无水，但那州字中间的三江为川——穿城而过，诠释得当而富情致。复又以故土和平之巨变，清远挂职之亲历游弋其中。感受、体验、憬悟与土地、历史、时代同在。情感链思想链一经撞击契合，便萌生一种境界，一种沉湎，一种回味无穷的文化、哲学意境，引领我们穿过近代广东至现代广东那悠长而幽深的历史隧道。广东的城是水做的。水而生岸，岸而成史。岸的映象，活脱出岸的本体，岸的绝代风华。"

据说最长的龙舟近百米。远至海南万宁，竟有 130 米长的海上龙船。珠江、西江、东江、练江，几乎所有南方沿海江河，旷世龙舟，千船竞渡，都在端午这一天，在千村万陌中，花团锦簇地涌流着力与美的律动。百桌千人，千桌万人的龙船饭，截堵起激情和欢乐。大湾区河流上，万人击鼓，千舟竞渡。五月的端阳，化作盛大的狂欢的节日，让人在三年疫情的冻土中醒悟，在共克时艰中，再次扇动翅膀，以力与美的方式，尽情消费中国人精神的另一面。

不是为着那位高洁修美、离骚天问的屈原，更不是为着投江的传说，历史事件一旦演化为民俗或方俗，内容就自然而然消淡，形式却成了时代的典章与节奏。龙舟的"飘移"，是臂力和曲流弯谷的较量，而牵强于文事，则这种隐喻的张扬，尽可烘托大湾区的文学源流及其深度演绎。

文学的说话方式，晚近有着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首先是主观叙述立场的改变，也即看取文学现实的态度，从虚构现实进而沉浸现实，所发生的文学观念，即

文学对现实，及现实转化为文学的角度和基本态度，大多来源于沉浸的体验，即沉浸于现实底层，却选取“飘移”式叙述，这是一种处世技巧，在文学讲述上的变通。这两个方面的问题，都发生了质的变化。

以往道德化的文学理想，包括所谓主题先行的人物性格塑造、完整的故事情节、情节集中的矛盾冲突，连同在众多人物中，突出中心人物的创作原则，有所消解。曾经顽强不衰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简单演绎，在创作实践中的主观消退，也渐成事实。这些在过去时代的文学中，原本走在前台和表层的东西，被隐匿到背后，沉浸而成为底色。这个根本性的颜色，始终是文学中，决定着现实关系的基原色。在当下的文学考虑中，这种调色不直接呈现为颜色本身，却转化为一种万变不离，机锋涂抹，巧妙转身，平白书写的文本意味，这也许切中新南方书写的本色与动机。这就是主旋律书写之外，还有一片可以“飘移”的空间。

如魏微在《烟霞里》扉页所言：“因她而起，却不为她而写，通篇都是她，却无关她……”就是这个意思？

与禅的玄妙所泄露的意图，有几分相似，把坚硬的现实，柔化为一个予作家以绝对自由的想象空间，这本来就是《田庄志》的意图。一个人的史志，却有着另外的高远与延伸。把一个人有限的叙述，广延抽象为无限的意义，这是毛边书的动机。把毛边的生活，更其粗糙地敞现在世人面前。小说把人生掷回无奈的荒凉，却心灵依然丰盈，依然情涌，却无处诉说。这是田庄的痛苦，也是所有人觉察却无法突围的痛苦。她仅存的是让人得以去写她的冲动。她始终活在迷茫中，如山的痕迹，在“飘移”中。

那个时代不因她而起，却因她而结束。这种话语结构所包涵的哲学命题，在具体的创作过程，直接把素材铺陈成描写对象，把小说的虚构变成非虚构，将小说错觉为写实。这就产生了“因她而起，却不为她而写，通篇都是她，却无关她。”《田庄志》也就变成了“田庄们志”。这也是“三国志”演变成《三国演义》，《大宋宣和遗事》演变成《水浒传》的道理。所不同的是，前者是“那个时代不因她而起，却因她而结束”。把史志和小说两个历史时间，缩编调和在同一个文本的时间过程中。后者的历史时间，依然独立于各自的文本。

大湾区文学口号与理论阐释，所焕发的文学热情，与其说是一种文学对现实的未来想象，一种新生活方式的文学追问与构思，不如说是对已有生活及文学经验的重新挖掘与再度审视，努力予大湾区这个行政地理及文化概念的文学预设，共谋新的蓝图。在这种不甚明朗，尚存摸索的文学预设，尚处于缺少整体性理论构想的情况下，一些耽于思考的作家，首先在自己的经验世界里，经营、重构、再造新的文本表述，将大湾区多元的历史材料，有限的个体生活经验，大湾区不甚明朗的未来观念，三者共融互通为一种新的讲述。这就是吴君的《同乐街》《万福》，魏微的

《烟霞里》，葛亮的《燕食记》等所致力所为的创作意图。我以为，在这方面，吴君用心最切，沉浸最深。

上述作家作品，把原本属于文学的戏剧性，还原到现实生活中去，也就是说，只要依照当下生活的原始描写与讲述，这种讲述本身，就充分或者更突出地呈现或隐匿着不可抗拒，且匪夷所思的那种叫戏剧性的东西。仿佛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生活本身中了魔咒，有着戏剧性的节奏和逻辑，纠结着神一般的关系，所谓“量子纠缠”或通常被称作“神操作”的东西。仿佛文学与现实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关系对换，生活的非虚构性，胜于文学的虚构性，同时固定了某种审美而成为规律。这种奇怪的逻辑现象，简言通俗为“生活比小说更精彩”，更富戏剧性结构。

生活脱出了千百年来的轨道，正如弯曲的河流，经过人工裁直之后，长度缩短，流速加强，同时逸出原始顺势就形的良好生态，而进入一种非自然的平直阔，从而衍生诸多灾难。

这个世界，有些东西是可以改变的，有些是绝对不能改变的。诚如变性和转基因。

田庄的一生，作者以“志”来记录，在众多的口吻中志表她，但却更像小说里的人生，是她却无关她，因为她却不为她……所有的因，都是她的果？所有的果，却不是她的因？她究竟怎么啦？这么一位籍籍无名，不为世争的平常女人，平常吗？不平常吗？太不平常的结果。她从大的江南，来到真实的南方，最终孤单地扑死在地上，心梗……这不是所有人的平生与结果，但不是人的平生与结果吗？她作为大湾区里千万女性中的一人，她短短一生里的变数，一言难尽，胜过漫长的唐宋元明清女性走过的迟缓行脚。

这种生命速度与不可知的激情，难道不是或有关所谓大湾区的理论预设，或已经在发生着的生存逻辑与各种关系的实践吗？这当然不是人物的原生，但一定是环境，一种类似火星的环境，一种从未有过的超越了原生的江河湖海，那种单纯的文学地理，进入“小渔村”到大都市的迅速转型，所造成的不适，火星般思维包括火星语般的生存意识的范畴，其冲突、扭曲，超越以往常规的生存环境，直接抑郁或瞬间抑郁，无需过程的意识变动。超前消费，按揭生命，时间骗局和突飞猛进的晕眩，无处不在的惶恐，悄无声息的危险，平淡的生活里却警钟长鸣的自守，下一刻不测祸福的突变等等的心理准备，都因新的地理关系，新的社会文化结构，新的理论阐述所致的变动不居。这些本不是因的因，皆成田庄心梗的“因”，又绝对不是她病理学上的“因”。这是之所以《田庄志》而为《烟霞里》，抑或相反的一点原因。

文学的封神现象也屡见不鲜。一部作品，若在某个圈子定调，或被某个评论圈子捧定，则封神，产生人云亦云的马太效应。引证的，做论文的，可能连作品都没读过，亦可评论得头头是道，反正只说结论，无须分析，也就放弃辩证。所以，不得不写下这篇晚近的观察。

一座华侨文学的丰碑

文 / 张文峰（广东省侨界作家联合会名誉会长）

1983 年 10 月 20 日，广州越秀公园南音餐厅有一场盛大的活动：广东省归国华侨作家联谊会成立大会。《广州日报》以半版篇幅报道了联谊会的成立。

广东省归国华侨作家联谊会（现更名为广东省侨界作家联合会，以下简称“侨作联”）创会会员 40 人，由著名归侨作家陈残云、杜埃、秦牧担任顾问，孙孺任会长，杨樾、杨嘉任副会长，马明任秘书长。侨作联的宗旨为“团结省内外归国华侨作家，与海外华人作家联络感情，促进作家作品的交流，繁荣华文文学创作”。

此时正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不久，万物复苏。几位著名归侨作家从 1982 年就开始筹备成立侨作联，“为了建筑一座交流国内外华文文学的桥梁”。这是前辈们的梦想，也是侨作联的初心。

40 年了，前辈作家怀揣着梦想与光荣，脚踏实地，为繁荣华侨文学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如第六届名誉会长、暨南大学教授、国际儒商协会会长潘亚暾先生所说的：“侨作联的成立，在全国范围内，堪称独领风骚，独树一帜，独展风采，实为神州之最，值得大书特书……他们通过自身艰苦奋斗，成果卓著，极具亲和力、凝聚力、团结力、影响力和号召力，产生了名牌效应，赢得好评如潮，成为华侨文学的一座丰碑。”

侨作联的会员最初是以东南亚归侨作家为主，后来逐渐吸纳了美国、加拿大等国家的归侨作家以及侨眷、侨务工作者中的文艺爱好者，聚集了众多著名作家和艺术家，如小说家陈残云、于逢、林岩、林滔、韩萌、程贤章；戏剧家吴天、孙孺、郑达、郭秉箴、何芷、杜边；散文家秦牧、杜埃、林彬、紫风、张天白、杨樾、杨嘉、陈秋舫；诗人戈阳、张海鸥、李维纲、许诺、林紫等等。

侨作联在第一个 20 年间，是成长和发展的黄金时期，在华侨文学创作、与海外文学团体合作交流方面展现了一片辉煌

2002 年，印尼华文作家向广东省侨界作家联合会赠书

的景象。

1987 年 6 月，侨作联以秦牧为团长的“华文考察团”访问泰国，并进行了多场报告会，考察团还有紫风、杨嘉、许诺、林紫。同年 9 月，泰华写作人协会回访，就两地华文文艺创作进行了座谈。1991 年 11 月，新加坡文艺协会以骆明为团长的访问团来访。1993 年 2 月，由郑达（团长）、许诺、陈秋舫、马阳组成的侨作联访问团前往新加坡，与当地著名作家座谈。新加坡亚洲研究会曾于 1986 年和 1992 年来广州访问。1999 年 11 月，印尼华文作家组团访问广州。2002 年 11 月，印尼作家协会主席袁霓、秘书长高鹰一行 15 人来访侨作联。此外，海内外作家以个人身份互访也非常活跃，有泰国的司马攻、方思若、梦莉、岭南人、白翎等，新加坡的骆明、李汝琳、刘笔农、尤今、蓉子等，马来西亚的云里风、孟沙等，美国的戈云、陈大哲、黄运基、陈若曦，澳洲的张典姊等。外国学者和汉学家专程来穗访问侨作联的，有日本的山本哲也教授、荒井茂夫教授，法国的苏尔梦夫妇等。

侨作联还花大力气抓创作，创办了会刊《回音壁》《粤海桥》《岭南侨星》杂志（后更名为《侨星》），并前后发动了 3 次征文。第一次是 1985 年的华侨题材、电影电视剧征文，共收到作品 80 部，约 200 万字。最后评选出获奖优秀电影剧本有《铁汉金钉》（苏炜）、《陈宜禧传》（郑丽华）、《风雨归程》（余伯昆）、《檀木观音》（罗英杰）；优秀电视剧本有《陈嘉庚传》（郭玉聪）。第二次是 1987 年至 1989 年的华侨题材短篇小说征文，共收到来稿 80 余篇。第三次是 1990 年至 1992 年的华侨题材散文诗歌征文，共收到省内外来稿 120 篇，评出获奖散文《春雨潇潇忆故人》（邱帆）、《侨乡散记》（雷铎）、《梅江灯火》（柯原）、《故园情》（李浦荣）、《交情郑重金相似》（周新心）；获奖诗歌《走侨乡九首》（公刘）、《南方月明》（邹荻帆）、《十四行抒情诗》（白桦）、《金锁匙》（颜烈）、《奶奶令我寻根回》（于最）。

为鼓励会员创作，侨作联从 1998 年到 2002 年连续五年每年出版一本会员的作品集。值得一提的是 2000 年 6 月，侨作联组织联系广州出版社出版的《回音壁丛书》。这套丛书一共九部，包括小说、随笔和散文集，由陈秋舫主编。另外据不完全统计，侨作联会员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单独出书 200 多套，较有影响的如郭光豹的长诗《赤子三部曲》、江静波的小说《师姐》、林朝宗的小说《烽火马来亚》，以及戈阳、周新心合著的文史集《泰华文学》和詹益称的长篇小说《北斗璀璨》等。

侨作联虽然没有财政拨款，没有财团支持，没有专职人员，但每一届的理事会都无怨无悔地为会员服务，创造了辉煌的成绩。

时光流逝，侨作联里的老一辈作家，一个一个先后离我们而去，但令人欣喜的是后来者继往开来，奋力工作。

我是第八届入会的，并当选为副会

长，后来任会长。2018 年，我再次当选为会长。如何继往开来，把侨作联发扬光大？我制定了 12 字的工作方针：搞活动、抓创作、建队伍、办杂志。这几年，侨作联举办和参与了百来次大大小小的活动。如 2018 年 10 月 8 日，主办了美国华裔青年作家利兰·卓长篇小说《美国庞氏家族的奇幻人生》（中译本）首发式；11 月 13 日，与广东华侨博物馆举行“共建广东侨界作品阅览库”签约仪式，数十位侨界作家向广东华侨博物馆捐赠自己的著作；12 月 23 日，与广东省朗诵协会、正元庄读书会联合主办“广东侨界作家迎新诗歌雅集”。2019 年，侨作联先后举办了“侨心·致母亲”诵诗会，组团到花都华侨农场和英德华侨茶场采写反映农场巨变和归侨侨眷事迹，承办“华夏杯·华侨华人与新中国征文比赛”，与广东华侨博物馆共同举办主题为“我和我的祖国——司徒眉生（家族）的爱国情怀”的“侨博讲堂”。

……

近几年，侨作联会员人数不断递增，形成了一支华侨文学创作“生力军”。其中不少是各地侨乡和省市部门的创作骨干，各地市作协的会员，有着良好的创作势头。他们有 60 后、70 后、80 后、90 后、00 后，初步形成梯队结构，未来可期。侨作联还成立了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儿童文学和文学评论等专业委员会，并建立了书画院和艺术团。在新冠疫情期间，侨作联举办了“颂党恩，齐贺岁——广东侨界作家网上书画作品展”和大型的网上文艺演出，反响热烈。

2023 年 12 月 29 日，广东省侨界作家联合会举行第十次会员代表大会

为集聚力量开展华侨题材的文学创作，2019 年 12 月 7 日，侨作联第一个创作基地——汕头创作基地挂牌成立，拉开了打造文学“侨方阵”的序幕。之后，江门台山、开平，广州黄埔区，梅州平远、蕉岭等先后建立了创作基地。创作基地挖掘华侨题材，讴歌海外赤子的爱国心和桑梓情，反映广东侨乡在抗疫斗争中涌现出来的先进人物和先进事迹，歌颂侨乡恢宏大气的家国故事，涌现了不少佳作。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侨作联会员已出版著作 1000 多部（种）。

华侨文学事业是一场接力跑，继往开来，任重道远。我作为侨作联 40 年历史中一个“交棒者”和“火炬手”，感到十分自豪。2023 年 12 月 29 日，侨作联换届，新一届理事会由著名青年作家刘迪生领航。我坚信，侨作联一定会开创崭新的局面，抵达光辉的未来。

文化名人刘斯奋

文 / 谢岳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在岭南文化圈，刘斯奋德艺双馨，成就显赫，能认识、结交他成了粉丝们的一种荣耀。他非富甲百粤之巨贾，也非位高权倾之政要，为何受到各方热捧？

亲友眼中的刘斯奋

刘斯奋著名而谦厚，有为而脱俗，常以“似鸟非鸟，似兽非兽”的蝙蝠自喻，大半生跨界穿行于诗词、文学、书画、学术等领域，均取得突出成就，是广东文化界的一面旗帜。文学方面，刘斯奋创作的长篇小说《白门柳》荣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成为一个时代的经典，至今为广东文学界唯一获此殊荣者；美术方面，刘斯奋被誉为当代文人画的代表之一，其论文

2023 年 9 月 28 日，刘斯奋在广州群众文化馆“当代学人自书诗联展”上发言

《朝阳文化、巨人精神与盛世传统》曾获广东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他曾历任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广东省文联主席、广东画院院长，任内建树卓越，为促进广东文艺事业繁荣与发展作出巨大贡献。有鉴于此，2015 年刘斯奋被授予第二届广东文艺终身成就奖。

因同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之缘分，20 多年前我有幸结识了这位通才式文化名人，每次跟先生晤谈，均能得到有益的启迪。我们海侃神聊，话题涉及文学、哲学与艺术，时政、历史与现实等等。我经常被先生广博的学养所折服，更为他亦师亦友、平易近人的挚诚所感动。

在我的印象中，刘斯奋一向为人低调，从不王婆卖瓜。目前见诸报端的宣传，多是对其小说、诗词、书画艺术造诣的赞誉。殊不知，他的文史哲理论功底扎实得令人惊讶。他的文艺思想前卫而不空谈，学术理论逻辑缜密而犀利，研究成果丰硕，成就完全可与文学、书画成就媲美，端的是一位跨界有为的文艺思想家和学术理论家。

那么，家人心目中的刘斯奋又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在儿子刘再行看来，刘斯奋首先是非

刘斯奋获茅盾文学奖作品《白门柳》出版了多个版本

常勤奋。他说："自小所见到的父亲，所有日常活动就是上班、写作、画画、阅读。"其次，刘斯奋是一位非常有天赋的艺术家，"从古典诗词的造诣、到长篇小说的写作、到水墨画以及书法，全是无师自通并且都能达到非常高的境界"。

如今，年近八旬的刘斯奋仍然孜孜不倦地探索新的绘画形式，例如最近他在探索花鸟方面的主题创作。在刘再行读高中和大学时期，刘斯奋的《白门柳》第一、二部《夕阳芳草》《秋露危城》获得茅盾文学奖，并正在撰写第三部《鸡鸣风雨》。刘再行细读了前两部，并作为第三部的第一批读者提供了建议。"这三部曲可以说包含了父亲前半生积累的传统文化知识之精华，他的作品始终渗透着那种对诗意的理解以及表达方式，更重要的是跟他本人的交谈以及观察理解他对事物的看法都在潜移默化地感染着我。"刘再行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这样说。

在家人的心目中，刘斯奋是慈父，是良师益友，是快乐老憨！

学者口中的刘斯奋

时光回到 1983 年—1985 年。

旅美历史学者余英时在《明报》月刊上发表《陈寅恪的学术精神和晚年心境》，把中山大学著名学者陈寅恪教授污蔑为一个没有追随国民党政权去台湾而充满悔恨的"遗老"。当时刘斯奋未满四十岁，正倾心创作长篇历史小说《白门柳》第一部《夕阳芳草》。原中南局宣传部部长王匡将余英时的文章交给他父亲刘逸生，问他能否发表点意见，结果被刘斯奋看到了。研读后，刘斯奋觉得余英时的文章是学术其表、政治其里，加上余英时的文章口气异常傲慢，视大陆学人如无物，令他颇为反感，于是他代父上阵，以笔名"冯衣北"撰写《也谈陈寅恪先生的晚年心境》一文与余商榷。接着，两人展开了一轮论战。之后，余英时匆匆发表了一篇题为《弦箭文章哪日休》的文章，单方面宣告"论战的胜利"而休战。

刘斯奋偶然参加的这场与余某的学术

论战，后来竟成了一桩学术公案。《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副总编辑、《历史研究》主编李红岩研究员认为，最能够反映刘斯奋深厚学养与功力的是他与余英时的这场学术论战，鲜明地表现了刘斯奋严正而锐利的史识。这种严正而锐利的史识，作为投向历史虚无主义的匕首，由于以深厚的学术功底为基础，以明清高士的文笔作法器，以闲庭信步的风雅作姿态，因而发挥了老吏断狱、庖丁解牛的作用，达到了极高的境界。这场文字交锋，在中国当代学术史上，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不久的背景下，是一个具有标识性意义的经典学术论战案例。刘斯奋是改革开放后最早向历史虚无主义亮剑的学者。他在与余英时论辩中所表现出来的学术水准和斗争艺术，堪称典范。至今，这仍是水平最高的一次亮剑。而唯物史观是刘斯奋进行学术辩论最坚实的思想基础。这次辩论的文章登出后，连钱钟书、季羡林先生都对文章给予了肯定，这对于我们今天开展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揭露，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对于刘斯奋的文艺思想、古典诗词、小说创作、书画艺术等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来自东西南北的专家学者如是说。

广东批评家协会副主席、《粤海风》主编谭运长表示，刘斯奋确实是广东艺术家当中比较少有的有思想、有理论的人，他的文艺思想成体系、重实践，特别是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朝阳文化理论的提出，很能体现他的远见卓识。至于在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的继承方面，他特别提倡几点：一个是《易经》里面的变易精神；另外一个是中道的追求，其美学表现就是中和之美；第三是将岭南文化的特色总结为不拘一格，不定一尊，不守一隅。他的文艺思想鲜明地表现出与时代精神脉搏同步，后来又搞了一个纠正学风的宣言，在文艺界影响颇大。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柠表示，刘斯奋提出审美自信，而文化自信的坚守离不开审美自信的弘扬。近代以来我们的审美受西方化的审美影响很深，中国文化里面优美的东西能否跟长篇小说结合在一起？读者的趣味能不能品到中国文化的美？现在的人需要这种审美自信的心态，因此文化自信离不开审美自信。

广东省评协名誉主席、文艺批评家黄树森梳理了《白门柳》的研究历程，指出这部作品在中国当代文学史、思想史和文化史上都有特别意义，通过进一步开拓，还培养了一批新的学人。这与刘斯奋的人格魅力，包括他研究学问的独立精神有关，他在纵深研究和横向研究两个层面都给岭南文化界带来了很好的影响。

广东省美协专职副主席王永称：“刘斯奋是自成体系的艺术家。我们需要从一个艺术家的角度去认识刘斯奋，除了娴熟的技巧和习惯式的表达方式以外，他还有综合修养、独特的审美和自我的风格，这是艺术家与画匠很大的区别。刘斯奋的都市人物题材画作常常使人大为吃惊，这体现了刘斯奋的积累、自信和创新，极具价值，这种自成一家的创作体系正是他能成为一只‘快乐的蝙蝠’的原因。”

陕西美术评论家张渝表示，刘斯奋的

书法和绘画一样，求大势，如金戈铁马，一旦抡起笔来，便一泻千里，不知其所止。他正是借着对艺术的不懈追求而完整地呈现自己的艺术品格乃至生命本身的状态。

这几位著名学者对刘斯奋各领域成就的中肯评价，字字珠玑，真知灼见，让人不禁为之击掌。

记者笔下的刘斯奋

在众多记者的笔下，刘斯奋多方位跨界，他并非一个单纯的作家、书画家、理论家，还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考古专家。

《羊城晚报》一位资深记者说，刘斯奋曾经开讲《时代变局的鸳鸯侣——董小宛、冒辟疆的爱情故事》，将明末清初名士名妓一段波澜起伏的历史娓娓道来。其中大诗人吴梅村为冒董情缘写下《题董白小像》组诗，其中第八首云："江城细雨碧桃村，寒食东风杜宇魂。欲吊薛涛怜梦断，墓门深更阻侯门。"陈寅恪、孟森等历史大家都曾对最后两句有过关注，但未能论定。以至罗癭公等人提出董小宛其实未死，而是被顺治皇帝掠夺入宫中之说成为疑案。2015 年，刘斯奋在《中华读书报》上发表《"墓门深更阻侯门"析证》一文，从时代背景以及冒辟疆本人生平遭遇入手，结合相关的历史文献进行分析，指出冒辟疆及其朋友之所以无法进入墓园凭吊，绝不是由于董小宛被抢入了"侯门"，而是因为当时冒氏家族的"墓田丙舍"，已经被"豪家尽踞"，划入了新主人的领地范围，以至造成先期入葬的董小宛的"墓门"之外，又多了一重不能随便进入的"侯门"的缘故。这无疑是十分合理和令人信服的解释，从而为这一桩聚讼百年的悬案，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中新网记者李凌在题为《专访刘斯奋：世界很美好，还想继续看下去》的访谈文章中写道："这位广东迄今唯一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家、以文人画独树一帜的画家，作为广东文艺界的领军人物之一，他曾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就文化建设问题发表了朝阳文化理论，提出创作'体现务实、进取、昂扬、乐观精神的作品'。"这个理论的提出对广东文艺创作产生了广泛影响，催生了一系列改革开放题材的电影电视剧，并一度引领了全国潮流。刘斯奋提出的朝阳文化理论及其较早对中华民族文化自信进行有益探索，对广东地区的文化发展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当代社会，成长在书香世家的刘斯奋，靠自己的学术立足立世立命，并依凭文化人的高尚品格，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2018 年 1 月 6 日，由广东省委宣传部、广东省文化厅、广东省文联主办和有关单位协办的"快活的蝙蝠——刘斯奋文艺成就研讨会"，在刘斯奋的家乡中山市举办。来自东西南北的专家济济一堂，对刘斯奋的艺术作品、学术思想中所蕴含的时代精神和人文学养，以及刘斯奋对中国文化和社会现实深层次的思考、对艺术审美及人生旨趣的把握，进行了广泛热议，观点碰撞精彩纷呈。

林贤治：笔落惊风雨　墨舞文坛事

文 / 陈锡忠（花城出版社原副社长）

近日，反映巴金毕生不倦追求着、反抗着、挣扎着、适应着又变化着的《巴金：激流一百年》出版引起极大反响。作者是学者型作家、编辑林贤治。

在中国数以万计的作家、编辑中，能称得上“学者型”的凤毛麟角。林贤治从写诗起步，出版了《骆驼和星》《梦想或忧伤》，又出版了多部散文随笔集，如《平民的信使》《故园》等。他的长论《胡风集团案：20 世纪中国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五四之魂》，更是“笔落惊风雨”，影响巨大。他的政治学著作《革命寻思录》和文学史著作《中国新诗五十年》《中国散文五十年》，显示其学者型知识结构。他的人物传记《人间鲁迅》《漂泊者萧红》《巴金：激流一百年》等，纵横调度各方面知识，显示他的创作才华。作为编辑，林贤治主编的丛书、丛刊多达数十种，编著近百种，数量多，质量也高。

一

林贤治于 1948 年出生在广东阳江一个贫瘠的乡村。他的母亲很小便当了林家童养媳，纺线、上山打柴、干粗活。林贤治说他“几十年不曾听见母亲大声笑过”，母亲总把人生的忧患深深埋藏在心底。她把温饱视为生活最高纲领，故极其勤劳节俭，“假如饿不死的话”常挂嘴边。母亲遗传给林贤治的除了一头卷发，就是埋头苦干的品德。母亲在烈日风雨中收种忙活，在昏暗的油灯下做针线，从不停手，也不叫苦。后来，林贤治出书了，目不识丁的母亲爱不释手，一部 80 万字的《人间鲁迅》一页一页地数，牢牢记住全书最后一个页码的数字！这真是母爱的奇闻呀。这位享年 93 岁的母亲，一生从不怠惰、从不屈服、专注农事，对林贤治的影响巨大。这也许是林贤治的写作中带有平民品格的原动力。

林贤治的父亲是位私塾教师、乡村医生，对儿子的文化教育非常重视，从小就教儿子读书写字。父亲在儿子小学时买了几套辞书，中学时就买了书架，这在农村是很“奢侈”的。在那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的岁月里，林贤治的父亲经历了狂风暴雨冲击，“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林贤治写过三篇纪念父亲的文章。父亲艰辛的一生，特别是晚年的际遇，对林贤治来说，应当是刻骨铭心的。

来自农村的林贤治有浓郁的乡土情

结。他写道："月亮是最先从故乡升起的。所以，游子无论漂泊到了哪里，只要窥见它，不羁的心，便当即飞回到生养自己的遥远而亲近的乡土。"他念念不忘乡村最普通的油灯，每年回乡总爱把油灯拿起来擦拭一次，剔净灯芯，灌足煤油，让土黄色的光盈满一屋子。最能体现他的故乡情感的是他 2020 年出版的散文集《故园》。打开书本，村姑阿毛、单身汉阿和、婢女出身的凤娟、爱唱歌的美芬、"地主婆"柳眉、疯女人爱蓉、小知识分子宗元，一个个农村底层人物向我走来，诉说他们坎坷的人生路，情节比小说还扣人心弦。

林贤治自小喜爱文学，读鲁迅、郭沫若、巴金，读《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等，还莫名其妙喜欢上冬妮亚。文学关注灵魂，教他远离卑俗，争取做人的独立和尊严。他在中学时便才情勃发，办文学墙报，写诗、写日记，做作家梦。

二

是金子总会发光。1981 年 7 月林贤治被借到《花城》杂志当编辑。他的中学老师、文学引路人谢绍祯闻之大喜，写诗为他送行："天海苍茫鼓翼飞，披霜况是菊花时，云山青眼应惊拭，待看摇风客袖诗"。其实，他的人生道路并非那么顺遂，由于是临时工，待遇是不平等的，没有正式工资，也没有奖金。然而他不计较，只顾埋头编书、读书、写作。他一有空便手不释卷，中午时大家都抓紧躺下休息一会，他从来不休息，常常拿着一本书看，直至下午上班。

社里几位领导都很器重林贤治，想尽办法要把他调进来。总编辑李士非对他格外关心。李士非是位大胖子，曾在一个大热天摇着扇子去光孝路林贤治那 8 平方米的宿舍看他。那是个用木板钉起来的廊间，周围是厨房，煤烟熏得板壁黑黢黢一片，房间没有光亮，连白天也要亮灯。有哮喘病的李士非进房后仍一个劲儿喘气。他长久凝视壁上镶挂的鲁迅像，语重深长地说了一句："这是伟大作品产生的地方！"林贤治当时正在撰写《人间鲁迅》，这对林贤治应当是个莫大的激励。林贤治一直尊敬鲁迅，鲁迅是他心中不倒的旗帜。从作品中可以看出，鲁迅的社会观念和文学观念对他是有着决定性的影响的。睿智的思想，飞扬的文采，《人间鲁迅》出版后好评如潮，荣获广东省第一届鲁迅文艺奖（文学类）。此书共有五个版本，重版近 20 次，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3 年便印了 3 次，还增做了精装版。林贤治是一个念旧的人，一直没有忘记推荐他前来《花城》的李士非。在李士非去世后，他亲自编选出版了近 30 万字的《李士非选集：热血男儿》。

1983 年，我对哲理诗产生了兴趣，看到图书市场没有哲理诗集卖，萌生编选的念头，与林贤治聊起这件事，他说可以做。我们便马上动手去图书馆借阅各种诗集，检索誊抄，几番汰选，终于积稿盈册。本身是诗人的林贤治对中外诗歌了然于胸，书稿编得不错，后来交由春风文艺

出版社正式出版，印数近万册。林贤治以《哲理诗：鼓动沉思的诗》为题写了一篇长序，详细论述了哲理诗的发展史、美学特性和文学价值，至今读来仍觉意味深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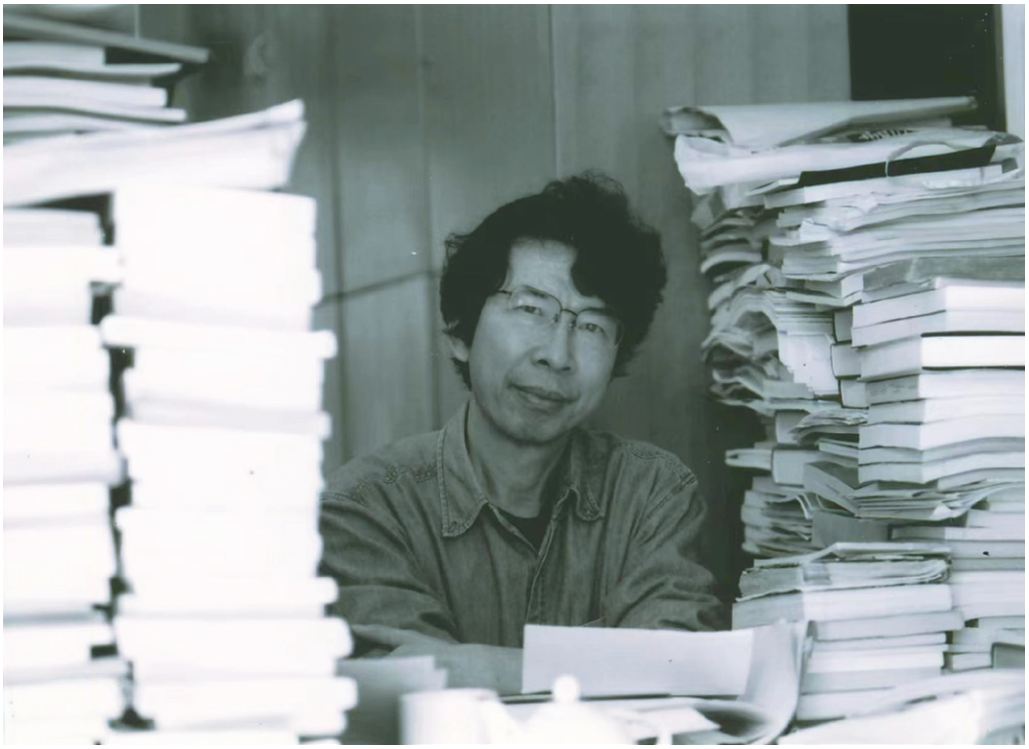
林贤治有段时间调到我所在的编辑室，我们合作愉快，一起干了一件影响全国出版界的事——1991 年春天某日，发行科长朱讯提出："民国时期作家的散文很多人都有兴趣，你们编辑室是否先编两本试试？"我跟林贤治商量，决定大胆编五本作为第一辑集中推出。林贤治承担编选事宜，我让他不用坐班，集中精力在家工作，赶在 8 月 31 日第四届全国书市上市。

林贤治平时博览群书，此次厚积厚发，他一人编讫，由余红梅任责编，画家苏家杰用各位作家漫画像做封面，我负责召开记者会和在多家报刊发书评，终于赶在全国书市时推出了"人生文丛"第一辑：胡适《实用人生》、周作人《恬适人生》、林语堂《幽默人生》、梁实秋《雅致人生》和丰子恺的《艺术人生》。这套丛书在书市非常抢手，来一车销售一空，再来一车又销售一空，被全国书市评为"十大畅销书"之一，而粤版书仅此一种，让我们感到无比兴奋和荣光。根据市场的需求，林贤治接着又编了三辑，共 20 种。此时我已调去社长室。社领导破例重奖林贤治 2 万元，这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目，在全国出版界当属首例，《羊城晚报》头版发了消息，多家报刊转载，一时传为美谈。

更有意思的是接着掀起了各地出版"某某人生"热，轰动出版界。但一日，北京某大报发表署名文章，批评我们出胡适、周作人这些"资产阶级作家"的书，为什么不出鲁迅等"革命作家"的书？要把青年的"人生"引导到哪里去？时任广东省出版局副局长刘斯奋把我这位始作俑者叫到他的办公室商量写"检讨"的事。但我们心里明白，经严格挑选出版民国作家的文章何错之有？其实，当时第二辑包括鲁迅的书已经在印刷中。检讨没写成，后来此事不了了之。

三

林贤治是有明确方向感的人。从他 1998 年出版《人间鲁迅》，2009 年出版《漂泊者萧红》，2023 年出版《巴金：激流一百年》，无一不是尽可能全景式展示一个人与他的时代。优秀的传记文学不是编年史，更不是传主的谀词和颂歌，而是要塑造出一个有血有肉的真实的人。对写好人物传记，我认为林贤治最宝贵的有三点：一不为贤者讳，如写巴金，从他年青时代追求无政府主义，写到他也有不敢讲真话的人性自保的弱点。巴金对他重孙李潇说："《随想录》里有真话，也有假话。"二是敢用史料。如当年巴金与文化生活出版社社长吴朗西从合作到分裂的实况，别人不敢用，林贤治就敢用。他对采访的记者说："史料不敢用就是死的，敢用就是活的、新的。"三是善于把自己的真实想法、对百年来历次运动和各种人物事件的评价与当下语境相协调。这类评价



林贤治在“书山”里工作

性的文字，没有广博的知识、清醒的政治头脑，是绝对写不出来的。他从不人云亦云，他对名家是平视而不是仰视，他批评不少“大人物”如李慎之、王元化、王蒙，还有余秋雨、贾平凹等名家，直率、真确、深刻，有理有据，并非是时下的那类“酷评”。

至今，林贤治已出版 40 余种著作。这几百万字离不开他每日不停歇地辛勤笔耕，比如《巴金：激流一百年》，每章注释百数十条，其中有多达 193 条。他习惯挑灯夜战，每天写至凌晨，其妻郑慧洁逐字输入电脑。他俩是中学同学，对文学的共同热爱终成伉俪，甘苦相知，也算是一段佳话。

著作等身的林贤治为人低调，珍惜时间，不喜欢参加社交活动，但也有例外。2017 年 11 月 16 曰，我与他应邀参加广东名家岑桑学术研讨会，他对我说是“出于对岑老的尊重而来”，不忘岑桑曾经对他的扶掖。他说，《花城》创刊号的长诗，就是岑桑特约的，那时他还在偏远的乡下，寂寂无闻。近日，他又抽时间应邀为花城出版社的老社长苏晨的新书《草地新绿》写序，我想都是出于同一缘故吧。

岁月不居，最是一生金秋好，高歌一曲艳阳天，在此向我的老同事寄出衷心的祝愿，行看林贤治写出更多的鸿篇佳作！

文学广州的无边风月
——读张欣新作《如风似璧》

文 / 陈思和（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文学评论家）

中国现代文学城市系列里，广州是一个有着鲜明语言特色和文化景观的城市，但有关它的文学经典并不多。然而，继《三家巷》发表 60 多年以后，我读到了张欣的长篇小说《如风似璧》（《花城》2023 年第五期）。她重新竖立起一座文学广州的地标式丰碑。

张欣

民国时期的广州已经是移民城市，城市里居住的不是清一色的广东人，更不是清一色的广州或番禺人氏。《如风似璧》也写到城市移民，如军阀吴将军的老太爷来自山东，妓寨老鸨梅贵姐来自上海，但小说的主要角色还是广东人。这一点，广州与上海的人口构成还是不一样。上海从开埠以来，居民构成里，土著的上海人并不多，倒是来自五湖四海被租界当局规训了的移民成了第一批新上海人。广州居民成分可能要单纯一点。我说的是改革开放以前的广州，现在的广州城市人口流动情况，有点与上海接近了。清末民初时期，广州开埠与南洋华侨来往较多，北上做生意的也居多，但北方人南下定居岭南的似乎不多。1927 年大革命当然是个例外，但随着北伐和大屠杀以后，大量外来人口又回流到内地了。所以，《如风似璧》描写的 1932 年到 1942 年这十年岁月，张欣笔下的广州城市里，活色生香的依然是满口广东话的男人和女人。

广东人的文化底色是什么？张欣有过一些思考。她说：“如果北京大妞是飒，

上海小姐是嗲，那么广州女人就是韧，坚韧的韧。”我没有做过这样的比较，也没有思考过大妞的“飒”和小姐的“嗲”究竟为何种作态，但读到广东（女）人的“韧”，心里仿佛被一道光所照亮。我的祖籍是广东番禺，别的情况不甚了解，在自己的家族里，确实有几位生活在民国年间的前辈女性，她们是如何在底层挣扎、自强自爱且终能坚韧地生存于民间职业岗位，我是有感触的，因此对张欣说的“韧”深以为然。如果从文学意义上开掘，广东人的“韧”的精神背后还盘踞着非中原礼仪道统规训的异端基因，譬如南蛮之“蛮”，生命如火，柔情似水，性格硬朗，行为不羁，欲望旺盛……尽含在“蛮”的精神范畴之内。即使在今天高度现代化的广州城里，南风呼啸、商海汹涌，珠江边上的“小蛮腰”仍然传递出广东文化的无边风月。

“韧”的精神内核有了“蛮”做底色，就变得鱼龙潜跃、良莠混杂。近代资本主义入侵中国，南方率尔敢为天下先，有鸦片也有禁烟，有革命起义也有资本积累，有藏污纳垢也有威武豪迈。小说开篇写苏大阔发迹，利用入赘继承了潮阳鸦片商人的家产，也因为无良而影响子息，人丁不旺，这是一个有意思的隐喻，与广东人的迷信观念有关。小说结尾写苏步溪小姐健康地走出闺门，靠做妇产科医生独立生存于社会，做了前后有机的呼应。继苏大阔之后，小说里有广东味的男人是鹏仔，人渣一个，前半生潦倒无赖，后半生谋人钱财，当他得到了社会地位后，倒也像旧时上海滩的闻人大亨那样，有了一丝温雅性情。小说有一段细节，写鹏仔绑架了自己的儿子，阿麦前去说请，三人相聚，骨肉得以短暂团圆，但各人心思不同，感受不一，彼此的心都碰到了柔软处。鹏仔无赖中亦有人情，阿麦受尽委屈仍不失温柔，都是很有人性味的描写。当然仅仅写人性并非广东文化的专利，作家是这样写人物的——女人对男人的原谅是：“想着他再不好，希望成为一个上等人这一条还是没有错吧。”而男人对女人留下的话是：“我已经回不了头了。”这些想法和表达都有些“蛮”，后面还有一点硬气作支撑，很让人读出一些广东文化的味道来。

继续说鹏仔的故事。虽然是流氓发迹，但他的经历贯穿整部小说，他与书中的三个女人——苏步溪、阿麦和心娇都有过命运的交集。一个是富商千金，一个是贱仆愚妇，还有一个是青楼娼妓，鹏仔与她们都有不同层面的“故事”。他与苏步溪的故事核心在于“灵”，即使再烂的人，一旦心中生发出真正的“情”，他的灵魂也会随之升华。鹏仔是个没有任何道德观念的人，这也是骨子里“蛮”的一种表现，但他面对苏步溪，依然能生发出一丝未泯的良心，人也变得斯文起来。张欣用传奇笔法写了苏小姐遭遇的多种情缘，最神奇的，莫过于鹏仔的些许变化。其次，鹏仔与阿麦的故事，核心在于“欲”，不仅充斥肉欲、情欲、物欲，还有各种占有欲望，但是他们的关系也不都是邪恶的，特别是生命之欲的结晶，他们

张欣的文学创作岁月长达 40 多年，她本来可以驾轻就熟地沿着原有风格写下去，可是她就这么重重一跃，踩到艺术的巅崖险峰，眺望那无限的新异风光。她追溯历史岁月，探究人性幽暗，紧紧抓住了广州这座城市的魂。那个“魂”，就是她笔底下的广州女人们：一如风中玉佩，既有风的凛冽，又有玉的圆润。

有了孩子，而这个孩子最后又归苏步溪和贺大夫来抚养，预示着他们的故事最终也能成正果。其三是与心娇的故事，其实鹏仔与心娇之间最无关系，故事的核心则在于“死”，鹏仔的死偏偏与心娇有关，又是与一桩妓女被虐死的案件有关。这个故事里似乎传奇性多了一些，但传奇里又传递出广东人性格中的“蛮”。

张欣没有在小说里写大时代风云，连广州沦陷这般大事也是一笔带过，但大轰炸中苏大阔的横死促使了女儿苏步溪从贵族小姐的无聊情怀里振作起来，军阀混战中吴将军的死把心娇推向再作冯妇的境地，而阿麦两次被男人遗弃，逼得她一步步独立起来。时代苦难打断了广东女性嫁男人过安生日子的传统道路，苏步溪、阿麦、心娇出身不一，都遭遇过覆巢无完卵的绝望险境，她们也都咬着牙挺了过来。她们的故事并不是宣扬女人励志，而是张欣刻意描绘的广东女性的硬与忍。这“硬”也不是北方市井的咋咋呼呼，这“忍”也不是洋场小市民的唯唯诺诺，“硬”与“忍”的结合，构成了张欣笔下特有的广东女性之“韧”。这正是张欣要表现的广东文化和广州这座城市的魂。

最后我想说说这部小说题目含有的双重意思。“如风似璧”谐音“如封似闭”，是传统太极拳中的一式。在 24 式简易太极拳中，“如封似闭”是在收势前的最后发力；在繁复的太极老拳中，它是整套拳路中转型前的准备，既是自我守护之举，又有开张新局之意，“如封似闭”后面的一招是“抱虎归山”，那又起始了一派新的磅礴之势。由此我想到一位艺术家说过的话：“人过耳顺，要重新启动艺术生命的按钮。”表演艺术是这样，所有的文学艺术创作又何尝不是这样。“重新启动”意味着自我超越，再攀高峰。张欣的文学创作岁月长达 40 多年，她本来可以驾轻就熟地沿着原有风格写下去，可是她就这么重重一跃，踩到艺术的巅崖险峰，眺望那无限的新异风光。她追溯历史岁月，探究人性幽暗，紧紧抓住了广州这座城市的魂。那个“魂”，就是她笔底下的广州女人们：一如风中玉佩，既有风的凛冽，又有玉的圆润。

一叶轻舟探烟霞
——《烟霞里》读札

文 / 黎燕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魏微用编年体的方式跟我说了下面一个故事，并告诉我这是为纪念田庄而说的故事。我掩卷遐想，反复推敲之后，认识了田庄——

……余光里见得母亲几次在打量她，似有不忍，很后悔的样子。她突然计上心头，想着不吃饭可能会吓到母亲，心里很得意。绝食的念头就这样来的。

正是她，四岁就做到了绝食三天的田庄，出生在李庄，童年时代、读书时代在青浦与江城，成家立业、英年早逝在广州；正是她，在改革开放背景下成长起来的青年作家，就职于岭南文化艺术研究院，获过“青年英才”“岭南文化新锐”等荣誉称号；正是她，身上漫过了烟霞潮浪，四十一年的生命承载了“文有烟波”“理畅霞举”“平生烟霞心”等诸多情感。《烟霞里》卷一中七岁的田庄有了爱的概念：

这一年，爱住进了小丫（田庄）心里。这个词很重，中国人一般不用，当然爱祖国、爱人民除外；针对个人而言，这个词太浓，消受不起，容易受伤。因此中国人宁愿换个说法，称作“感情”。很平凡、很平实的两个字，蕴藉，有温度，热度却降了一层，不烫人、不伤人，刚刚好。

“很平凡、很平实”文笔清劲，交隐了作品无尽的意味深长。轻与重并行，“轻舟已过万重山”式说著，在卷中徐徐图之、照人心腑。作者魏微从小喜欢古诗词，经常在起床后背诵唐诗三百首。魏微的《烟霞里》取名于古诗，卷中亦遍布诗的美学。因此，我尝试着从诗意美出发，读寻《烟霞里》的“轻重说”。

轻言“文有烟波”

一切都开始于田庄诞生的那个瞬间。

《烟霞里》是用编年体的口气开始的，也就是说，是记忆的口气开始的，并非常有重点地选择了田庄的四十年（1970—2011）。世界上有很多创作是还未被命名的，还有一些尽管已经被命名，但从来没有被描述。我想，其中之一便是《烟霞里》的“轻重说”——它显然是现实与险滩的，是一个简单而复杂的变体。也许许多人都没注意到，“轻”毫端的诞生是双重的开端：它一面用《红楼梦》的绮霞式旋律、娓图式的节奏，一面用何焯

的波澜起伏式叙述来达到“文有烟波”双生色彩。诚然，这样体势险峻的创作，既要包含“土地”，也要有“灵魂”。

《烟霞里》观察甚广，用笔写实。卷里描述到了许多的“土地”，有李庄、青浦、江城、深圳、广州、台湾……它们串起来，就是田庄的生命轨迹图。同时，还得提一下年代——这部小说从 1970 年开始，既是生命之初的动中静、也是时代之初的静中动。那会的李庄穷得不可开交，“敢教日月换新天”“大雪天出生的孩子有好命”，给田庄另外增添了一层光泽，赋予一种新鲜的魅力。承类于张爱玲的《传奇》，生活一应琐碎皆“五脏俱全”，但也给了生活最自由的表达。古代的《毛诗序》说“情动于中而行于言”，情似乎不受理性摆布，有着鱼一样跳跃的画面。我们且看下面一些画面——

魏微

田庄八岁时，因之姑姑的婚礼，整个就是一场知青大聚会。小丫头（田庄）才回江城，就见家里人来人往、嘈嚷不决。姑姑忙于接待，连婚礼都来不及筹办。送走一批，又来一批。成天就听她的小屋里，哭一阵，笑一阵，唏嘘一阵，好不热闹。

田庄十岁时，这是孙月华进企业的开始，从质检员开始，后来又做了财务。……无论如何，她是 1980 年“春江水暖鸭先知”里的那只鸭，一只摇摆的鸭，精明又迷糊的鸭，一只有欲望的鸭，因而也是痛苦的鸭。一只曾被命运眷顾过，又遭抛弃的鸭。一只起了大早却赶了晚集的鸭。她确实赶了，虽然没赶上，到的时候集市已散，天黑了。

福兮祸兮，诸如此类，把田庄盛年的“另有各式鸡零狗碎，生活开始横冲直撞，不受控制”“一事无成”等一切东西明亮地、自由地、简单地加以制作。写实的笔不时蘸着浪漫主义的墨，借用田庄周遭的人与人、人与事之间微妙复杂的关系，十分稳定地把握着，有力地烘托了田庄脚下的“土地”。“土地”身上现实主义精神强烈的时代元素中，无关时事针砭、只重于情。摊开中国文学史看看，这

与周作人的《人的文学》中“认为作家要正视人生”似有暗合，亦不乏《聊斋》中《蛇人》的蛇、《竹青》的乌鸦、《莲花公主》的蜂等的人情味。说著人情这一点上，《烟霞里》的布局是毋庸置疑的，处处挥笔在“人生”字眼。

人们常说，艺术就是表现。作家的所见所感全部表现出来，深入挖掘的真实存在，然后奋勇抵达我们的目光所不熟悉的艺术“土地”。当然，光是挖掘主角的真实“土地”是难以了事，除此之外，还需要有“灵魂”来添柴加火。假如把“土地”看作普遍性，那么“灵魂”就是特殊性，两者相得益彰、相辅相成。

从《烟霞里》来看，田庄的“灵魂”是含蓄的，是意象的。她不是酸味而不自知的孔乙己，也不是阴冷式的安特莱夫，而是符合真实的中国人。也正因此，她把蓬勃的情感隐匿于事物之后，巧妙地盗取生活中零碎的火种。初看似克制平淡，细品内含高山与大海，回味无穷——既有鸳鸯蝴蝶派章回小说、普罗小说、现代小说的影子，也有沈从文山明水秀的乡村风景、钱钟书巧妙的比喻。真实性所带来的生命力才最感人。比如，在林有朋没有给田庄电话时，她“常常一听到手机响就心惊肉跳”，更“有一度她是什么电话都接听，倘有未接电话，她还要打回去”；在抚着女儿的小脚掌时，她低下头哭了，“爱将她与世界连载一起，感官变得异常灵敏”，“但唯因爱过、被爱……啊，她想哭”。这些，都是符合田庄当时生活真实，符合当时她潜伏在心里的情感举止与人物性格发展趋势。

像我这样充满好奇心的人，最想彻头彻尾地了解这场暧昧情感事件。可糟糕的是，卷末竟做了收锋，驻足不前了。田庄并不知道那天在绿茵阁，是她和林有朋的最后一面，随后两人断了联系。这里，把田庄的暧昧情感写得既符合她成长的环境，又符合她纯粹的性格。不仅写爱情如此，许多其他关于情感的描写也都是如此。面临时代的洗礼，田庄经历了风风雨雨，“灵魂”始终不变。

田庄一路走过，有人怀着敌意，有人带着荣耀，但都将回归生活本质。她身上的“朴素之美，莫之与争”的浅深应用已向大家指明通向平凡生活情感之维度的路径。

轻计“理畅霞举”

啊！映璋！

云海遥隔，难阻惦怀之意。

江河长流，不尽离别之情。

日常的思念。

这是田庄台湾外公寄来的诗意家书。无尽的思念，最后只得借用李商隐的“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来聊表。一种日常的实际：田庄对素未谋面的台湾外公没有概念，因此在读罢他的信，最先想到的是七里村外公，心有恻隐。她想那个高高瘦瘦的、最沉默寡言的老人，想他此刻在干什么。她与这个老人是彼此有感情的，不善言语的他总以笑代替说话。思及七里村外公，田庄让母亲孙月华

要“一碗水端平”，她认为外婆隐瞒再婚的做法不磊落、有缺陷。

如王菲歌曲《我愿意》里的“思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如影随形”，这些日常的细节让田庄获得一套“玄”衣外表，甚至化身其中。如果它不在我面前暴露，我还在外围狩猎而不得要领。揽阅全卷，尽管《烟霞里》从未直面倾叙真善美，却早已“润物细无声”地把它们渗入了田庄点点滴滴的生活中。作为一个自由人，作者魏微始终跟随着田庄的行踪，慎而又慎地进行一言一行。我将这种跟随、慎重归纳为“润意”技巧。在《烟霞里》的轻重说中，“润意”是“霞举”的。所谓“词出珠联，理畅霞举”，“霞举”在这里意为高远。高远，也是《烟霞里》“轻重说”的另一个特点：“润意”高远，“叶形”高远。

现在不妨再来看看“叶形”高远。在《烟霞里》卷里，用得最多的形态就是朗朗上口的四字言，颇有直言以赋的气息。它既有《诗经》的格调，又有《红楼梦》的情调，还实现了古今的过渡。所谓“叶叶自开春”，我将它称为“叶形”。下面一段话便是“叶形”实例：

是各种难堪委屈，强作欢颜，四面楚歌，罢免突击。职场上各种勾心斗角，厚黑学也用上了。谁是天生厚黑的？没法子，不厚黑你就签不下单、评不上职称、升不了职。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常常笙歌燕舞，形同欢场女子，心里层梁、冷漠……慢慢就跑到脸上来了，一不小心就会青面獠牙。

这段叙述，在保持四字言的前提下，也带入了现代化的情绪，细微之处，俱是精妙布局。从《诗经》开始，诗词就以美丽的比喻和巧妙的构思吸引着人们的兴趣。杜甫说“枝枝总到地，叶叶自开春”，世界上没有两片叶子的形状是一样的，就如同众多作家的创作也是没有一样的。“叶形”文字是有冲击力的，它建立在真实生活的信条上，展现对灵魂的拷问。这是魏微的本事。这本事就在她能细致地观察现实生活中那些纤细的叶子。千万片叶子，在她手中，巧妙地剪辑并散布到田庄的生活里——

十七岁的田庄，看《乱世佳人》，也读《飘》，字字珍惜原著的恋爱场面，“把食指抵着下颚，时不时就会微笑，白痴一样”，她也爱上了那个跟着旧世界一起坍塌的老派人卫希礼。而后，她坐在院子里，遥想“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灰色是她最安全的颜色，她也如唐吉坷德般做出过很重要的行动：成绩不差，自甘边缘。生活永远是活生生的，表现活的生活的文学也是活生生的。出于田庄自己的意愿，她满怀梦想又叛逆，时而是孤高自许的林黛玉，时而又是行为豁达的薛宝钗，出世入世彷如一只在寻找鸟的笼子。通过一系列的布局，笔路写意：田庄的形象越来越清晰，可悲可喜、可惊可怪、可浅可深。

生活是无声的艺术，是“哑”的诗，“霞举”的情感就会成为表达生活中主角们思想的语言。如何研究语言？真实地创作，往往让人出人意料又深感意料之中；

符合生活实际，用生活中的一草一木来关注着生命，让读者看到、学到更多的东西。这也是作家的一种珍贵技能，我视作文学修养的表现。只有向自然、向生活学习才能做到这一点。

看《烟霞里》，不能不记住这一点。

轻有“平生烟霞心”

田庄的生活在继续。是的——而且一个人一旦有了“烟霞心”，就会同她的原轨道分道扬镳。兴许直到永远，两者也断然不会再有缘分相遇了，多少让人觉得不够尽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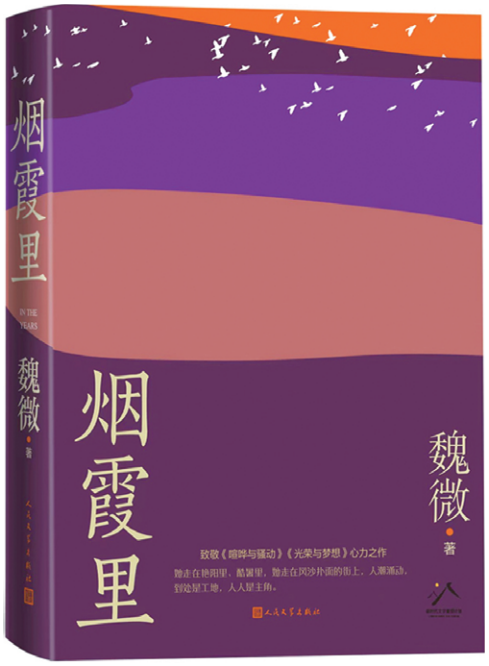
“烟霞心”最早出现在明代文学家冯梦龙的《喻世明言》，它还有一种更特殊的内涵。它常描述一个人心胸开阔、豁达乐观，能够欣赏和接纳美好的事物，不受困扰和束缚。我把这个词拆分为烟霞与心，即生活烟霞里的爱心。鉴此，我把“烟霞心”视作“轻重说”的第三个特点。

当田庄的肉身来到广州，“热火朝天，身上动辄出汗，黏搭搭，不干净”，她才体会“冲凉”的意思，“心浮气躁，必得拿凉水浇浇”；后来她成了作家，写了《女生之恋》赚得第一笔外快，可她认为自己“因为不自恋，所以也当不了作家”。“勤恳耕耘、不问收获”，这也成了她“往后做学问的毛病”；在母亲的软磨硬泡下，她瞒着王浪，“以艺济家”赚外快处置家事；母族家庭“败象丛生”，她“冷眼旁观，长叹息”父母年迈“不省心”；她漫不经心地执行着她义务，与母亲吵得“不死不休”。田庄一直在斗争，可是没人知道。往往是，斗争的最后，她觉得“亲情真是伤得起”，不会绝，“不过隔两天，一家人又好了”。

这些是田庄的矛盾，也是她的爱。爱存在于她的亲情、友情、爱情、事业等等，爱从不在生活中离场。爱在叙述的对象身上，在生活中表征的任何人与事上。在现实生活的持续开引下，魏微肯定爱的权利，肯定创作与想象之间的轻重联系，探索田庄的“平生烟霞心”，通过爱来赋予田庄社会性：她在看待人们眼里值得尊重的诸如爱的问题的时候，视觉“繁梢襞积”，她情感的风暴猛烈袭击生活的种种约束和血亲之间牢不可破的结合，将受到严峻的考验——那是什么样的考验？

“爱恰恰令人更自尊，”田庄说，“丧失了尊严的爱，宁可不爱，根本那也不是爱。爱是途径，通过他者来进行自我确认，获得尊严。”通过这些透视、明暗、解剖等方法，田庄模糊的情绪在烟霞中炙热起来。锻炼得十分结实的身子懂得她的任务。因此，我也越来越愿意跟着田庄的轨迹行走。她三十八岁脑膜中的襞积对我阐释“烟霞心”的理解，她在低头翻来覆去看林有朋信息，“一字字看，一句句看，汉字真是可爱，微妙极了，太丰富，太多意，一字字很清楚，但合起来就糊成一片，我让你猜去。”就如她的想法，大概是“胸中襞积千般事，到得相逢一语无”，有太多的襞积可挖掘。

襞积有学。



《烟霞里》　魏微 / 著

在我看来，田庄的“烟霞心”是襞积的。她在《烟霞里》中的任务就是观察、思考、理解生活中正在发生的事情。随着生活的骚动与不安逐渐展现，让情感以出奇的速度发力。为什么魏微要让田庄身上漫过一桩桩时代事件？因为作品中也浸透了作者的感情。为了加码年代的重量，凌波微步、轻托意深，也为给我们呈现一个情感稳定的平凡人。如马克·吐温所说“稳定是智慧的能力，是冷静行事的基础”，田庄对爱的见解与处理也见证了一个 70 年代女性的“肉与血”以及她转动着的智慧。在这里和在那里，让人深深受到田庄的这种“生气”的感染。

再者，这也是《烟霞里》志趣所在：以文、诗、词，悲、喜、惊、踏、伴、拂、锁等造就魏微与田庄这对人生知己。至于这对知己之间的情感襞积的繁梢关系中，诸多历史事件是否过于厚积，是一件捉摸不透的事情。我不想做过多的揣测，留下一些责任没有尽到——因为任何一个人都不能为别人的心是热还是冷作出判断。

“这中间她迎朝霞、看晚霞，毛毛细雨天，雾蒙蒙一片，像烟霞，真是好精致”，《烟霞里》正在传出多处扣人心弦的烟霞时，我也正在产生无数的遐想。可就在我某个想法还没成型时，田庄的生命戛然而止了，还差三天就过四十一岁生日。

遗憾感推起了正在上升的激情，激情又增强了遗憾，悲喜交集的情绪不可遏制地包围了我。我一度感到不可容忍，但又不可执一论，于是继续往下翻看——

每个人身上都有时代的光影，阳光落在人身上，无论英雄、为人、平凡人，脸膛一样亮堂，影子差不多短长。

读罢多少有些涌动。对于死亡的黑暗，《烟霞里》的“轻重说”用光亮去把田庄内心的黑暗引开，尽管无法逃脱自己，但她一直是“温热”的。延续，献身于生活，以终为始。田庄的生活或许有些地方可以快进，但缓慢就是她的生活节奏。她误入烟霞，也将被遗忘在她的自然状态之中，然后像散步者一样，在某个角落正养精蓄锐，丝毫没有减轻她生活的分量，委婉如“轻舟已过万重山”、淤积于心如“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她是人——更人性的……

生活或者战斗
——关于世宾和他的诗歌

文 / 游子衿（中国客家文学院专业作家）

认识世宾是在他年轻时候，20 多岁，大学毕业后骑着一辆摩托车，每到周末就从鹤山往广州跑，去见他的诗友们：东荡子、黄礼孩、温志峰、浪子、陈小虎、江城……那时候他和广州的一帮诗人一起办了一本诗歌民刊《面影》，而我在梅州办了《故乡》，我们因此相识。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广州的一个夜晚，在一条散发着臭气的河涌边，喝啤酒聊诗歌。那晚还有陈初越、张郁晖在一起，约好的江城没来。

见面之前读过世宾的诗歌，感觉是一种质朴的抒情。他的诗歌里没有太多的象征、隐喻，以及其它一些炫技的成分，而是直接走向言说的中心，会有一些技巧的成分，但都是为了言说得生动而出现的。这样的诗歌，既不那么前卫，也不显得落后，决定诗歌质量的，往往是它展示了什么，而不是它怎样去展示。这是世宾的诗歌的一贯风格。我们今天读他的诗歌，和他初次出现在我们面前时相比，在风格上看不出有丝毫的改变，他一直就是那样写诗的。我曾多次批评他数十年都在用一种方式写诗，看不到改变，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情。现在想来也许没有必要，因为每个诗人的写作方式都不同。

世宾

当然那晚没有说起这些。20 世纪 90 年代的广州，处于葳蕤勃发的状态，荒地上冒出了新绿，充满了生长的欲望。这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话题，这些话题当然与诗歌有关，但散乱，缺乏方向性，初越感到言不投机，中途告辞。我当时也是孤身走在现代主义旷野上，还没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写作方向，已经许久没有写诗。所以那天晚上到底谈了些什么，我已经彻底

忘记了，只记得世宾喝起啤酒来是一把好手，一瓶一瓶地干下去……

那晚的他只是谈论，并不像后来显得那么好斗。

世宾是土生土长的潮州人。潮州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也是著名的华侨之乡，有深厚的文化积淀。小时候的世宾长了一张圆脸，虎头虎脑的。父母都是教师，他几乎也走上了教书育人的道路，但最后，他成为一个诗人。

我看过他中专毕业在小学教书时的照片，戴着一副眼镜，青春羞涩的微笑，让他看起来还有一点儒雅，但在我第一次见他时，那一点儒雅已经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青年奋进的气息，还带着一点莽撞与迷惘。他几乎不谈诗歌之外的话题，但他和那个时候在广州的诗歌兄弟一样，每次见面都在喋喋不休地谈诗，别的诗人几乎无法参与他们的讨论。我曾在一个夜晚去圣地居的一家大排档见他们，在场的还有东荡子、老刀等人。老刀喝醉了，拿着手机在和前妻没完没了地争辩着什么。世宾和东荡子在讨论诗歌，但我听了很久，也没弄懂他们到底在说什么。并不是我不具备理解的水平，而是他们显然围绕这一个问题谈了很久，导致这个话题已经失去了方向。

东荡子无疑是对世宾影响很大的一位诗人。他是一位出色的诗歌鉴赏家。因为僻处梅州，和他们一起的机会不多，我不清楚他在诗歌道路上具体给了世宾哪些建议。相比他们的作品，能看见一些接近的东西，尤其是世宾这些年的诗歌，似乎更接近了东荡子诗歌中的某种艺术特征。但他们长年累月关于诗歌的谈论的细节，外人是无从得知的。世宾无疑非常珍视这份友情，在东荡子去世后，他付出了非常多的时间与精力，为这位老友做了很多有价值的事情。

我和世宾同岁，说来也是同一茬出道的诗人，但我们在诗歌写作上极少交流。这不仅仅是因为地理位置上的阻隔，更多的是性格的原因。我和世宾与其说是诗友，其实不如说是生活中的朋友，我去广州时必定会去找他，他也会到梅州来找我。我们在一起游游荡荡，吃饭喝酒，一起处理爱情生活中的麻烦事。至于诗歌，各写各的，很少拿到桌面上来讨论。前一阵子在潮州举办世宾新诗集《交叉路口》的交流会，评论家陈培浩说，我和世宾写的是完全相反的两种诗歌，这话没毛病。也说明诗人之间其实不需要有同样的艺术追求，才可以做朋友，只要在品格上彼此认可，相处起来心里舒服，友情就可以持续下去。在广州的诗歌圈里，世宾经常强调诗人交往的基础是“友谊和诗歌”，友谊就是气质、性情相投，使人在一起快乐；而诗歌使人深邃，两者互相深化。

我想世宾的诗歌风格和他的性格有关。相比很多人，他的心思单纯得多，因而也勇敢得多。他的勇敢体现在对生活道路的选择上。在华南师范大学毕业后，他在鹤山市政府就职，正儿八经的一个公务员。后来，他辞职了，具体原因不得而知，但可以想象，这个选择本身是需要勇气的。辞职后，他进了《南方都市报》当

编辑，在广州租了一个简陋的楼顶单间住下。这份工作没干多久，又辞职了。具体原因依然不得而知，后来约略听他说起，对报社的人事关系并不能适应。书生意气，大抵如此。其后打过一些零工，收入不稳定，生活想来有些困顿潦倒。那时候和他偶尔通一下电话，也感觉到语气的低沉。

勇敢是需要付出代价的。还有这么一件往事——

世宾在读大学的时候，有一次在校门口遇到几个“白粉仔”在纠缠一个女学生，路人都敢怒不敢言。世宾路见不平，上前喝止。一番争执后，双方约定时间地点决一胜负。结果是世宾依时前往，“白粉仔”却不见踪影。如果说，这是少年意气使然，还有一件事，则是内心正义的选择。多年前，世宾的一位女同事不堪同单位败类欺压，出具一份声明，以证自身清白，请求单位同事签名作证。世宾了解事情的原委，痛快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他的这位女同事后来跟我说起这件事，说：“我一辈子都会尊重世宾。”

这份尊重当然也影响了我。

我的生活中缺乏这样的勇者，我自己也不是。我的勇敢只在诗歌生活中存在，在社会生活中我是一个软弱可欺的人。

在诗歌生活中，世宾当然也是勇敢的。

世宾是一个使命感很强的诗人，他一直都要求自己的诗歌介入社会生活，成为嵌入这个时代的一块砖。可能很多人还记得，在新世纪之交，世宾在广州发起了“诗歌污染城市”的运动，组织一批诗人，把印成传单的诗歌贴满了广州的大街小巷。这个运动是成功的，为越来越小众的诗歌狠狠刷了一把存在感，市民和媒体都给予了足够的关注。据说他们在贴传单的时候，相关部门人员发现了，也就不失礼貌地劝阻，并没有过分地对待这些举止怪异的行为艺术家们。

但在诗歌写作上，要成功地嵌入这个时代并不容易。2009 年，为寻求突破，世宾躲进小洲村三个月，写出了一批现实题材的诗作，对当时发生的各种社会现象、事件进行诗歌还原与批判。结果可想而知，那批诗歌写得更具有新闻价值，而不具备诗歌价值。包括他那首很多人都读过的《碎了》，还遭我专文痛批。

理念上的形成是容易的，技术上的抵达则需要长时间的磨练。广州是一线城市，来来往往的诗人不少，带来各种诗歌理念的碰撞，身处其中，内心的骚动应是持续不断，紧迫感油然而生。但这种快节奏，却常常破坏了诗歌写作者应有的状态，那就是：沉潜，还有就是放松。一个诗人，如果内心里有个声音，时刻告诫自己：我应该写什么，我不应该写什么，那就是另外一种不诚实，会毁了自己。巴别塔不可能一天建成，建造巴别塔的技术也需要长时间的积累。

那时埋头硬闯，却又找不到出路的世宾，内心应该是苦闷的。但那时候广州的诗歌生活，却又是丰富多彩的。入夜，诗人们会聚集在一起，大约是世宾、东荡子、江城、黄礼孩、浪子、安石榴这么

一些人，喝酒，聊天，一群人站在午夜的街头，唱起忧郁的歌。歌词大多是自己写的，我曾听世宾唱起过这么一段：“……姑娘，今夜我们相对而坐，黑色夜空缀满星星，你为什么不说话？不说出心中的爱情？……”

他说，那是广州诗坛最好的时候。

2003 年，世宾和东荡子、黄礼孩共同提出了“完整性写作”的诗歌概念，并完成了作为其理论基础的专著《梦想及其通知的世界》，这本书于 2005 年在民刊《诗歌与人》发表，2009 年正式出版。随后，由世宾、陈培浩主编的《完整性写作（上、下卷）》出版，汇集了主编者以及耿占春、谢有顺、夏可君、王小妮、蓝蓝、沈苇、朵渔等国内一众大咖的理论文章和诗歌作品，为“完整性写作”站台或背书。当时，我已读过世宾完成《梦想及其通知的世界》的初稿，对其观点表示认同。事实上，关于“完整性写作”的核心提法，几乎所有的人都是无法不认同的。

——“完整性写作”的首要任务就是对创伤性生活的修复，使具有普遍性的良知、尊严、爱和存在感长驻于个体心灵之中，并以此抵抗物化、符号化和无节制的欲望对人性的侵蚀。通过对现实的评判而抵达人的完整，以人的完整照亮现实的生存，直至通过语言重新建构一个诗性的、诗意的世界。

——诗人在他的日常生命里，通过对人类文化的吸收，重建一种新的生命意识，或者说，从日常的、庸俗的生命意识和自我定位里抽身出来，建立一个完整的诗歌人格，以此观照世界，想象新的世界的可能性，并通过语言把这世界制造出来。

——“完整性写作”要求诗人不断地去追寻人格的自我完善，以良知去观照现实和想象世界，并努力通过语言去创造一个宽阔的、有尊严、有存在感的世界，努力抵达人类的精神深邃之处。

在我看来，世宾“完整性写作”的提出，更像是对这个时代的诗人提出了道德要求，以及对诗人使命感的重申。它本身不具备什么新意，但在当时口语诗、下半身写作等低智商写作泛滥的中国诗坛，它又是有针对性的，像一面鲜亮的旗帜，在邪风阴雨中树起，让人重新看见崇高和勇敢并未在中国诗歌中消失。当时尚健在的老诗人郑玲读了《梦想及其通知的世界》后，说了这样一句话：“有这样的诗人，在广州我不再感到寂寞。”

世宾和他的朋友们希望“完整性写作”成为一个诗歌流派，但至少目前为止，这并没有成为现实。一开始云集的诗人、理论家们，自然是表示了认同，但也仅仅是认同而已。对诗歌，他们都有自己已经成型的认知体系，或已经明确的诗歌道路，不可能中途弃之。况且在技术层面，它没有足够地体现挑战或打破现有写作方式的力量，使“完整性写作”停留于一个目标，或一种理论，没有更长久的追随者去实现它。或许世宾也一直在用各种方式做一些努力，但近年来，我已经很少听他谈起。

又或许他是不愿意跟我多谈，因为每次和我说起诗歌，若我真实地说出自己的观点，我们总是会有一番唇枪舌剑，然后就是我很快选择沉默不语。其实他不知道，我是“完整性写作”的认同者，并觉察到它的时

代意义的。但我依然有我自己的路要走，认同是一回事，追随又是另外一回事。其他的诗人也大致如此。尤其在广东，一个明显的现象是，诗人们在一起兴致盎然地谈天说地，回去各写各的诗歌，要他们抱团前行，基本是不可能的事。

但是世宾选择了一种决然的姿态。几乎在任何场合，他都以不容置疑的口气，宣扬他的诗歌观点，不容别人反驳，也不容别人保留，缠斗到底，完全是一副不获全胜决不收兵的姿态。结果是那些年月，我好几次都看到这样一个场景：周围的人，坐着的，站着的，等他说完，都不再说话。长时间的静默后，世宾站起来，一个人离开，完成了一个诗坛孤勇者的造影。

“完整性写作”的实施，需要时间，需要一批更年轻的诗人，从更早的阶段，走上这条道路。

但“完整性写作”对世宾本人有着不一样的意义。当时，他从浪子、黄礼孩等人的书堆中抱走了所有具有参考价值的书籍，黄卷青灯，呕心沥血，二十多年来一直在创建和完善这个理论体系。在东荡子去世后，他又往前推动了一步，提出“境界美学”。“完整性写作”的每一个节点，都深深浸透在他的血液里，在生命中流淌。他以后的诗歌创作，都是遵循着其中的准则。

2022 年，离流逝的岁月最近的一年，世宾的诗集《交叉路口》出版。

他的家乡潮州为他举办了诗集分享会，我应邀参加。潮州和梅州是毗邻的两个城市，都是华侨之乡，一衣带水，潮客文化相互交融，两市的诗歌界一直来往密切，诗人们更是哥哥、妹妹、姐夫之间的关系。举办一些重要的活动，都会互相邀请，不仅仅因为世宾是我多年老友。

我们在宽阔的韩江河畔见面。1969 年出生的世宾已经 53 岁了，减肥成功，让他的身材显得修长挺拔了些，依然是留着胡子，但和鬓角一起，都有些花白了。他的脸上带着微微的笑意，眼睛偶尔会看着风吹来的方向，看起来不像以前的斗志昂扬。我比较喜欢他现在这个样子，一个诗人，不要总是像一个战士。

分享会举办的时候刚好遇上 2022 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揭晓，法国女作家安妮·埃尔诺获奖，其获奖理由为：“以勇气和临床医生般的敏锐，揭示了个人记忆的根源、隔阂和集体约束。”勇气，这个词再次来到我们面前。杨克在发言中分析了中国作家在诺奖评选中的一些情况，关于理想主义在诺奖中不断被强调等。分享会并没有沿着诺奖的话题延续下去，因为勇气和理想主义精神在世宾的写作中并不缺乏。我翻阅了一下《交叉路口》里面的诗篇，看见世宾类似《光从上面下来》这种大而无当的诗歌其实是比较少了，他已经更多地关注那些具体而平凡的事物，从中发现一些微小的诗意并提升其价值，体现自己对“完整性写作”目标的趋近。

这未尝不是一个真正令人欣慰的转变，主持分享会的陈培浩也在这方面为他做了辩护。面对我和诗评家向卫国的批评，世宾也没有机会为自己说什么。我想这也没什么，每一个成熟的诗人，都知道自己的灵魂被什么所笼罩，星空广阔，无需争辩。

从长篇历史小说《赵佗归汉》看张况的历史题材创作

文 / 苟文彬（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张况几十年来一直专注于历史题材的创作。从历史文化长诗《大秦帝国史诗》《大汉帝国史诗（上下卷）》《三国史诗》《大晋帝国史诗（上下卷）》《大隋帝国史诗》《大唐帝国史诗》，到今天的五卷本长篇历史小说《赵佗归汉》，张况坚持用自己的笔在一个个历史朝代里耕耘令人心驰神往的故事。那么，究竟是什么驱使张况深入中华民族历史、解构时代华章的呢？带着这个问题，我走进张况位于广东南海的南华草堂，一边品茗，一边聊他关于历史文化题材写作的那些事儿。

笔者：您是广东五华籍的岭南作家，因为您在诗歌尤其是历史长诗方面的创作成就，而全国知名。著名诗人、《诗刊》原主编叶延滨老师更称您为“以独标风骨的历史文化长诗写作轰动诗坛，为当代新诗构建了重要的历史地标的诗人”，我想听听您的诗歌创作经历，又为何如此关注历史，走上长诗创作这条道路的。

张况：我八九岁就喜欢看历史连环画，如《三国演义》《水浒》《岳母刺字》等，对那些历史故事、励志故事很感兴趣，捧起就放不下来。课余我喜欢现炒现卖，与小伙伴们分享，他们听得入迷，我心里就有成就感，因此萌生了要读懂中国历史的念头。从那时起，我对中国历史

张况，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常务理事、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

梗概就有了最初的认识，中国历史文化对我有巨大的吸引力。另外，从小学阶段起我就喜欢古诗词，常常被古诗词的优美意境浓缩语境所吸引，那时我也尝试写些好玩的顺口溜。我想，这就是我最初的诗歌“写作”吧，对我日后的诗歌创作无疑奠定了基础。我的文学启蒙最早始于《唐诗三百首》《三国演义》，我在小学三年级就读完了它们，甚至能记住里面的任何一个细节，这是童子功。

研究中国历史多年后，我觉得不能荒废了自己的历史储备，就开始思考如何将中国历史与诗歌创作结合起来，实现史与诗的转化。考察中外文学发展史，我认为，伟大的中华民族太需要一部体量够大、足够恢弘的史诗！大约 1996 年夏秋之际，我发了宏愿，这部史诗就由我来执笔吧。《中华史诗》选择了我，让我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单挑《中华史诗》工程，这或许是一种文化自信和自觉的宿命吧。事实上，中国非常缺乏具有历史影响的真正的全民族史诗，除了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蒙古族史诗《江格尔传》和新疆的《玛纳斯传》之外，似乎再没有更像样的史诗可供挖掘和品鉴，至于全民族全景式的史诗，迄今为止，尚付阙如。作为一名具有冒险精神的诗人，我愿意承担这一重任，体制对我也无羁绊，这一点是很多人难以做到的。我在解剖中国历史和解剖自己的思想中，获得了独一无二的话语权，在自己的语言王国里畅行无阻，用自己的鲜血和思维切入历史、接驳文字、探寻根柢，用青春的汗水和热血浇灌文字，挖掘历史最深层的宝藏。我用自己的灵魂去跟历史抢滩、对抗、对话、妥协，这让我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极为自豪的历史表达畅快感和文化的享受感。

中华文化是大海，但它可以凝结为我的一滴泪、一滴血，我把它量化、分解、发掘、展现出来，糅合人类的精神呈现在诗行中，便成了我的作品不可复制的品质。史诗写作，可能是个异数，似乎也是天意。经过近 20 年艰辛创作，于是就有了洋洋 10 万行 21 卷的《中华史诗》宏大叙事作品问世，已出版的《大秦帝国史诗》《大汉帝国史诗（上下卷）》《三国史诗》《大晋帝国史诗（上下卷）》《大隋帝国史诗》《大唐帝国史诗》都是《中华史诗》的子篇。实际上写作《中华史诗》是为大中华立传，是为国家写作的一种状态。《中华史诗》是我生命最重要的呈现方式之一。“中国历史文化长诗”写作概念是我的“首创”和文本贡献，它承载着我的家国情怀和“新古典主义”写作理想。

笔者：就在大家为您创作的历史长诗叫好鼓掌时，您却推出了《赵佗归汉》这样一部逾 200 万字的历史长篇小说。《赵佗归汉》与您的其它历史题材长诗作品不一样，在于其以长篇小说的方式，完成诗歌或者长诗之间的文本转换。这不得不让人沉思，您在文学书写方面的更多可能性，带给同行文学创作路径探索的新鲜感，紧迫感。我认真阅读了《赵佗归汉》，发现您在长篇小说创作上也达到了

张况著作《赵佗归汉》

相当的高度和成熟度。那么你在诗歌与小说体裁转换的过程中，有什么特别的体验与技巧分享给大家。

张况：在我看来，文学艺术是相通的，各文艺门类之间完成转化是完全可能的。史诗写作不仅仅是对诗人知识储备、文字驾驭能力和胸怀格局的考验，同时也是巨大的心性与精神量能的巨大考验，如何打通诗歌、小说与中国历史之间的血脉、正史与演义之间的界限、艺术与真实之间的距离、宏大与个体之间的内在关联、家国情怀与个人情愫之间的内涵与外延，确实需要诗人巧妙的构思与大开大合的布局。史诗与历史小说写作最大的困难，就是如何将以往的历史盘活，将逝去的历史人物逐个救活，并将朝代与朝代之间的纽带关系处理好。我认为需要重返历史现场，站在他们的角度，与他们进行友好协商、平等对话，替他们重新活一遍。诗人的思维是天马行空的，小说家需要的是缜密的逻辑思维，我将两种思维结合起来，自然就完成了诗歌向小说的转型。

不管是历史文化长诗，还是长篇历史小说，一个作家只要专注于自己的专业领域进行创作，以鲜活的人物、新颖的故事、鲜明的特色让笔下的人物在读者脑海里立体凸显出来，就能讲好故事，塑造好人物，就能创造出不负时代的优秀作品。我成长在岭南文化的发源地佛山，工作生活在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站立在岭南文学高地，以文学斗士之笔捧出《赵佗归汉》，让我更清醒地认识中国历史、岭南历史，既让我保持着对历史的敬畏与传承，又充满了对民族振兴、国家完全统一的美好憧憬。这样的创作，我认为是最有生命力的文学创造。

笔者：广东五华是一个流传着南越王赵佗许多传说的故事生发地，封存着长乐台等众多与赵佗相关历史遗存的神秘宝藏，是生于斯长于斯的岭南后人敬仰与骄傲的地方。五华这块神奇之地，在您的文学创作中究竟有着怎样的分量，南越王赵佗对您有什么影响，为何将写作聚焦在赵佗这样一位“中国第一南下干部”身上？

张况：我是梅州五华客家人。家乡五华置县近千年，这里人杰地灵，出过不少文人墨客、知名人物。小小一个县，历史上就曾出过武状元一名，武榜眼一名，文武进士一百多名，出过国共两党将领 70 余名、副省领导 7 名、中国工程院院士 1

名。通读五华历史，我赫然发现了南越王赵佗在我家乡的最早“行踪”，对五华这块神奇土地，对赵佗这位神秘王者，我有着极为神圣而复杂的情感，觉得有生之年一定要好好写写南越王与五华的故事。西汉长乐台（五华狮雄山遗址）是赵佗在岭南所建的四大行宫之一，该遗址位于广东五华县华城镇塔岗村，1989 年被列为省级文保单位。这一遗址的发现，填补了南越国早期的部分历史空白，在岭南文化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正因为赵佗的部分故事发生在我家乡，因此我觉得有必要对他进行历史检索，以丰富那段令人遐想的恢弘历史。

我对赵佗带领南越国回归汉朝，有着天然的家国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读者可以从《赵佗归汉》中，感受到我创作的虔诚与敬畏。《赵佗归汉》是以赵佗征战岭南、统治岭南、归顺大汉为背景的长篇历史小说，延续了我文学创作钩沉民族历史、解构时代华章的风格，唤醒读者对中国历史长河发展与进步的记忆，催生出强大的民族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振兴的正能量。《赵佗归汉》以近乎大半个世纪的时间跨度，通过塑造秦汉两个朝代里的秦王政、赵佗、李信、王翦、赵高、李斯、胡亥、扶苏、项羽、刘邦、吕太后、陆贾等人物形象，从各自的人生遭遇互为补充、互相依存的视角，展现了秦汉时代中原与岭南百越那些波澜壮阔、惊心动魄的战争历史，揭示了在国家统一、民族存亡紧要关头，中华儿女深明国家与民族大义，政治与理想都接受了战争与鲜血的磨砺和洗礼，树立起的民族之魂，理想之魂，信仰之魂，团结之魂。这些人物也许只是中华民族漫长历史战争中一小部分，但我们不能随着时间的流逝忘却他们，而应该沉入历史，深挖他们背后的故事，在新的时代开创新的历史题材文学创作路径。透过这部小说，你可以看见赵佗这位“南下干部”的身影，自幼就深刻在我的脑海，且我们具有一样的人文特质，只不过赵佗是在征战、和辑百越的战争与治理岭南中实现民族统一，我则是在激情中筛淘历史浪花，以饱含深情的笔触，呼唤与期盼国家完全统一。

笔者：毫无疑问，当《赵佗归汉》这部鸿篇巨制呈现在读者面前时，我们发现您确确实实做到了。您用怎样的视角来结构历史的场景和人物？这样的视角是否能发现更多的东西？

张况：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共置三十六郡，其中三十五郡皆毫不含糊，就地起名。为何秦皇平定岭南后，独独要设立“南海郡”而非“岭南郡”或“五岭郡”，小说对此进行了有理有据、惊心动魄、荡气回肠的历史回溯，为“南海归属中国”提供了最早的历史依据、逻辑起点、价值拷问和心理路径。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可谓广有四海，偏偏在平定岭南之后，一定要设立一个独一无二的“南海郡”，证明秦始皇对南海高看一眼、极其重视。自秦置“南海郡”始，茫茫南海从政体上、法理上就属于中国。毫无疑问，秦始皇当年为此颁过诏、下过圣旨。

小说以高度的政治站位，高度的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以当年秦始皇与群臣议决设置“南海郡”的场景为切入口，为我国史学界提供了一个极有史学意义的研究方向和路径，我认为这是《赵佗归汉》最闪光的历史贡献。这也是迄今为止为“中国拥有南海主权历史”正名的最具说服力的一部长篇历史小说。小说巧借秦始皇之口，道出了大秦帝国当年设置南海郡的初衷，就是要将茫茫南海纳入大中华版图，从而让大秦帝国实现“广有四海”的宏愿。借赵佗之口，道出了南越国回归汉朝归于正统的历史大势，并以合乎逻辑的事态发展格局、雄辩的历史事实，将包括宝岛在内的茫茫南海以大秦帝国意志，雄霸地框定在二千多年前的中国版图上，南海归属中国的历史依据，非常客观而自信地往前推进一千多年。这是《赵佗归汉》的新时代政治站位和实质贡献，是中华文明史上铁一样存在的历史事实，是当代作家对中国历史担当责任的具体体现。

笔者：《赵佗归汉》第三卷第三十九回“秦皇出巡察民情 徐福寻仙觅仙丹”，史书亦有记载，可以说是历史上最早关于出海的国家行为，徐福出海不归的传说，也可以说是徐福率领的中土人士在异国他乡成了华侨。我们知道，您的家乡梅州也是华侨之乡，也有优秀华侨后裔成为他国领袖。您认为华侨之于国家统一、民族振兴有何重要意义？

张况：徐福是秦朝著名方士，齐地琅琊郡人（今江苏省连云港市），相传也是鬼谷子的关门弟子。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 219 年），徐福受秦始皇之令，率童男童女三千人东渡瀛洲，为秦皇寻找长生不老之药。《日本国史略》也有这样的记载：“孝灵天皇七十二年，秦人徐福来……”这是有着确凿历史记载的一段史实。

以此观之，徐福不仅是人类驾驭海洋的历史第一人，也是开启中日文化交流历史的第一人。仙山仙人仙药皆为虚妄之说，这世上哪有仙药？秦始皇一心想要江山永固，自己能够长生不老，因此耗资巨大，不惜成本让徐福去寻找所谓的仙山仙人仙药。徐福率众出海数年皆无收获，他料定找不到仙药，秦始皇肯定会“咔嚓”了自己，于是他干脆一走了之，留在瀛洲不回朝复命。他在平原广泽上居住下来，并在“崂山”留下后代。自立为王的徐福逍遥自在，他将秦朝农耕、捕鱼、捕鲸和沥纸的技术方法传到当地，使之得到发展。也有一种主流说法，说是徐福死于大海之中。当然也有说徐福就是现今日本人的祖先，总之莫衷一是。不过，时至今日，还不少日本人到徐福老家寻根问祖、祭拜徐福。从这一角度看，徐福确实是“中国华侨第一人”。

记得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曾说过：“华侨乃革命之父。”他对华侨尤其看重，且有着高度的评价，这绝非偶然。事实上，华侨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力量，他们在侨居国发挥着民间大使的重要作用，处处维护中国核心利益，尤其在两岸统一问题和涉“港、藏、疆”以及南海

等国家主权问题上，都表现出令人钦佩的凛然气节和坚强意志。我家乡梅州出过不少有影响力的著名侨领，他们对家乡发展、国家统一做出过可圈可点的贡献。总之，华侨为国家统一、民族振兴，发挥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心系故国，贡献良多。无论抗日战争时期，还是解放战争时期；无论新中国建立之初，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无论改革开放初始之时，还是全国迈入小康社会的今天，华侨总都满怀爱国之忱，与祖国人民同频共振，为民族的振兴繁荣、为国家的伟大复兴而同舟共济、不懈努力，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和赞许。

笔者：几十年专注于历史题材写作，给您带来了什么？您认为我们应该怎样去阅读历史，创造历史？

张况：在我的精神世界里，以文学的形态书写历史是我一生的宗教，是我的第二生命，也是我今生最重要的表达方式、存在方式和生活姿态。我对中国历史和历史上的那些英雄人物非常崇拜，并深受他们的影响。数十年研究中国历史，并始终如一地专注于中国历史题材写作，给我带来的是“史诗”写作的精神满足和文本自觉。觉得中国历史上的英雄们热爱祖国山河，情系黎民百姓，有一种深沉的爱国情怀，他们的英雄主义行止，干事创业的奋斗精神，值得推崇与效仿。因此，我从小就注重培养自己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家国情怀，懂得了国与家的关系，循着他们的风度，学习他们的爱国主义者精神和

张况在“广佛同城共读一本书”交流会现场上分享自己的新作《赵佗归汉》

儒雅浪漫，成为我的一种自觉。小时候做人处事就能不卑不亢、张弛有度、讲究诚信，长大了更是尽量要求自己能做到宠辱不惊、心无增减、笑看得失。

时人逐利，精致利己主义者有之。我认为当代国人应力戒浮躁，尤其是青年写作者，真的应该好好补上中国历史这一课。从中国历史中寻找精神依托，发现精神家园，挖掘历史资源，接通历史与现实和未来的血脉关系。中华文明是最坚强、最具耐久力和不朽品质的伟大文明，汉字显而易见的生命力和穿透力可以作证。我作为一个个体，由此一而再地认识到了中华文明无比庞杂壮硕的伟大与宽博，也顿悟了“死亡”和“时间”的全新概念，“时间”由此而成为内置于我的历史题材写作文本的贯穿始终的永恒话题和持久坚挺的主题。我相信，中国青年也一定能做到。

荧屏凤凰侯玉婷

文 / 牛涛（广东省侨界作家联合会副秘书长）

青涩年华

20 世纪 50 年代末，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改天换地的激情岁月，侯玉婷出生在北京一个知识分子家庭。这是一个充满温馨与和谐的家庭，父亲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教授，母亲是校务办公室职员。侯玉婷从小就生得清丽可爱，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惹人怜爱，因为在家排行老四，亲友们都亲切地唤她“四儿”。

国家一级播音员侯玉婷

儿时的侯玉婷，就特别有表现欲，经常手舞足蹈。侯玉婷从小就和播音结下了不解之缘。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代播音员，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著名播音员费寄平恰好就住在侯玉婷家对面的单元楼里。侯玉婷特别崇拜费寄平声音的抑扬顿挫之美，经常缠着费寄平。费寄平看这个孩子有灵气，又热爱播音，抽空就教她朗诵，遇到生僻字，还会让侯玉婷反复熟读。可以说，费寄平是侯玉婷播音人生的启蒙老师。

转眼间，侯玉婷就长成了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一次机缘巧合下，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导演在海淀区红星照相馆橱窗里看到一位小姑娘的照片，觉得她长相甜美可人，几经周折联系到侯玉婷。因此，侯玉婷的第一次荧屏结缘，是在电影《拔哥的故事》。她在电影里扮演了一个戏份不多的角色，但也受到了许多观众的关注。后来因家人不支持，侯玉婷与影视圈失之交臂。

追梦少女

侯玉婷虽然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但是她没有忘记自己年幼时的主持梦。她在报纸上搜罗各个电视台招聘主持人的消息，一口气报了中央电视台、解放军艺术学院等单位。她虽然没有经过科班系统的培训，但无论是选读的童话故事，还是歌唱的《洪湖水浪打浪》，都给评委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个女孩有灵气。当时广东电视台急缺主持人，来北京物色播音员的王淑明一眼就看中了侯玉婷。侯玉婷经过与父母商量，决定去广东发展，开启了她与南粤大地一生一世难解的情缘。

初到广州，人生地不熟，王淑明给予了侯玉婷无微不至的照顾，听她倾诉烦恼，指导她业务技能，帮助她渡过生活上的困难。多年来，她们像母女一般的感情从未断过。

为了尽快适应新生活，侯玉婷刻苦训练，每天对着院子里的木棉树吊嗓子，练形体，背台词，跟主持界各个领域的老师虚心请教。

侯玉婷在主持文艺节目

终于，侯玉婷第一次上镜的机会来了。那时候正值新中国成立 30 周年大庆之际，侯玉婷录制的一组文艺节目要在当天黄金时段参加联播。最终，她圆满完成了任务，一颗南国“荧屏明星”开始升腾。之后，随着一档档节目，侯玉婷走进了千家万户，走进了老百姓的心中。

荧屏常青树

转眼间，侯玉婷已在广东电视台历练了 8 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新文化新思想冲击着社会，侯玉婷成了这一代人的精神偶像。她甜美的长相，温润如玉的声音，端庄不失灵动的主持风格，得到了观众的认可。《百花园》《一曲难忘》《共度好时光》等 20 多个文艺节目都有她的身影，可以说，她红遍南粤大地。

就在侯玉婷对文艺类节目主持驾轻就熟的时候，一个挑战来了。1987 年，第六届全国运动会将要在广东举行。

当时，中央电视台已经确定好了宋世雄、孙正平、韩乔生三位“老牌体育解说”为全国运动会主持，计划选用一名广东电视台的女主持来搭档三位男主持进行解说。或许是侯玉婷自带“京派”气质，又或许是侯玉婷多年打磨的主持功底，经过一番试播，中央电视台拍板：“就她了。”

高兴之余的侯玉婷感受到责任重大。

她努力学习体育知识，虚心向体育新闻界前辈请教，用大量时间与搭档的三位老师进行磨合，确保自己能够“同频共振”。

那个盛大的日子终于来了，多位国家领导人出席。这天，天公作美，时任省长叶选平为侯玉婷打气：“小侯，天助我们，一切顺利！”

侯玉婷稳住情绪，走上演播台，以从未有过的激情和活力开始了直播。接下来的 15 天里，侯玉婷连续奋战，没有出差错。最令侯玉婷感动的是，开幕式结束后，李鹏总理与她握手并合影：“六运会开幕式很好，与你成功的主持分不开！”闭幕式结束时，叶选平来到直播间，兴奋地握住侯玉婷的手：“小侯，你成功了，你为咱们广东争了光！”

六运会后，电视行业迎来了春天。1988 年，一个专门为电视节目主持人设立的奖项诞生了——“如意杯”。这时的侯玉婷主持各类节目都游刃有余，且她主持的节目深受老百姓的喜爱。她从全国 40 多家电视台 100 多位参选主持人中脱颖而出，进入了“如意杯”决赛。决赛现场，侯玉婷朗诵了一首自己创作的长诗《不枉此行》。“我似乎在梦中看到了南国的天边，升起一片希望的红云，于是便身不由己地奋起追寻。”这首诗歌抒发了侯玉婷从北京来到南方工作，一路奋斗不息的心声，诗歌朴素真挚，打动了评委。最终，侯玉婷捧回了沉甸甸的荣誉——“如意杯”大奖。时隔 3 年，举世瞩目的亚运会要在北京举办，中央电视台有意在地方台物色一位女主持人做现场直播。敢于挑战的侯玉婷再次向中央电视台请缨出战。因为有六运会成功的主持经验，还有宋世雄等老师的极力推荐，侯玉婷从无数候选人中脱颖而出，再一次成为幸运儿。

1990 年 9 月 22 日，北京亚运会盛大开幕，中央电视台进行直播，宋世雄、孙正平、韩乔生、侯玉婷联袂主持。连续 15 天的报道，侯玉婷除了做直播，还要跑比赛现场采访，整理赛况。比赛直播有很多“突发状况”，比如中国队与泰国队的比赛本来没有安排直播，但由于民众热情高涨，便临时决定直播。侯玉婷临危不乱，和搭档圆满完成了这一“突发”任务。每当疲惫得撑不下去时，侯玉婷便用凉水洗洗脸，然后又走向演播台……

最终，整场赛事圆满成功。回到广东后，时任广东电视台台长刘炽见到她第一句话就是：“你为广东立了大功！”

凤凰再起飞

1995 年，广东发生了几件震惊人心的大案，为了将恶势力绳之以法，许多公安干警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当时，电视台很少有法制节目。侯玉婷敏锐地觉察到，是时候担起新的社会责任，开拓新的电视节目领域了。

“扬警威，悼英魂，镇悍匪”这个主题盘旋在侯玉婷心头，她将想法跟台里领导汇报，并得到肯定。在走访了烈士家属和了解了社会情况后，侯玉婷亲自策划并担任主持了一场晚会——“向人民敬礼”。这场晚会格外成功，也引导侯玉婷

1990 年，北京亚运会开幕，侯玉婷担任主持人

走向了自己的新节目——《与法同行》。作为节目主持和副监制，她从挖掘题材、脚本撰写、实景拍摄，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由于节目的特殊性，侯玉婷认识了一群“特殊朋友”。此后，她为他们的“新生”点亮明灯。2001 年，节目组举办了一场“侯玉婷与囚友畅谈人生理想座谈会”，侯玉婷分享自己的人生，倾听他们的人生，为他们照亮迷途。

2005 年，侯玉婷还接到一个特殊任务，担任广州第六届“明日之星”的副领队，带领佳丽们去法国拍摄。

侯玉婷还深入美国 20 多个州做采访，走进华侨家庭，了解他们的生活。令侯玉婷感动的是，这些侨居海外的华侨有不少人是侯玉婷的“粉丝”：“那时候我们就爱看你的节目啊。”

她在东南亚国家也遇到不少老观众。可见，她的形象已经插上了翅膀，飞到了世界各个角落。

我与我的“侯妈妈”

该说说我与“侯妈妈”的故事了。

我父亲是一家民营肿瘤医院的院长，在办院之初收治了几位病情极度严重的贫困肿瘤患者。患者没有钱医治，医院想请“全民偶像”侯玉婷帮忙呼吁社会捐款。侯玉婷知道了这件事情后，立马联系媒体，呼吁社会爱心人士捐款。后来，在侯玉婷的呼吁下，患者收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善款，才有机会接受治疗。时至今日，他们还记挂着“恩人婷姐”。也因此事，我家与侯玉婷结缘，我和哥哥认她为干妈。

新冠疫情期间，我创作了《我们都是“蒙面超人”》《平安！中国！》《隔着口罩的我爱你，还是那么清晰》等抗疫诗歌，全都是由侯妈妈倾情朗诵的。《广东电视周报》还专门报道了我与侯妈妈的创作故事，《羊城晚报》也开辟专版报道了我和侯妈妈的诗歌朗诵抗疫故事。当年我们双双获得了广东电视艺术家协会的表彰。之后，侯妈妈为我的其它作品朗诵。我的作品，经过侯妈妈温柔细腻的朗诵，仿佛插上了翅膀，传播得更广更远。

退休之后的侯妈妈在一家艺术机构里带学生学习朗诵和播音艺术，培养了不少优秀的学生。其中有不少学生获得“小金钟奖”等奖项。

侯妈妈奋斗的一生，让我懂得，人的潜力是无穷的，要不断往更高的平台努力，绽放自己的光辉。我们不会忘记，南国的荧屏里，曾经飞出来一只闪耀的凤凰，她的名字叫——侯玉婷！

流淌在血液中的律动
——陈菊芬的客家山歌情

文 / 谈天凌　赵梓茵　张晓新（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中国新客家山歌代言人”陈菊芬

陈菊芬是广东技术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副院长，音乐学教授，硕士生导师。她出生于客家古邑河源，从小就生长在深受客家山歌滋养的土地，与客家山歌有着不解之缘。如今，陈菊芬被全球客家华人誉为“中国新客家山歌代言人”。她致力于传承客家山歌，推动客家文化的传播。她的才华和热情为客家山歌的传承和客家文化的推广注入了新的活力。

“一个生命里注定的起点和目的地”

陈菊芬老师从小看惯了客家人晨耕暮归的劳作生活，也听惯了客家人田头地尾此起彼伏的歌声。“客家山水在我心里是最本真、最清纯、最动人的画面。”朴素而深情的客家山歌长久以来触动着陈菊芬的心弦，激发了她对客家音乐文化无尽的热情探索。在星海音乐学院求学时，她跟老师讨论自己的民族歌曲演唱风格。在聊及民歌时，老师一时兴起让她试唱一段客家山歌。陈菊芬张口就唱起了儿时熟悉的山歌。老师听罢，非常惊喜地说：“你唱所有的歌都没有唱客家山歌那么动听！”老师的赞美让她醍醐灌顶。于是，她开始关注自己独特演唱风格，并将客家山歌作为自己的专业研究领域。陈菊芬将学习到的演唱技能和接触过的山歌结合起来，运用最现代的音乐表现方式，对传统客家山歌进行时尚化的演唱和制作。

陈菊芬手上保存最早的是 20 世纪 70 年代她父亲所在的山歌剧团的手抄本，以及原广东省音乐研究所莫日芬自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走遍客家地区所收集到的比较早期的音频素材。“莫老师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光，把她收藏的千余首山歌的原始资料和所有客家山歌书籍都交给了我，让我好好守护，好好传承……”从最初与客家山歌相遇，到如今在该领域坚守，陈菊芬与客家山歌走过多年。直到现在，她还

在那些斑驳、失磁的录音卡带中做声音的修复、歌词的转写等工作，在客家人的文化土地中踽踽独行，坚定地走着客家文化传承的道路。

毕业后，陈菊芬到了广东技术师范大学从事民族声乐教育工作。“对山歌和对家乡族群文化的情怀和热爱，让我觉得自己应该为自己的民族文化或者教育事业去做点什么。”随着对客家山歌和客家文化的深入研究，陈菊芬意识到自己更有责任将客家山歌和客家文化传承下去。

然而，陈菊芬的学术研究并非一帆风顺。客家山歌来自客家生活，它的根和魂都在客家生活的每一个场景里。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客家人的生活已经逐渐从大山走进都市，走向海外。客家方言和山歌也逐渐在现代生活中被缤纷多元的艺术淹没。在当下互联网高速发展的时代，许多传承者大多只停留在客家山歌的表面，鲜少深入挖掘客家山歌在学术层面的价值。客家山歌在现代传承中面临着众多问题，许多宝贵的客家文化内涵被忽视，甚至被遗忘。加之受现代快节奏生活的影响，很多年轻人没有真正理解和体验过客家山歌的魅力。

陈菊芬义不容辞地担起了“赋予传统艺术新的生命力”的责任。不同于其它的学术研究领域，客家山歌由于其特有的地域性和口口相传的特点，导致许多原始的资料变得难以追溯。为了获取第一手资料，陈菊芬往返于许多偏僻山区，踩着石头走过崎岖的山路，广泛拜访民间艺人，向他们学艺。她的足迹遍布于粤东、粤北、闽西、赣南、广西、四川以及港澳台等地，还延伸至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等许多客家人聚居的国家。在与当地居民的交流中，陈菊芬深切地感受到了他们对客家山歌的热爱。这使她更加坚信，客家山歌不仅仅是一种艺术形式，更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和生命力。“传承客家文化不仅仅是小众族群的文化传承，更代表着中华文明的延续和引领。”

2003 年起，陈菊芬开始举办客家山歌的专题音乐会，发行客家山歌唱片，把自己收集到的原生态山歌以及经过前辈客家音乐人初步整理的山歌，在立足传统的前提下，用时尚的中西音乐元素和自身融合民族与通俗技巧的演唱方法进行传播。同时，陈菊芬利用媒体、在高校开展客家山歌教学和讲座等方式进行传播推广。

“没有灵魂的艺术是没有生命的”

从 2006 年开始，陈菊芬相继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等国家推动客家歌谣赛事活动，举办讲座和交流会，以客家山歌为纽带，让当地华侨感受客家山歌的魅力。陈菊芬关注海外传播的难点，寻找新的传播途径，并依托学校的创新项目，指导学生们开展客家歌谣海外传播与传承活动，将客家山歌的美妙旋律和深厚内涵传唱至世界各地。

陈菊芬坚信“没有灵魂的艺术是没有生命的”。山歌离开了山就不复从前，而文化的根源离开了中国文化也难以传续。她更专注于在中华大地传播山歌。她曾参

加港澳台青少年“寻根之旅”，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演唱客家山歌，并受到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她兼顾海内外的传承，一边继续收集客家山歌，一边把这些音乐宝藏整理出书和制作成影像，助力客家山歌传承。经过多年努力，她辑录了经典客家山歌的专著《千年客韵——中华客家山歌》正式出版。该著作共 20.9 万字，包含客家山歌的源流与传播、社会功能与传承等众多内容，这份珍贵的资料为研究客家文化和客家民歌提供了重要参考。2023 年，该书荣获第十届“广东省民间文艺著作奖”三等奖。

2017 年至 2020 年间，陈菊芬老师与广东广播电视台合作拍摄了纪录片《千年客韵——中华客家山歌》和《童唱岭南》。她担任总导演和总撰稿人，历时五年走访了赣、闽、粤、桂、川、台湾地区以及东南亚北美等客家人聚居的国家，用镜头记录下客家人山歌中蕴含的故事，记录下各地传统歌手的歌声，寻找当前客家歌谣在海外传播传承的痛点、难点以及传统歌谣与现代生活的融合创新点。两部纪录片先后在央视及广东、港澳等地电视台播出，引起了全球客家人的热烈回响。这两部纪录片还获得了广东广播电视局年度影视作品一等奖和 2020 年度国家广电总局年度国产优秀纪录片奖。

“这一路就是汗水，踏遍了千山万水，走过了很多崇山峻岭，遇到了很多的困难。”前往江西兴国县茶山镇时，陈菊芬与拍摄团队在路上遭遇了泥石流，幸亏平安无事。在爬广东龙川县的霍山，安排当地歌手在山顶对歌时，陈菊芬把腿摔伤了。她凭着想要还原最原汁原味的客家山歌的坚定信念，忍受着身上的疼痛，继续一瘸一拐地前行，不畏艰险地翻山越岭寻找一个个歌手，聆听他们的故事。

陈菊芬（左）采访台湾客家歌手黄边煜

《千年客韵——中华客家山歌》收录了众多地区最传统最原汁原味的山歌 400 多首。遗憾的是，在片子完成的第二年开始，很多位优秀的山歌传承人因年事已高陆续离开人世。“我保存了他们这一辈子，几乎都是最后的歌唱视频、音频，这是非常非常珍贵的资料。”客家山歌既是本土客家人的，也是世界客家人的宝贵精神财富。当年余耀南大师曾跟陈菊芬说过，他最

陈菊芬采访余耀南大师

大的遗憾就是没有把他满肚子的山歌及早地传承下去……而今老人家已经离去，为了不让他的遗憾成为现实，陈菊芬不遗余力地坚持奔走在传承和传播的路上。

“做有温度的教育和有情怀的事业”

当今时代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好时机。陈菊芬为学生做传统文化方向的创新创业项目进行指导，带领学生进行“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和学校的大创项目，助推客家“非遗”项目走进校园。陈菊芬对客家山歌领域进行跨界的交叉学科的研究，以山歌为抓手，将著作、影视纪录片、课堂教学、非遗美育和传统文化进校园等联系起来，拓宽文化传承传播的道路。

陈菊芬对美育的关注和新生力量的培养尤为重视。依托学校面向中小学、中职音乐老师的师资培训项目，她关注基础教育课程中客家文化的教材体系构建，编著《客家童谣绘本》，以“客家文化进中小学课程构建和教学设计”为内容举办系列讲座等，拓展学生对客家山歌的认识，注重传授山歌背后蕴含的文化内涵，“我们要学的并不是山歌怎么唱，而是山歌唱了什么内容，传递了什么精神”。

陈菊芬将客家山歌总结为有画面感、有故事内涵和有旋律三个特点，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客家山歌的文化内涵。“守正，就要去学正，了解正，懂得正，才能够去创新。只有在正的基础上的创新，才是有根有源的。”陈菊芬认为，要守正创新，保护传承，前提是“不要浮躁，要去深入生活、去体验生活、去感知生活，从中得到启发。”

“要做有温度的教育，要做有情怀的事业，要做有诚信与爱心的人。”这是陈菊芬在教育领域深耕的信念与理念，且她一直在践行之。

2023 年，陈菊芬出版了专著《〈溪山琴况〉之中国音乐美学》，把她自己多年收集整理的流传于民间生活中的客家山歌加以整理和提炼，使中华民族民间音乐理论化、体系化，在科技信息发展迅速的今天，更能得到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传承。

在教学之余，陈菊芬在社会上积极传播和推广客家山歌和客家文化。“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影响并带动我的学生和身边的人，甚至更多人，一起关注、参与推动客家山歌的传承和发展。”陈菊芬对客家山歌和客家文化的未来发展满怀期许和信心。

寻找现代舞精神
——刘琦印象

文 / 白岚（著名文艺评论家） 摄影 / 陈锐军

我偏爱现代舞，中学时看到的一本《邓肯传》，为我打开了一扇进入灵魂的舞蹈之门。幸运的是，中国最早也是最优秀的现代舞团——广东现代舞团就诞生在广州，使我得以近距离观照现代舞。

我想探究的是，现代舞精神究竟是什么？与我们的生命态度又有着怎样的关联？

舞者刘琦

2020 年的 11 月，第十七届广东现代舞周，刘琦的新作《声》作为开幕演出节目公演。

看完演出当晚，我在朋友圈写下了观后感：“这是一场看得见的万物之声。声音的情绪生长、变化，万物有灵，始于表达，终于寂静。声声不息，轮回仍是过程。整部作品惊艳片段不断。末尾一段五位女舞者像森林里无处不在摇曳不止的风，也显现万物随风起舞得大自在的超拔之力，柔韧绵延永无止息。‘声’既抽象也具象，音乐的紧和舞者的放妥帖融合，张力自然释放。”我的情绪不由自主地涌动，眼眶湿润。刘琦回应我说：“感受到的比看到的更真实。”也许是的，但首先是她对人类和自然的关系理解得很深刻，其次是她对情感和情绪的把握极为准确，才能把自己对生命自然的哲思完全和舞蹈有机地糅合在一起，在无声的叙述中直击人的灵魂。

这部《声》，关注的角度超越了人类小我，她的视野已经在观照人和自然、人和宇宙的关系，但作为观者的我们又能够细微地感受到舞者通过身体所呈现的自然之声、生命之力，在呼吸间，在身体的舞动中，天人合一既是本源，也是实相。

现代舞是哲学的舞蹈演化吗？但它的初衷并不是为了哲学而舞动，它终究还是舞蹈本身，是为了呈现人类的情绪情感而创造出来的。但，现代舞承载的比情绪更深刻，比情感更透彻，它的救赎之力来自人类自我的深层追问。

1996 年，刘琦从北京舞蹈学院辞职，毅然来到广东现代舞团。25 年间，她从青年舞者成长为编导、驻团艺术家、艺术总监，于 2016 年底接任团长。她的作品让我越来越喜欢，她用半生的现代舞经历诠释了什么是现代舞精神。

最早知道刘琦，是多年前看她在舞台上跳舞。她的动作爆发力、力量感和自信的身体表达让我印象尤深。刘琦在女舞者里个子不算高，但她在舞台上气场强大，舞动如暴风如疾雨，举重若轻，疏放自如。她崇尚中国传统哲学的思想，顺应自然，也锋芒内敛。她与舞蹈，大约是先天的缘分，沉浸其中不可自拔，半生为伴意犹未尽。

跟她聊天，包括多年前跟舞团第二任团长高成明和舞蹈家桑吉加交流，我发现他们有个共同特点：对现代舞都很深情，对舞蹈和人生想得特别透彻。

广东现代舞团初创之时，就聚集了一大批当时国内最优秀的青年舞者，他们大都是学习民族舞或者古典舞出身。广东现代舞团当时最吸引他们的就是现代舞的自由精神和个性表达。现代舞这种当时国内还很稀少的艺术种类，能诞生在广州，与这座城市文化气质中的现代性分不开。广州当年引领着大众文化的风潮，对于先锋小众的现代舞给予了包容与接纳。现代舞在今天的中国，已经普及到了二三线城市。

现代舞的呈现，需要舞者和观者都要打开自我，再进入感知的实相。现代舞的表达有些像油画的意象派，需要更开放的艺术感悟力，即使是有相对具象的内容，也不是程式化的表层的舞蹈审美语言，这或许是现代舞始终都显得小众的原因之一。

不过刘琦很乐观，她注意到年轻一代受众，特别是 90 后 00 后，由于他们的眼界和吸收信息的广度，反而更容易进入现代舞的语境。现今的广州，现代舞的观众较之前有成倍的增长，热爱并身体力行去跳现代舞的青年人也多了许多。

“现代舞是时代的产物，正如广东现代舞团的诞生正好处于社会变革的时期，从一个相对封闭到开放的时代。对 60 年代出生的我而言，在对艺术的认知上，是一个巨大的转变。”或许，年轻人重视个体和自我感受也恰恰契合了现代舞的本质观念。著名舞者玛莎格雷姆说过：“舞蹈是人类灵魂的影像。”她说的是现代舞。

作为当年最优秀的舞者之一，刘琦并未满足于跳舞，她通过现代舞来表达她的许多人本思考。她的创作始于 1994 年，迄今已发表 70 多部不同类型的作品。她的作品很多已经成了舞团的经典保留剧目，如《临池舞墨》《须弥芥子》《庄子的 N 世代》等等。

有评论认为，刘琦的作品以冷峻的思考和纯粹的表达直击心灵，优雅中蕴藏千

钧之力，善于以不拘一格的创作理念自由穿梭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精巧诗意的独特韵味又赋予作品鲜明的个人色彩。因而她的作品受到国际同行及评论家的一致赞誉，多年来受邀至五大洲 20 多个国家及地区演出。

她从未离开现代舞，现代舞对她意味着什么？

“从事现代舞是我喜欢的一种生活状态吧。做舞者的时候可以真实地，诚实地去展现自己的身体，做创作可以表达自己不断变化的思考过程和生命状态。相较古典舞，现代舞可以表达更广阔的领域和不同角度思考，它没有固定的程式化，它是可持续转化的不可固化的。你会期待着它能去到哪里，就如同有趣的探险和试验，会不断地给你带来挑战和新鲜感。我当初选择来广东现代舞团，是因为可以专注地跳舞，还可以没有预设地进行创作，其不确定性很是吸引我。现代舞是一种无常，恰如生命原本就是无常。现代舞的宽广带给我可持续变化的新鲜体验，这也许是我的生命需要的一种状态，一种不停成长变化的生命状态。”

刘琦编导作品《声》

刘琦同样关注着她生活的这座城市的变化和社会生活中人的各种境遇。她有不少关照现实的佳作，如城市三部曲，包括《前进进》《飙尘》《裸奔》以及《暗战》《潮速》都是与现实生活联系比较紧密的作品，呈现了改革开放过程中人和城市之间的诸多变化。

她的经典代表作品《临池》《芥子须弥》《庄子的 N 世代》都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关。这几部作品也是我最为关注的。我试图从中找寻她的舞蹈思想的发展脉络，发现现代舞的承载厚度。现代舞看似小众，但并非只是关注个体小我的情绪情感，优秀的作品更多呈现当下和人类普遍的共通的生命状态。这或许是现代舞虽然小众但始终都有着深刻感染力的内在原因。

这几部近于内观的作品多取材于传统文化的意象，以观照生命为母题。虽然借

用了传统文化的经典意象，她寻找的是现代人的精神救赎。

《临池》呈现的直接意象是中国传统书法，但又不是书法本身。书法是传统文化的重要表达方式之一，但由于书写的现代改变，书法的工具性和精神性更多地变成了艺术表达，其中的文化密码却渐渐被忽视。刘琦试图通过现代舞找回书法隐藏在民族情感里的人本精神。她找到了书法的张力与现代舞的身体语汇的内在联系，在传统和人的现代性感知里达到了某种统一，书法的文化精神负载通过现代舞视角获得了一次现代重生和表达，让我们在回望传统时能够从容梳理过于匆忙而焦虑的生命体验，告知自我面对生命的各种复杂情绪可以有不同的纾解方式，内观当下，同时释放心绪。

《庄子的N世代》融入了各种多媒体科技元素，如互动式投影、赛博朋克、音乐实验等应用，舞台视觉效果绚烂华丽，冲击力极强。尤其在浮游城市和欲望两部分，通过舞美的动感呈现，舞台背景呈现着后现代社会的庞大和虚无感，舞者们的匆匆步履和机械式身体语言，让社会的飞速发展和人心的动荡焦躁往复再现，我是谁，个体已被融入群体的意识洪流中而不自知，巨大的焦虑和心灵失重令集体无意识沉重而压抑。在人世间部分，喧嚣世间温情并未消失，温暖缘于互相被看见，生活可以选择也可以被选择，生而为人，困境带来的无从把握是生命的必然经历。齐物如沙部分的视觉效果很惊艳，大千世界不过恒河一粒沙，环境有时是恐惧，有时是不安，唯一确定的是周遭始终在变，如何思考和应对都应顺应大道之行。结尾的澄明之境部分，数位舞者没有过多的身体动作，只是缓缓地在台上走动，沉静安宁，万物暂时不在眼里，此刻回到内心也就容易进入澄澈光明的生存本义。

> 刘琦就像一位修行者和守道者，半生在现代舞中寻找困扰我们的种种人生问题表达终极追问，而答案都在她的作品里。这些年，时间没有困住她，在舞蹈里，她始终都是自由的圆融的。

“现代舞打动我的是，它是一个真相。也可以说它靠近了那个真相。现代舞里面去掉了装饰性，从传统舞蹈过来的舞者，要拐个弯才能达到，从表象到实相的经历。”

这段话让我意识到刘琦的另一部作品《须弥芥子》的意义所在。这部作品其实有过十几个版本，但都不是刻意而为，而是顺其自然发生的。她在这部作品里呈现了更加直接的宇宙实相。这部作品从视觉效果上显得更朴素，氛围也更轻松。没有文本情节，没有过多舞美装饰，没有太多音效，只是让舞者在台上发挥身体的主观

现代舞的本质是打开自己，注重表达自我的身体意识和情感呈现，与中国哲学的内省和内观有着深刻的相似性

能动性，让身体跟着意识流动。作品试图回到现代舞的本来意义，让观者能够在舞者的身体动作中体会到万事万物的相对性，虽然一百个观众依然会有一百种解读，但这既是实相也是目的吧。

我其实很羡慕她能够一直把自己放到现代舞里。现代舞的本质是打开自己，注重表达自我的身体意识和情感呈现，与中国哲学的内省和内观有着深刻的相似性。编舞者的思想高度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着作品的深度，不论编舞或者舞者，始终能够在舞蹈中呈现人本精神，以身体动作释放个性和灵性思考，这样的艺术创作何尝不是一种幸福。

每个人的生命历程有意无意中都会追问生命的终极意义，刘琦在现代舞中找到了最适合自己言说的方式。

刘琦就像一位修行者和守道者，半生在现代舞中寻找困扰我们的种种人生问题表达终极追问，而答案都在她的作品里。这些年，时间没有困住她，在舞蹈里，她始终都是自由的圆融的。

现代舞的精神是什么？我以为是真实自在的人本精神。自然地生活，自由地思考，自如地表达，这是我对刘琦以及其他现代舞艺术家的观感。

“筝”情天地间

文 / 黄祖悦（中山市作家协会会员）

那是她一生也忘不了的日子。

那天，中山纪念堂，座无虚席，由中山市红十字会举行的《雏凤清声》张妙姗古筝独奏合奏慈善音乐会拉开序幕。

张妙姗穿着白色公主裙，头发扎着漂亮的蝴蝶结，在炫目的灯光中，她迈着轻快的脚步走上舞台。她走向她的古筝，轻轻地坐下来，抬起双手，抚过琴弦，清脆优美的音乐如一阵阵清风拂过，吹起了艺术天堂上的层层涟漪。

《雪山春晓》，让她的心在雪山间游走。映入她的眼帘的是明镜似的青山，融化的雪水清清亮亮地在干净的岩石缝隙顺流而下。一棵棵嫩芽儿从湿润的树杆上冒出头。阳光从树缝间透过来，到处一片清新，润泽。小鸟的声音更加清脆。春的欣喜，一波连着一波。明净的青山山环水绕。

《打虎上山》那昂扬斗志、闲庭信步、百折不挠。

一曲一曲，她忘我了：眼前，时而是江南春色，时而是北国风光；瞬间的开怀畅快，瞬间的幽情逸韵。这如诗如赋的旋律把观众陶醉了。演出成功了。

台下雷动的掌声，还有一束束的鲜花，使她感觉到共鸣，更坚定了她对古筝

张妙姗

音乐的执着。

演出结束了，她在众多的簇拥中，感受着无边的幸福。看着这么多大师级的艺术家为她伴奏，这么多的叔叔阿姨还有老师同学们为她鼓掌，她的眼里闪着泪花。这时，一位特别的人物笑容可掬地向她走来，他就是香港岭南乐团的团长李志雄。原来，李团长听说有这样的一场音乐会，他特地从香港赶来。他对妙姗说："没想到，你小小年纪，演奏得这么出神入化，每一支曲子，你都把握住了它的情感，它的意蕴。你不仅指法灵动，音色有弹跳性，而且每一首曲子高低错落有致，情感舒缓自如，如行云流水。我非常地看好你！"

张妙姗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今天前来听琴的当然还有华侨中学校长黄国乐。是黄校长一直的鼓励，才有今天这场音乐会。此时，她想起了她的古筝的启蒙老师杨青，要是他在这里，他一定会感到欣慰。

她是杨青老师最喜欢的一个学生，不仅乖巧懂事，而且悟性极高。因此，得到杨青老师的器重，在她小学三年级时就指导她第一次上台演出。黄校长也一直鼓励她多举办个人音乐会。

张妙姗与她的乐团演奏《黄河》

这一场慈善音乐会，成为张妙姗人生的转折点。继而在李志雄团长等人的关注和帮助下，真正开始了她古筝人生的探索之路。

那是 2005 年，她 14 岁。

2006 年，正在中山华侨中学读初二的张妙姗，因一位曾经给她伴奏的古筝演奏家推荐，报考了沈阳音乐学院附属艺术学校。

九月的沈阳，已经有些微凉。张妙姗第一次离家独立生活，也是第一次独自来北方。才知道，原来，在家里是那么的幸福。那里有老师们的宠爱，有爸爸疼爱怜惜的笑容，也有妈妈的唠叨和监督。而这里，人生地不熟，哪怕上学很快跟同学们熟悉了，但每天放学回到住处，依然感到孤独。她每天和古筝相伴，只有用古筝来打发时间，也诉说对家的思念。

大概过了一年，渐渐地，张妙姗开始有了自己的想法："既然要学，就要学最好的，我要去北京。"在告知李志雄团长自己的想法后，李团长立刻为张妙姗联系了在北京的教授，并让张妙姗在约好的时间出发去北京上课。

就这样张妙姗去了北京。可是，经过音乐学院的教授一翻审查，教授对她说："以你现在的水平根本不可能考上我们学校，你现在只有两条路，要不留在北京学习，要不回家。"

就这样，她开启了在北京的生活，每天往返不同学科的老师家里上课学习，回到出租屋里，继续练琴，学习。

每天练琴的时间大概 7 到 8 个小时，光基本功就要耗掉 3 个小时。

空旷寂寞的出租屋里，每天只有这孤独的琴声相伴。从初秋的落叶，到深冬的寒风；从春天的花蕾初绽，到夏季炎炎的烈日。看不到岐江河脉脉的流水，听不到石岐话鸟语般亲切的乡音。她想念故乡的四季如春，想念故乡端午节的赛龙舟，想念故乡中秋节的月饼，想念中山醒狮的跳跃与欢腾……

每当特别孤独时，她就特别喜欢弹奏那首《乡韵》。每每弹得泪流满面，张妙姗就会打通爸爸妈妈的电话，爸爸一边安慰女儿，一边鼓励她坚强起来。

2008 年，她终于考上了中国音乐学院国乐系，师从著名青年古筝演奏家杨西老师。

2016 年，中山市开始对口帮扶云南省昭通市。

张妙姗联系了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踏足这片充满未知的地方。曲曲折折的山路，他们在当地孩子的带领下往山上走，去探访贫困对象。这里竟然全是 60 度左右的陡坡，他们走了 1 个多小时才到了一个学生家。一位老人一瘸一拐地走上来，把他们迎进屋。眼前的一切，所有人都震惊了！黑乎乎的土墙，已经裂开了一些墙缝，除了一些旧竹筐、旧背篓、破锄头等，就是一张小桌和几条矮板凳，没有别的家具了。老人平时就在山上种土豆为生。为了招待客人他宰了家里唯一的一只鸡：“没有什么好吃的，真是不好意思。”老人有些难为情地说。他们更感心酸。

一场由 200 多名云南学生参加的慈善音乐会在中山华侨中学高中部礼堂举行

张妙姗带着摄影师和爱心人士，一路走访，一路拍摄，一共走访了 50 多个贫困家庭，制成视频，发到网上，让更多人看到。回到中山，她就举办一系列慈善活动，为这些贫困家庭的孩子筹款。

从 2015 年开始，张妙姗每年都会带着团队去昭通走访四五次。她找到学生所在学校的老师，找到这些学生，根据他们的特长，给他们排练手语操、话剧、舞龙舞狮、唱歌、跳舞等。八个月后，一场由 200 多名云南学生参加的慈善音乐会在中山华侨中学高中部礼堂举行，这场慈善音乐会所得善款，全部捐给云南昭通，惠及给那些贫困学生。

张妙姗的“筝”情如流淌在天地间的汩汩深情……

珠江潮汐美

文 / 陈东明（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

一

珠江，是中国境内第三长河流，有着两千多年的历史，是一条穿越历史与未来的大江，是一条连接亚洲大陆与海洋文明的大江，也是中国近代史上见证政治和经济改革源头的大江。站在南中国的北回归线上远远望去，浩浩荡荡的江水，从遥远的高原云南曲靖沾益县的马雄山一路奔流，经云、贵、桂、粤、湘、赣以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在广东三水与北江汇合，穿越珠江三角洲地区的 8 个入海口流入南海。

美丽的珠江河畔

在长长的珠江流域内，有 50 多个民族聚居，汉族、壮族、苗族、瑶族、布依族、毛南族等，他们世代在这里繁衍生息。奔腾不息的珠江，以南粤历史文化和继往开来的精神，为建立粤港奥大湾区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扬帆启航驶向美好的前景……

我从小在珠江边长大，看着珠江潮起潮落，看着珠江上空变幻的流云，不禁想起了关于珠江的许多往事。

广州东部的黄埔区，珠江北岸有镇守海关的蟹山炮台和狮山炮台遗址，有古老的村庄珠江村和古老的墟镇鱼珠圩，有星罗棋布的工厂，比如文冲造船厂、广州炭素厂、广州冶炼厂、广州石化厂、广州机床厂、东方红汽车制造厂、鱼珠木材厂、鱼珠煤场等，还有当时华南最大的港口——黄埔港。珠江南岸的长洲岛有中外闻名的黄埔军校旧址，有黄埔造船厂，还有绿色的禾田和果林。我家就住在黄埔港港口后面蟹山脚下铁道边的铁路宿舍小区。我初学游泳时年六七岁，和同伴们一起光着屁股在河涌戏水，抱着折断的芭蕉

树当救生圈戏水，有时还将河底的泥巴涂到头上，像一个个大芋头，相互取乐。

黄埔港宽阔的江面上，常年停泊着各种大中型商船、货轮以及军舰。从小生长在这里的我们，对各种船舰都相当熟悉：哪些是炮舰、猎潜艇和扫雷舰，哪些是苏联和荷兰的商船，一目了然。

珠江沿岸，生活着以捕鱼为生的渔民——在渔船居住或在江边搭草棚生活的疍民。我曾就读的鱼珠小学，有些学生就是疍民子女。有一次学校组织全校师生到长洲岛举办夏令营。晚上，我们夜宿岛上的坪岗小学，举行篝火晚会，各班轮流表演节目，我们班是集体合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夜晚的长洲岛上凉风习习，火光照亮着周围的山坳，甜美的歌声在夜空中传得很远很远。

后来，我才知道长洲岛内其实是一个海军基地，常年停泊着许多军舰。基地里的海军有不少是我父亲的家乡人。当战舰停泊在长洲岛维修或保养时，他们时常在假日来我家串门，也时常邀请我到他们的战舰上参观。那时，我心里有个当兵的梦，感觉到当兵保家卫国很光荣。我参加工作后，还时常与中学同学带上吉他和炊具，骑自行车到刚开发的黄埔新港的珠江河边游玩。

我喜欢在珠江游泳。我的游泳经历中里程最长的一次，是往返泳程约 15 公里，上岸时一点力气也没有，直接倒在了沙滩上久久都无法站起来。

我在一家大型客运企业从事宣传报道工作，其间，曾乘船东去上、下横档岛，莲花山、虎门、龙穴岛和外伶仃岛采风；南去珠海的斗门、荷包岛；西去半月岛、清远的北江及广西的梧州、桂平、大腾峡采风，还包括前面提到的广西百色靖西的德天瀑布和南宁参观。

二

珠江河的前世今生，溯源回顾，其自然风光旖旎、民俗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

历史的烟云回到那遥远的公元前 219 年。秦始皇派兵出征南越，赵佗率 50 万大军完成平定大业。秦朝灭亡后，汉高祖三年（前 204 年），赵佗起兵兼并桂林郡和象郡，以大海为屏障，将东西几千里的疆域收入囊中，在岭南建立南越国，号称“南越武王”。汉高祖十一年（前 196 年）夏，刘邦派遣大夫陆贾出使南越，劝赵佗归汉。在陆贾劝说下，赵佗接受了汉高祖赐给的南越王印绶，臣服汉朝，成为汉朝的一个藩属国。从此，历朝历代的珠江就一直是中华民族第三大河流。

从地理位置看，南越国与中原北方相隔于绵延起伏的南岭山脉。以起自云南，东入贵州，再折向广西、广东、湖南、江西、福建等省份的大庾山、骑田山、都庞山、萌渚山、越城山这五山脉为著名，统称为“五岭”。

南中国这一最大的横向五岭山脉筑起了一道天然屏障，成为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的分水岭，同时也无情地阻隔了岭南地区与北方中原的交通、文化及经济往来。

由此，当时经济和文化比较发达的北方遂称岭南为“南蛮”或“南蛮之地”。

岭南当时地广人稀，气候炎热，瘟疫多，故有唐代诗人白居易写的《新丰折臂翁》一诗中有这样的诗句：“闻道云南有泸水，椒花落时瘴烟起。大军徒涉水如汤，未过十人二三死。”

岭南地区自归属汉朝以来，历经三国、西晋、南北朝、以及唐朝、南北宋，元、明、清等朝代。东晋时期，中原战乱频繁，岭南地区相对安宁，中原地区大量汉人南迁，人员南迁的同时文化也南迁。唐宋时期，被贬的名臣文豪也不少，其中就有唐宋八大家之中的苏轼、韩愈、柳宗元。比如苏轼被贬黄州呆了几年，后来又被起用，又再被贬广东惠州和海南。韩愈被贬往岭南，先在连州阳山县令，后任潮州刺史。柳宗元被贬至湖南永州 10 年，后再被贬至广西柳州。北宋八名相之一的寇准被贬至广东雷州。

在海南岛的海口，有一个五公祠，祠内祭祀着唐宋两代被贬海南的五大名臣，他们分别是：李德裕、李纲、赵鼎、胡铨和李光。其中李德裕是唐朝的，其余四人是宋朝的。贯穿岭南岭北文化的南宋名臣崔与之，出生于广州增城中新镇，退休后仍回到增城居住。

珠江下游的广府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属于岭南文化，由中原与江南移民文化所形成，传承了中原汉文化的精髓，在岭南文化中影响最大，在各个领域常被作为广东汉文化的代表。

广府文化的代表有广东音乐、岭南古琴、桑园围、北帝诞庙会、波罗诞庙会、飘色、粤菜、醒狮、广绣、广彩、广雕、岭南画派、镬耳屋、岭南园林、粤剧、粤曲、迎春花市，等等。

在以广府文化为中心的广州，自宋代开始就有评选羊城八景之传统，历代相延。这些“八景”为历代百姓所追捧，从文化方面充分体现出各个时期广州社会建设风貌。以珠江流域沿河两岸城市所命名的“八景”或“十景”，随着时代的变迁，得到延续和更新，更富时代特色。

珠江边的南海神庙，始建于隋开皇十四年（594 年），已有 1400 多年历史，是中国历代皇帝祭祀海神祈求平安的场所，是中国四大海神庙中唯一保存下来规模最大、最完整的海神庙，是中国最古老的港口之一，是丝绸之路最早的出发地。南海神庙在民间被称为“波罗庙”，而庙会也因南海神的生日而兴起，故庙会被称为“波罗诞”，逛庙会称为“游波罗”，庙会上出售的粽子称为“波罗粽”，工艺鸡称之“波罗鸡”。

沙湾飘色是广州番禺区沙湾镇本土特色的传统民俗艺术活动，流行于珠江三角洲一带，影响全国。它集合了材料、力学、音乐、造型、装饰等工艺，以色柜作为展示舞台，色柜上坐立着的人物造型称为“屏”，凌空而起的称为“飘”，两者由中间的色梗连接，形成一个有机整体，以此表现某个民间传说或戏曲故事片段。沙湾飘色起源于明代中叶至晚明时期，由沙湾北帝诞迎神赛会娱神节目发展而来，清中叶至民国初年达到全盛。传统的沙

湾飘色活动在每年农历三月初三北帝诞举行，由乡中各坊里轮流组织，每次出20-30板色，以八音锣鼓伴奏，在主要街巷巡游表演。

历年来，在珠江河上的龙舟竞赛或龙舟竞渡活动也相当热闹。龙船竞渡前，要先请龙、祭神。如广东龙舟在端午前要从水下起出，祭在南海神庙中的南海神后，安上龙头、龙尾，再将一对纸制小公鸡置于龙船上，保佑船平安。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是中国传统体育运动的五星级赛事，被誉为世界上最好的龙舟赛事之一，除广州和港澳地区外，国外也派出龙舟队参加。

珠江自古以来就是一条经商的黄金水道。历史上，中国的对外贸易时开时禁。清康熙盛世，为振兴沿海地区长期凋敝的经济，实行开海通商政策。1685年，伴随着日益频繁的国际商业交往，广州十三行应运而生。

自汉唐以降，珠江两岸许多蛮荒之地已被逐渐开发成物产丰富、人丁兴旺的商埠、码头、圩市和镇集。西江、北江与东江的三江汇流，又催生了以广州为首的城市群落的崛起，进而发展成为南中国海外贸易最重要的出海口。

西汉初年，汉武帝派使者沿着百越民间开辟的航线从广州出发，凭手摇桨橹小船航行，那时还没有发明指南针，也不懂得使用风帆，他们凭着顽强的开拓意志和冒险精神，开辟了一条经过东南亚，横越孟加拉湾，到达印度半岛的东南部，抵达斯里兰卡海道的新路线，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端。2200多年后，人们在广州南越王博物馆展出的文物里，发现了有来自非洲的象牙和来自公元前5世纪的波斯银盒，从而印证了早期南越人海航的历史。

继这之后的宋代时期，广州已经成为中国第一大港、世界闻名的东方港市。从广州经南海、印度洋，到达波斯湾各国的航线，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于是就有了以广州为起点，以货物总体为名称的“海上丝绸之路”“海上陶瓷之路”“海上香药之路”。那些年，珠江航线的商船格外繁忙，农耕兴旺。由此，整个岭南地区便享有“天子南库”之誉，而不少南越百姓也从中得到好处。

明末清初尽管实行海禁，但广州也长时期处于“一口通商”独大的局面。其时以广州、佛山、陈村、石龙为横轴，以广州、澳门为纵轴的网络，拓展整个珠江三角洲的商业对外发展，让珠江两岸一派商贾云集、财源茂盛的景象。

广州市中心城区西关，有几条住满平民的马路，分别是杉木栏路、仁济路、和平路、珠玑路、十八甫路，与西关同处一地的是有着300多年历史、盛极一时历史的十三行路。距这百米之遥的沿江西路29号，是中国政府最早设立的海关——粤海关大楼，是广州市民俗称的“大钟楼”。

粤海关大楼原建于1860年，是两层简陋的楼房，后因楼房被白蚁蛀蚀改建，再因遭火灾毁坏于现址奠基重建，于1916年秋建成。大楼由英国建筑师设计，白色古罗马风格，是近代西方新古典主义

建筑代表作之一。

在十三行存在的一百多年里，它为清王朝提供了一大笔可观的收入的同时，也从外国学习了不少工艺美术和建筑艺术，为珠江三角洲营造了一个重商的传统。

岭南这片土地，人杰地灵，涌现出了唐朝宰相张九龄，近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康有为和梁启超，铁路之父詹天佑，中国航空之父冯如等杰出人物。

长洲岛上有一所世界著名的军校——黄埔军校。从这所军校走出的名将，像大海里的蛟龙，在近半个世纪里将神州大地搅了个天翻地覆。

黄埔军校在大陆共办了 23 期，共有 8107 名学生毕业。在抵御外族入侵的抗日战争中，有不少从黄埔军校毕业的名将，如国民党方面的胡宗南、杜聿明，邱清泉、王耀武、戴安澜、张灵甫、谢晋元、胡琏、郑庭笈、廖耀湘等；中共方面有蒋先云、徐向前、陈赓、左权、周逸群、卢德铭、黄公略、曾泽生、郭化若、林彪、赖传湘、许光达、赵尚志、陶铸、宋时轮、罗瑞卿、张宗逊、程子华等。

沿着历史的足迹，可以看出珠江河畔浪潮的澎湃和翻滚，岭南人民同反动军阀和外部敌对势力作不屈不挠的抗争——

珠江下游东莞虎门，1839 年 6 月 3 日发生了虎门销烟。清朝政府委任钦差大臣林则徐在广东省东莞市虎门镇集中销毁鸦片，历时 23 天，销毁鸦片 19187 箱和 2119 袋，总重量 2376254 斤。

发生于 1841 年 5 月的三元里抗英斗争，三元里附近 103 个乡的群众，手持大刀、长矛、锄头包围了四方炮台，并诱敌至三元里牛栏岗。当时恰逢倾盆大雨，英军枪炮皆哑，民众乘势猛攻，人数越聚越多。英军增援部队到达后，才解救了被围困的英军。三元里抗英是近代史上中国人民第一次自发的大规模抵抗外国侵略的斗争，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抵御外敌的爱国精神。

甲午战争以后，各帝国主义国家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为挽救民族危亡，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登上了历史舞台。

1911 年 4 月 27 日，黄兴率领 120 余名敢死队员直扑两广总督署，发动了同盟会的第 10 次武装起义——广州起义。其中 72 人的遗骸由潘达微等出面收葬于广州东郊红花岗。潘达微把红花岗改名为黄花岗，这次起义因而又被称为“黄花岗起义”。1927 年 8 月 1 日，中国共产党领导部分国民革命军在江西省南昌市举行的武装起义，称“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起义由周恩来、贺龙、李立三、叶挺、朱德、刘伯承、谭平山领导。继南昌起义之后，1927 年 8 月 18 日，毛泽东发动和领导了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1927 年 12 月 11 日，中国共产党在广州领导工人、农民和革命士兵举行的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武装起义——广州起义。同年 10 月 30 日，海陆丰农民在中共东江特委的领导下，并在南昌起义部队余部工农革命军第二师的配合下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先后占领海丰、陆丰全境和惠阳、紫金的部分山区，

在彭湃领导下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开辟了海陆丰革命根据地……

南粤大地的车轮在不断向前，珠江的浪潮总是在不断翻滚向前，一浪胜过一浪。

三

改革开放40年，春天的故事。

广东珠三角以极大的包容心，欢迎从五湖四海汇集而来的建设者。广州这个工业集群在全国影响深远，其规模和技术还辐射到全国各地，为填补落后面貌谱写了华彩乐章，为产业工人带来了令人仰慕的荣誉，为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奠定了强劲的工业基础。那时神州大地流行着这样一句话“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珠江两岸崛起的故事很多，人们唱起了《春天的故事》。

2018年建成并正式通车的港珠澳大桥，是中国境内一座连接香港、澳门和珠海的桥隧工程。港珠澳大桥东起香港国际机场附近的香港口岸人工岛，向西横跨南海伶仃洋水域接珠海和澳门人工岛，止于珠海洪湾立交，全长55千米，主桥29.6千米，香港口岸至珠澳口岸41.6千米。

港珠澳大桥的建成，将粤港澳人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共同携手迈向时代新的里程碑。

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粤港澳大湾区的五大目标是：充满活力的世界级城市群，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

粤港澳大湾区由广州、深圳、佛山、东莞、珠海、惠州、江门、中山、肇庆9座城市，以及香港、澳门两个特比行政区构成，是国家建设世界级城市群和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空间载体，与美国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和日本东京湾区比肩的世界四大湾区之一。

粤港澳大湾区的建立，从经济、政治和文化层面，再一次率先走上新的征程，焕发出新的活力，再一次在神州大地讲述“春天的故事”，让这条古老而文明的珠江变得更加美丽璀璨。

这些年，广州建起了城市新中轴线，北起燕岭公园，南至海珠区的南海心沙岛，贯穿火车东站、天河体育中心、珠江新城、新电视塔，南至珠江后航道的海心沙岛。

位于珠江边的广州塔，俗称“小蛮腰”，与珠江新城、花城广场、海心沙岛隔江相望。每当夜幕降临，广州塔就变得五彩斑斓，闪烁着红、蓝、绿的光彩，宛若一位婀娜多姿的少女在风中翩翩起舞……

踏遍青山人未老，珠江两岸风景独好。

每当夜幕降临，我漫步在珠江河畔，就像走进了一个童话世界。这里灯火辉煌，五光十色，高楼大厦倒映水中，一艘艘游船在江面驶过，一座座大桥如跨越江面，美丽无边……

广府饮茶文化与生活方式解读

文 / 王焱（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语言文化学院教授） 房家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中文教育硕士）

“饮茶粤海未能忘”，广府饮茶兼收并蓄，飘香内外，这种文化是城市文明的缩影，亦是广府人文精神的具象化，广府人在加速推进城市文明进程的同时，始终留有一份温暖。

广东人的血液中流淌着各种各样的液体，糖水、汤水、茶水……其中最重要的，应该就是茶水。广府饮茶文化，即广府文化区的一系列以饮早茶为核心的文化，与潮汕工夫茶以品茶为主不同的是，老广饮茶又谓之“叹茶”（“叹”在粤语里有享受的意思），更重视点心、菜肴和粥品。老广们常言道“一盅两件”足以叹世界。“一盅”指的是一壶茶，比较地道的有菊花茶、普洱茶、铁观音等；“两件”指两件点心，最常见的包括“四大天王”——虾饺、干蒸烧卖、叉烧包和蛋挞。

广府饮茶文化作为诞生于广州、盛行于大湾区和海外广府文化区、享誉全球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集结了饮文化（茶文化）、食文化（点心文化）、生活习俗（礼仪文化、心态文化）等文化形态，不仅集中体现了中国饮食文化，亦是岭南文化的重要名片，具有丰厚的文化底蕴和强大的文化生命力，是世界了解中国、了解大湾区、了解广州、了解岭南文化的重要窗口。

奋斗者的生活哲学

身处全国经济规模最大的广东省，广府人既懂得尽其所能积极奋斗，也懂得在忙碌之余尽情享受闲适；既有志建功立业一展宏图，又愿意与城市建立情感纽带。广府地区地狭人稠，人口、资源和环境的矛盾大，独特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在很大程度上迫使广府去竞争和拼搏，创造出自己的一方天地。或是向海洋索取生活资料，或是漂洋过海大批出外闯荡谋生，广府人具有非同寻常的冒险精神，渴望探索，实现抱负，又会记住来时的方向，不愿迷失在茫茫海域。

在劳累了一段时间后，老广们喜欢约上三五好友，或是带上一大家子人，到茶楼里饮茶，享受美食和陪伴。虽然名为饮茶，但茶并非主角，真正的重头戏在点心。粤式点心发展至今，至少已有上千个品种，可分为荤蒸、甜点、小笼蒸、大笼蒸、粥类、煎炸六大类，“一盅两件”早已变成“一盅 N 件”。对广府人而言，早茶不仅为广府人饱腹，也如缕缕细线，牵住人心，让广府人在奋力往前冲的同时，也能偶尔放慢脚步，为家人朋友、美景美食驻足片刻，享受当下。广府人将热爱和汗水倾注在土地上，铸就城市的文明进程，城市也以美食反哺广府百姓，给予人们心灵上的归属感，由此，早茶是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纽带，也是城市精神的同频共振。

这种精神与中国古人崇尚的一张一弛，进退有度的理念不谋而合，广府人崇尚的并不是完全躺平的生活模式，更不是去逃避现实的重担，而是奋斗之后的片刻放松，是一种动态的自然平衡。

去年，一个“三点钟，饮茶先”的短视频在脸书上爆火，一个外国大叔举着相机和一袋奶茶自拍说着一口地道的粤语，展示着他的摸鱼宣言：“喂，都三点多了，还做什么工作啊，先喝茶啦，做那么多有什么用啊，反正老板也不会心疼你的！”瞬间引起了打工人的共鸣，迅速传遍整个互联网。近几年，“内卷”“内耗”等焦虑情绪接踵袭来，成为时代的关键词，于是，“躺平”和“摆烂”成为许多年轻人挂在嘴边的自嘲与无奈。这位外国大叔的摸鱼宣言就是这种生活态度的典型代表。

广府人绝不会陷入连轴拼命和彻底躺平这两种极端状态当中。他们有自己的快乐秘笈，该努力工作努力工作，该生活休闲生活休闲，work hard，饮茶 hard，好好工作，好好享受生活，是他们的生活哲学。

旧时广州的“妙奇香”茶楼有一副对联：“为名忙，为利忙，忙里偷闲，饮杯茶去；劳心苦，劳力苦，苦中作乐，拿壶酒来。”现代社会如同一架昼夜不息、快速运转的机器，每个人都是机器里的一颗螺丝钉，被带动着不停运作，不仅身体劳累，心灵上更在光怪陆离中倍感疲惫。茶楼则是广府人一处心灵的休憩之地，让他们得以在忙碌之余借美食好茶疗愈疲惫的心，补充精神能量，待身心得到充分的休养之后，又有了继续前行的力量。广府人在这种张弛有度、疾徐自如的节奏里把握住生活的火候，风风火火又从从容容，此消彼长，生生不息。

普通人的精致生活

说是早茶，其实并不拘泥于早晨。广州最大的酒楼一般都有早、午、晚三次茶市，早晚两次顾客最多，大酒楼可同时容纳几百人就餐、喝茶，堪称广府一景。吃早茶的客人们往往分为不同的批次，最早的一拨是早起的老年人，然后是上班族，接着是早茶连着午茶一起解决的晚起族，早茶、下午茶一直延续到夜茶，广东人的

早茶变成了全天候的餐饮选择。灵活的叹茶时间允许你可以和阿公阿婆们一样早早排队，只为选上一个心仪位子，也允许你在下午优哉游哉走进茶楼。点心分为“小件”“中件”“大件”“超件”等，饮茶不仅时间上灵活，点心的分量也可以满足食客的不同需求。去饮茶的客人可以一坐三四个小时，除了是满足口腹之欲外，由于茶楼环境舒适宜人，上菜方式简单方便，也成为老广们串亲戚、会朋友、谈生意、搞公关的好场所。

走进茶楼，在粤曲声或是粤剧的伴随中落座，熟客们对点心种类了然于心，不紧不慢地在菜单上勾上必点项目；新客们则在眼花缭乱的菜单中，兴奋游移地勾勾选选。对于广东人来说，粤式早茶的另一个可贵之处在于：饮茶代表着普通人也可以企及的精致生活。不管你是富甲一方的大佬，还是整日为生活奔波的劳苦大众，都可以在饮茶中找到独属于自己的享受。

过去的“一厘馆”，本来是为穷人提供的休闲场所，直到光绪年间，广州才慢慢开始出现一些档次比较高的茶馆，主要来消费的人群都是文人墨客、富绅巨贾等上流人士。但即便如此，早茶并没有沦为富人的专利，贩夫走卒也能欣欣然地去享受自己经济范围内能够承受的早茶。正因如此，才有了闲句：“有钱楼上楼，无钱地下蹈”（粤语，意为蹲）。这种包容性让广府饮茶成为接地气的一种文化，它充满着市井生活的烟火气，平视每一位客人，不管你是普通百姓还是达官显贵，来晚了都得“排筹”。

鲜香甜糯，蒸煮炒炖，丰富的茶点食材和制作方法展示出广府菜包罗万象的特点，口味虽清淡却富有滋味，不像或辣或甜或重油的其他菜系那样具有较强的排他性，因此能被各地的人所接受。早茶点心的包容之处不仅体现在种类上，也体现在制作方式上。茶楼保留了大部分流传已久的传统烹饪方式，也吸收了海外点心的技艺，在传承的基础上不断推陈出新。如广式蛋挞将广式炖蛋和西式的甜点技艺结合，为食客奉上一道中西合璧、平凡又精致的甜点美食。“皮层叠叠灌黄汤，尤似鸟巢卵破浆。展现人前如亮镜，平凡美食确无双”，粤点泰斗何世晃曾为广式蛋挞赋诗一首，见诗如见挞，一个皮薄馅厚的金黄蛋挞如在目前。

品过点心，一杯爽口的清茶为食客解腻，带来几分沁人心脾的芬芳。食客们一边谈话，一边饮茶和品尝茶点，温润清香的茶汤和热气腾腾的茶点让一颗颗浮躁之心得以平静，也让人们借美食拉近彼此距离。在茶楼里，人们可以暂时将自己从这个快节奏和信息超载的时代中抽离，眼前最大的事就是专心享受美食和陪伴的时光。

毛泽东有“饮茶粤海未能忘”的诗句，广府饮茶兼收并蓄，飘香内外，这种文化是城市文明的缩影，亦是广府人文精神的具象化，广府人在加速推进城市文明进程的同时，始终留有一份温暖。面对时代的种种变幻迭代，仍能安心自在，淡定从容。

广东侨联纪事

文 / 粤乔宣

7 月 Jul.

7 月 4 日　戴文威、谢惠蓉副主席在机关会见吉林省侨联主席丁兆丽一行，并举行座谈交流。

7 月 4 日至 7 日　曹堪宏二级巡视员赴中山、江门参加省政协组织的“加强我省华侨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利用”专题调研。

7 月 6 日至 10 日　全省第五期基层侨联干部培训班在浙江大学举行，来自全省各级侨联干部近 80 人参加。谢惠蓉副主席出席开班仪式并作动员讲话，浙江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副院长雷群芳出席开班式并致辞，中国侨联基层建设部联络处处长吴磊出席开班式并作专题辅导。培训期间，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温州大学、浙江大学发展委员会有关专家教授及浙江省侨联有关领导分别作专题授课辅导，并组织参训人员赴嘉兴南湖红色教育基地、浙江省“侨胞之家”等开展现场教学。

7 月 11 日　戴文威副主席出席梅州市第八次归侨侨眷代表大会，并到省侨联驻镇帮镇扶村点梅江区城北镇上村村和干光村调研乡村振兴工作。

7 月 11 日　谢惠蓉副主席出席河源市第七次归侨侨眷代表大会并讲话。

7 月 20 日　省侨联十一届四次全委会议在广州召开。会议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传达学习贯彻省委十三届三次全会和中国侨联十届六次全委会议精神，选举李丰同志为省侨联主席、陈农灏同志为省侨联秘书长，并选举产生广东省出席第十一次全国归侨侨眷代表大会代表 93 名。会议邀请省委党校副校长潘向阳作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专题宣讲辅导。省委统战部副部长、一级巡视员李阳春受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王瑞军的委托到会致贺。戴文威副主席代表常委会向大会作工作报告，谢惠蓉副主席主持会议。

7 月 21 日　李丰主席、戴文威副主席在广州出席由省侨青联举办的港澳台地区侨界青年创新创业交流分享会。

7 月 21 日　戴文威副主席在广州参加全省主题教育座谈暨专项整治工作推进会。

7 月 26 日　谢惠蓉副主席在机关会见马达加斯加顺德商会会长陈健江一行，并举行座谈交流。

7 月 27 日　谢惠蓉副主席在广州参加“老挝建国阵线中央机关干部研修班”座谈交流会。

8 月 Aug.

8 月 1 日至 3 日　李丰主席在广州走访调研广东省潮人海外联谊会、广东省客属海外联谊会、广东省广府人珠玑巷后裔海外联谊会等省侨联主管的社会组织。谢惠蓉副主席、陈农灏秘书长参加调研活动。

8 月 2 日　李丰主席在机关出席“侨爱南粤·乡村振兴”捐赠仪式，向省侨联海外委员、美国潮商总会主席、北京潮人海外联谊会执行会长林辉勇颁发捐赠证书。戴文威副主席，陈农灏秘书长参加捐赠仪式。

8 月 2 日　谢惠蓉副主席赴河源东源出席省产业有序转移招商引资对接平台推广应用现场会暨“粤同行”产业赋能行动计划启动仪式。

8 月 3 日　李丰主席在广州参加省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海外统战工作协作机制会议。

8 月 10 日　李丰主席在广州参加 2023 世界粤商大会组委会第一次会议。

8 月 10 日　谢惠蓉副主席在广州出席广东侨创联盟一届一次执行理事长会议。

8 月 18 日　李丰主席赴揭阳惠来出席“侨爱南粤·乡村振兴”活动。

8 月 18 日　戴文威副主席参加珠海市“侨商·市长面对面”座谈会。

8 月 19 日　李丰主席、陈农灏秘书长在广州参加粤港澳大湾区邑商大联盟高质量发展论坛暨广州市台山商会第三届理事会就职典礼。

8 月 20 日至 21 日　戴文威、谢惠蓉副主席和曹堪宏二级巡视员赴北京参加中国侨联十届七次全委会议。

8 月 21 日　李丰主席在广州参加广东省第二十一期领导干部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

8 月 22 日　李丰主席、谢惠蓉副主席在机关会见波中侨商联合会荣誉会长招益华、会长杨山毅一行，并举行座谈交流。

8 月 24 日　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在广州会见国际菁英会主席、凯信荣集团主席胡智荣先生。李丰主席、陈农灏秘书长参加会见。

8 月 24 日　省侨联领导班子召开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专题民主生活会。省委主题教育第七巡回指导组副组长李卫国到会指导并作点评讲话，省委主题教育第七巡回指导组成员罗志昌、郑鸿志，省纪委监委驻省委统战部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李连坚到会指导。李丰主席主持会议，戴文威、谢惠蓉副主席参加会议，庄有林二级巡视员、陈农灏秘书长列席会议。

8 月 25 日　戴文威副主席赴中山参加第三届国际侨界青年创新创业大赛启动仪式。

8 月 29 日至 9 月 3 日　李丰主席率广东代表团 97 名代表赴北京出席第十一次全国归侨侨眷代表大会。大会期间，中国侨联副主席连小敏亲切看望广东代表团全体与会代表并参加讨论，大家认真学习领会李希同志代表党中央所作的致辞和万立骏同志所作的工作报告。大家一致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大会开幕会，充分体现了总书记、党中央对广大归侨侨眷、海外侨胞和侨联组织、侨联干部的高度重视、亲切关怀和寄予厚望。大会选举万立骏为新一届中国侨联主席，程红、程学源、连小敏等 18 人为副主席，陈迈为秘书长，我省李丰当选兼职副主席；选举产生了由 495 名委员组成的新一届中国侨联委员会，我省有 43 人当选委员；选举产生了由 166 名常委组成的新一届中国侨联常务委员会，我省有 11 人当选常委。大会表彰了 10 名中国侨界杰出人物、20 名中国侨界杰出人物提名奖、989 名全国归侨侨眷先进个人，我省有 1 人获得中国侨界杰出人物提名奖、104 人获评全国归侨侨眷先进个人；表彰了 60 个全国侨联系统先进集体、40 名全国侨联系统先进工作者，我省有 3 个集体获评全国侨联系统先进集体、2 人获评全国侨联系统先进工作者；表彰了 220 个全国侨联系统先进组织、220 名全国侨联系统先进个人，我省有 27 个组织获评全国侨联系统先进组织、26 人获得全国系统先进个人。

9 月 Sep.

9 月 7 日　省侨联召开传达学习贯彻第十一次全国侨代会精神大会。李丰主席主持会议并讲话，传达大会精神，部署全省侨联系统贯彻落实工作。省纪委监委驻省委统战部纪检监察组组长陈钟鹏和戴文威、谢惠蓉副主席出席会议。省纪委监委驻省委统战部纪检监察组有关负责同志，机关各部室和侨胞服务中心全体干部职工、有关直属社团负责人参加会议。

9 月 8 日　李丰主席在机关会见美国华埠大联盟主席马树荣、秘鲁华助中心主任梁顺、美国华人汽车工会会长赵正一行，并举行座谈交流。

9 月 11 日至 16 日　第一期广东省侨联委员研修班在厦门大学举办，近 50 名省侨联委员参加了研修班。戴文威副主席出席开班仪式并作动员讲话，曹堪宏二级巡视员出席结业仪式并作总结讲话。

9 月 13 日　李丰主席、谢惠蓉副主席在机关会见加拿大蒙特利尔华商会主席张仕根、奥地利华人投资协会会长黄伯华、塞浦路斯广东商会会长杨德明、英中商旅文化交流协会会长冯秉良、西班牙王国粤港澳商会创会主席范润棋、多米尼加华侨总会常务董事吴剑荣、多米尼加共和国粤青

商会会长何岳文一行，并举行座谈交流。

9 月 14 日　李丰主席、戴文威副主席在广州参加全省组织工作会议。

9 月 17 日至 19 日　李丰主席赴汕头出席汕头市第十九次归侨侨眷代表大会和“共赏明月·同心筑梦”侨助汕头高质量发展行动暨国际潮团总会 2023 年度会员大会，并调研侨联工作。

9 月 21 日　李丰主席、谢惠蓉副主席在机关会见挪威潮汕商会会长赵文生、比利时潮汕同乡会名誉会长刘延庆、新西兰潮属总会会长许少波、广东省潮联会海归委执行秘书长蔡耿光、菲律宾潮汕青年商会名誉会长杨经纬一行，并举行座谈交流。

9 月 25 日　省侨联召开十一届五次常委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视察广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学习贯彻第十一次全国侨代会精神及省委十三届三次全会精神，研究部署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省侨联工作，讨论《广东省侨联关于贯彻十一次全国侨代会精神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的若干措施》。李丰主席出席会议并讲话，戴文威、谢惠蓉副主席出席会议。

9 月 25 日至 27 日　广东省侨联信息工作培训班在广州举办。戴文威副主席出席开班仪式并作动员讲话，陈农灏秘书长主持开班仪式并做培训总结。中国侨联办公厅副主任张凌出席开班仪式并为培训班授课，省侨联机关各部室及事业单位负责同志、信息员，全省各地级以上市侨联负责同志、信息员，部分高校侨联、省侨联直属社团信息员近 90 人出席开班仪式。

9 月 28 日　省侨联召开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总结会议。李丰主席主持会议并讲话，戴文威副主席对省侨联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作总结，谢惠蓉副主席通报省侨联领导班子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专题民主生活会情况。

9 月 28 日　谢惠蓉副主席在广州出席省侨联直属团体会员工作交流活动。

9 月 28 日　林克风二级巡视员出席江门归国华侨文物文献史料特展开幕仪式。

9 月 30 日　李丰主席在广州参加广东省广州市公祭烈士活动暨向广州起义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

10 月 Oct.

10 月 8 日至 9 日　林克风二级巡视员赴中山开展工作调研。

10 月 10 日　戴文威副主席在机关会见美国北加州广府人联谊总会执行会长雷华钦一行，并举行座谈交流。

10 月 10 日至 19 日　谢惠蓉副主席率团访问法国、葡萄牙、西班牙。访问期间，开展侨情调研，慰问华侨华人，拜访华侨

华人社团，走访华商企业，宣讲第十一次全国侨代会精神，并与三国有关社团和机构代表、省侨联海外顾问和委员等座谈交流。

10月11日　李丰主席在广州调研粤芯半导体公司，林克风二级巡视员、陈农灏秘书长参加调研。

10月12日　李丰主席、陈农灏秘书长在机关会见广东省广府人珠玑巷后裔海外联谊会会长陈耀光一行，并举行座谈交流。

10月12日　李丰主席、陈农灏秘书长在机关会见广东省侨界海外留学归国人员协会会长梁日辉一行，并举行座谈交流。

10月12日至19日　戴文威副主席率团访意大利、阿联酋。访问期间，在所到国家召开多场侨界座谈会，深入侨社，走访侨团，看望侨胞，调研侨情，倾听侨声，共话发展，宣讲第十一次全国侨代会精神，介绍广东经济社会发展和侨联工作情况，并与中国驻外机构进行工作交流。

10月13日　曹堪宏二级巡视员出席第二届广州新侨联谊会理事就职典礼和广州华侨博物馆“侨胞之家”揭牌仪式。

10月13日至22日　庄有林二级巡视员率团访问老挝、泰国、菲律宾。访问期间，访问团拜访华侨华人社团，走访侨商侨企，开展侨情调研，出席菲律宾广东总商会第二届理事会就职典礼暨商贸慈善活动，宣介第十一次全国侨代会精神，介绍广东经济社会发展和广东侨联工作情况，与有关侨团侨社开展座谈交流。

10月18日　李丰主席、陈农灏秘书长赴中山出席全美俊英工商会第二十届恳亲大会并开展工作调研。

10月18日至19日　林克风二级巡视员赴汕头出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广东实践”第四场研讨会。

10月19日至20日　林克风二级巡视员赴潮州开展工作调研。

10月20日至29日　曹堪宏二级巡视员率团访问新西兰、澳大利亚、斐济。访问期间，访问团拜访驻外使领馆和华侨华人社团，宣介第十一次全国侨代会精神，调研当地侨情和经贸文化交流情况，鼓励和引导海外侨胞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10月22日至23日　李丰主席、林克风二级巡视员出席东莞市第八次归侨侨眷代表大会并开展工作调研。

10月25日　林克风二级巡视员赴深圳出席“光明的城·幸福的侨”纪念侨归45周年主题大会。

10月26日　戴文威副主席在机关会见英国惠东宝同乡会主席邓桂芳一行，并举行座谈交流。

10月27日　李丰主席出席云浮市第五次归侨侨眷代表大会并讲话。

10月27日　戴文威副主席在机关会见河南省侨联副主席刘智良一行，并举行座谈交流。

10月28日至11月1日　2023（第三期）青年华商研习班在广州举办。李丰主席出席开班仪式并讲话，谢惠蓉副主席主持开班仪式并出席有关活动。

10 月 29 日至 11 月 3 日　中国侨联副主席到我省广州、江门、梅州等地出席广州华侨博物馆分馆挂牌仪式、参加中国博物馆协会华侨博物馆专业委员会 2023 年年会全体会议和第六届世界客商大会等活动，并开展工作调研。李丰主席、戴文威副主席、陈农灏秘书长等陪同参加有关活动。

10 月 30 日　戴文威副主席在机关会见马来西亚大埔（茶阳）社团联合总会会长杨博耀一行，并举行座谈交流。

11 月 Nov.

11 月 2 日至 3 日　李丰主席率省侨联领导班子赴梅州出席第六届世界客商大会并到梅江区城北镇调研驻镇帮镇扶村工作。戴文威、谢惠蓉副主席，陈农灏秘书长参加调研活动。

11 月 6 日　谢惠蓉副主席在机关会见旅美三邑总会馆主席杨国兴一行，并举行座谈交流。

11 月 7 日　李丰主席、戴文威副主席在机关会见加拿大广府人联谊总会创会会长马威廉、加拿大粤商总会会长林少毅一行，并举行座谈交流。

11 月 8 日　李丰主席在广州出席 2023 粤港澳大湾区全球招商大会。

11 月 10 日　李丰主席赴深圳出席“侨胞之家”揭牌仪式暨归侨文化艺术节并调研。

11 月 11 日　李丰主席赴江门台山出席第十届世界台山宁阳会馆（同乡会）联谊大会。

11 月 11 日　戴文威副主席出席 2023 第二届高明恳亲大会暨招商引资推介会相关活动。

11 月 12 日　谢惠蓉副主席在广州出席孙中山先生诞辰 157 周年纪念仪式。

11 月 13 日　谢惠蓉副主席在机关会见美国夏威夷广府人联谊会会长何富翔一行，并举行座谈交流。

11 月 13 日至 14 日　李丰主席、戴文威副主席在广州参加全省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和全省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

11 月 13 日至 15 日　谢惠蓉副主席赴北京出席第十一届国际潮青联谊年会。

11 月 14 日　由省侨联和广州市侨联联合主办的“亲情中华·风韵南粤”第九届（广州）华人文化艺术节“向着光”文艺展演在广州市文化馆新馆举行，来自世界五大洲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侨胞和港澳台同胞，以及海内外文化艺术专业人士、侨界群众近千人齐聚侨乡广州，同襄盛会、同叙情谊。中国侨联副主席、广东省侨联党组书记、主席李丰，广州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王世彤，中国侨联副主席、澳门归侨总会永远会长刘艺良，广州市侨联党组书记、主席卞勇以及海外华侨华人代表、中华海外联谊会副会长梁冠军

等领导嘉宾出席。何镜堂院士为艺术节发来贺信。

11 月 15 日　李丰主席、谢惠蓉副主席在广州出席 2023“一带一路”和粤港澳大湾区涉侨法律服务交流会。

11 月 16 日至 17 日　李丰主席、陈农灏秘书长赴肇庆出席第四届世界广府人恳亲大会。

11 月 18 日　戴文威副主席赴澳门出席茂南同乡会第三届理监事就职典礼并到珠海调研侨联工作。

11 月 20 日　李丰主席在广州出席广东省侨联新侨创新创业联盟 2023 年会并讲话，谢惠蓉副主席主持年会。“广东侨创联盟”创会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何镜堂出席年会并讲话。

11 月 20 日　李丰主席、戴文威副主席在机关会见美国湛江华侨联合总会、世界雷州半岛联谊总会访问团一行，并举行座谈交流。

11 月 20 日　戴文威副主席在机关会见美国湛江华侨联合总会主席黄益荣一行，并举行座谈交流。

11 月 20 日　戴文威副主席在广州出席捐赠飞虎队等历史文物暨感恩晚会。

11 月 20 日至 29 日　林克风二级巡视员率团访问荷兰、奥地利、匈牙利，拜访中国驻外使领馆及当地华侨华人社团，走访华商企业、文化中心及相关机构，开展侨情调研，出席匈牙利禅武国际联盟总会成立 20 周年庆典。

11 月 22 日　李丰主席、戴文威副主席在机关会见美国纽约广府人总会主席罗少领一行，并举行座谈交流。

11 月 23 日　谢惠蓉副主席在广州出席“侨爱南粤·省潮联妇委会公益基金”捐赠仪式。

11 月 24 日　谢惠蓉副主席出席“海外青年才俊聚东莞”启动仪式。

11 月 25 日至 28 日　李丰主席赴香港、澳门出席香港侨界社团联会第八届会董就职典礼活动和澳门归侨总会 55 周年会庆活动，并在珠海开展工作调研。

11 月 27 日　曹堪宏二级巡视员出席省工商联成立 70 周年庆祝大会。

11 月 27 日　谢惠蓉副主席赴香港出席香港华侨华人总会成立 30 周年庆典活动。

11 月 27 日至 29 日　戴文威副主席赴河南出席由中国侨联、河南省政府主办的中国侨商（河南）投资大会。

11 月 27 日至 12 月 1 日　广东省侨联第十五期海外联谊研讨班在中山大学举办，来自 30 个国家和地区 40 多名海外社团负责人参加。谢惠蓉副主席出席开班式和结业仪式并致辞。其间，研讨班一行赴中山、珠海市开展现场教育和考察活动。

12 月 Dec.

12 月 1 日　戴文威副主席在机关会见阿

联酋、广东（粤）商会暨同乡会执行会长元永佳一行，并举行座谈交流。

12 月 2 日　陈农灏秘书长在广州参加第十七届世界海南乡团联谊大会欢迎晚宴。

12 月 3 日　戴文威副主席在广州参加第十七届世界海南乡团联谊大会开幕式。

12 月 5 日至 6 日　李丰主席出席汕尾市第三次归侨侨眷代表大会。

12 月 11 日　广东国际华商会第五次会员代表大会系列活动在广州隆重举行，来自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内外侨商嘉宾出席活动。省政协副主席李心，中国侨联顾问、中国侨商联合会常务副会长李卓彬出席活动并讲话。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理、监事会，金利来集团有限公司主席兼行政总裁曾智明当选为第五届理事会会长，第三届、第四届理事会会长郭泽伟当选永远荣誉会长。李丰主席，戴文威、谢惠蓉副主席，陈农灏秘书长等出席活动。

12 月 13 日　李丰主席、陈农灏秘书长在机关出席省涉侨维权工作联席会议。

12 月 17 日　戴文威副主席出席珠海侨青助力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暨第一届理监事就职典礼。

12 月 18 日　谢惠蓉副主席在机关会见荷兰广东华商总会荣誉主席陈煜钊等一行，并举行座谈交流。

12 月 21 日　李丰主席出席华南农业大学侨联成立 40 周年庆典暨首届“华农侨界农业文化节”活动。

12 月 22 日　李丰主席在机关会见加拿大社团联合总会主席齐佳一行，并举行座谈交流。

12 月 25 日　谢惠蓉副主席在机关会见新西兰潮属总会主席许少波一行，并举行座谈交流。

12 月 25 日　谢惠蓉副主席在机关会见澳大利亚墨尔本广州联谊会主席黎仲祥一行，并举行座谈交流。

12 月 26 日至 28 日　谢惠蓉副主席在广州参加省政协十三届四次常委会议。

12 月 27 日　广东侨界青年联合会第四次委员大会在广州召开，来自世界各地近 200 名侨界青年代表出席会议。李丰主席出席大会并讲话，戴文威副主席主持大会，陈农灏秘书长当选省侨青联第四届主席。

12 月 28 日　广东侨界支援甘肃地震灾区捐赠仪式在省侨联机关举行。李丰主席出席捐赠仪式并讲话，戴文威副主席、陈农灏秘书长参加捐赠仪式。

12 月 28 日　戴文威副主席、林克风二级巡视员在广州出席广东华侨历史学会第八次会员代表大会并讲话。

12 月 29 日　李丰主席在广州参加省委十三届四次全会暨省委经济工作会议。

12 月 29 日　戴文威副主席在广州出席广东省侨界作家联合会第十次会员代表大会并讲话。

陈燕铭：长路漫漫，“医”心向糖

文 / 《华夏》记者　赵阳欢

陈燕铭出生于一个爱国归侨家庭。她的祖父陈德懋，原名木松，字介夫，号洪阳山人，于 20 世纪 20 年代就读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师从中国近代美术教育事业的奠基人、著名画家徐悲鸿、吴昌硕，擅长画虎，人称“老虎先生”。陈德懋毕业后远赴越南、泰国开画展，因战势时局之迫，不得已暂寄居当地。1949 年 10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冲破了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同时也令无数海外游子兴奋不已，陈燕铭的祖父自然也不例外。他当即决定举家归国，回到了故土家园汕头，成为一名人民教师。陈燕铭的父亲在诗书家风的影响下，诗礼传承，文脉赓续，成为了华南农业大学的一名教授。

在陈燕铭父亲的心目中，医生是一个无比崇高与神圣的职业，鲁迅远渡东洋由医而文、志在救人，在和平年代更需要这样的志向与抱负。因此，在女儿很小的时候，就对她的未来充满殷殷期许。

受父亲的影响，1987 年陈燕铭毕业于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以优异成绩考入中山医科大学（现为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成为该校最后一届六年制医学生。大学毕业后，她顺利进入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成为一名内科医生，师从名医吴伟康教授和曾龙驿教授。

她的工作生活在安常处顺中稳中求进，但她母亲的糖尿病改变了她的职业预想。由于没有及早发现与治疗，她母亲的病情诱发了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我当时就觉得，如果我对糖尿病有多一点了解，能够提早发现，母亲的病情就不至于这么严重。”推己及人，反求诸己，她渐渐对

陈燕铭，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副院长。从事内分泌与代谢病内科工作近 30 年。研究方向：糖尿病及其血管并发症、肥胖症、干细胞治疗糖尿病、甲状腺疾病等疑难重症病的临床与机制研究。作为负责人主持国家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自然基金、省重点研发项目等课题 10 余项。发表论文 80 余篇，获得国家软件著作专利 8 项，作为第一完成人获得省科技二等奖 1 项、主编或参编专著 4 部。

内分泌学科特别是糖尿病产生浓厚的兴趣。一次难得的机会，她在 2009 年到美国中南部著名的糖尿病中心深造，师从 Sarah Xin.Zhang。严谨认真的学术氛围深深地感染了陈燕铭，她如饥似渴地沉浸在科研实验中。在导师的指导下，她在短短两年时间发表了两篇高质量的文章，首次报道了内质网应激在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中的重要致病机制。这些都是陈燕铭后续近 30 年耕耘于“抗糖战场”的原始动力。在恩师的谆谆教诲及同事家人的支持下，如今，陈燕铭已成长为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副院长、内分泌与代谢病学科带头人、中山大学糖尿病研究所所长、广东省糖尿病防治重点实验室主任。坚持勤深于一线的她早已实现了当时的理想：让患者能尽早筛查，防范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发展，减轻他们的痛苦、提高生活质量、延长寿命。

糖网筛查：她用匠心攻克难题

“医生，我只是得了糖尿病，但眼睛没毛病，双眼视力 5.0，为什么还要检查我的眼睛？”在门诊中，不少内分泌医生都会听到患者这样或那样的疑问。很多患者认为自己血糖高，只要吃药或者打胰岛素就可以了，无关身体的其他部位。然而，正是由于这一小小的误识，往往会给患者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

在糖尿病的众多并发症中，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以下简称“糖网”）是极其常见而又非常容易被漏诊的一种。糖网最严重的后果会导致患者失明，是工作年龄人群致盲的首要原因。据相关数据统计显示，糖尿病患者 5 年后糖网发生率为 25%，10 年后糖网发生率为 60%，15 年后糖网发生率为 80%。关键在于早期筛查、早期预防，最大限度保留患者的视力，延缓失明的发生，若发现不及时，到出现视网膜脱离才去治疗，则很有可能失明。

糖网早期可能是毫无症状的，但绝不可掉以轻心。一般而言，未患有糖网的糖尿病患者至少每 1—2 年复查 1 次眼底，确诊糖网者则应遵医嘱增加检查频率。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尽管医生们反复强调眼底筛查的重要性，但“无病去医院”都是人们所避恐不及的。即使是随着人们医疗观念的更新以及医疗水平的提高、医学常识的普及，但对于时间碎片化的现代人来说，去医院检查的成本太高了，无论是时间还是金钱方面。了解到这一情况，善于从患者角度解决问题的陈燕铭开始思考：如果把眼底筛查的流程简化，把检查安排在距离患者更近、更便利的社区医院呢？她开始着手开展真正有温度的医疗技术、简化筛查就医流程的科学研究。

早在 2015 年，陈燕铭带领团队联合中山大学公卫学院、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云康广州达安临床检验中心等机构成立课题攻关组，经过六年的深入研究，课题组完成了“基于视网膜病变监测体系的糖尿病社区互联网健康管理平台的构建”，探索总结出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照

诊分离、分级协同”的防治模式，对糖尿病社区互联网健康管理模式进行了进一步探索，制定了国内第一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筛查的行业指南。

传统的眼底检查需要给患者散瞳，而散瞳会导致患者在 4—6 小时内视力模糊、畏光，给患者的工作、生活带来不便。为此，课题组特别研发了免散瞳的眼底照相设备。“与以往眼科使用的眼底照相设备相比，这套设备可由全科医生操作，降低了筛查的门槛。”陈燕铭表示，用这套设备拍摄的眼底相片不需要极高的清晰度仍能被有效识别，不仅免去检查给病人带来的生活不便，也更利于一些设备条件有限的基层医疗机构使用。课题组还研发了“糖尿病视网膜病人工智能（AI）筛查一体机”，建立了智能糖网 AI 阅片平台，通过利用深度学习对眼底图像质量实时自动分析，避免了传统人工质控效率低而且一致性差的问题，可帮助患者快速筛查糖网病变，提早预防致盲风险。据陈燕铭介绍，AI 眼科医生的筛查准确率高达 93%，“相当于一位有着副高以上职称的眼科专家在阅片”。

目前，该项目已在全国 100 多家社区医疗机构进行试点，为社区提供眼底照相设备，使糖尿病患者自我管理率从 16.6% 上升到 33%，视力损伤风险显著降低，年人均用于糖尿病及并发症治疗费用降低 33.25%。课题组联合全国多家医院推动制定了首部《糖尿病相关眼病防治多学科中国专家共识》，规范糖尿病血管并发症的管理及治疗路径，并在全国推广应用。上述成果获得广东省医学科技奖（二等奖，2021 年），以《糖尿病精准管理及视网膜病变筛查平台的建立和推广应用》荣获 2023 年广东省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八科医生帮你减重：她用初心守护“福友”

最新流行病学调查显示，中国成年人糖尿病患病率为 12.8%，患者人数超过 1.3 亿，大约还有 3.5 亿人处于糖尿病前期状态，其中 80% 的糖尿病患者存在超重或者肥胖。“我们就希望能够把关口前移。也就是说通过科学的方法管理体重，来预防糖尿病。”陈燕铭介绍道。

以此为切入点，2020 年中山三院“减重降糖联合门诊”正式开诊，在国内创新

陈燕铭的父亲是爱国归侨，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机械系，曾任华南农业大学侨联主席；母亲是遗传学专家

性开展“3+N”新模式管理糖胖病患者。“3”即“营养＋运动＋心理”干预，“N”即采用西药、中医药、针灸或者微创代谢手术等治疗手段，为患者提供个性化、一站式诊疗服务并追踪随访。“在我们这个门诊挂一个号，可以同时看八个科室的医生。营养科可以为患者制定个体化减重饮食方案；康复科可以指导患者科学运动，避免运动损伤；针灸科可以给患者进行针灸、埋线减肥治疗……”

记得一位满脸愁容的中年男子慕名从新疆来到陈燕铭门诊，因为重度肥胖同时患有糖尿病、高血压、痛风、脂肪肝，更为严重的是合并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导致严重缺氧，由于睡眠呼噜声震耳欲聋、时断时续，严重影响夫妻关系，身心俱疲。陈燕铭仔细询问病史、体格检查，认真诊断与鉴别诊断，启动“3+N”新模式精准诊疗，使用微创代谢减重手术成功施治，解除多年顽疾，患者妻子及妈妈感激不尽，专程从新疆来到中山三院送锦旗。

患者的真心笑容就是对医者最大的鼓励。自开诊以来，陈燕铭带领团队已为逾千名重度肥胖症患者诊治，体重半年内在原来基础上平均下降 10%—15%，总有效率达 80% 以上，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把三甲医院开到老区：她用真心温暖两座城

一家二甲医院想要升为三甲医院到底有多难？陈燕铭对此深有感触。自 2014 年开始，她带领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粤东医院完成了从二甲到三甲、从山区县医院到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华丽涅槃。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粤东医院前身为创建于 1937 年的梅州市梅县人民医院。曾经，因医疗基础设施不完善、检查检验设备落后、医生技术能力不足等问题，梅县人民医院一度陷入“方便不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实力不如三甲医院”的尴尬窘境。

为寻求突破，梅县区按照三级甲等医院标准重新选址建设梅县人民医院新院区，与中山大学、中山三院签订托管框架协议，全权委托其经营管理，2014 年 10 月正式冠名为“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粤东医院”，同时启用新院区。正式托管之后，中山三院采用垂直纵向延伸管理模式，以期充分发挥优势医疗资源，并将粤东医院作为分院区之一进行布局。在“垂直托管—分院区布局”模式下，中山三院委派既具丰富临床经验又熟悉医院管理建设理念的陈燕铭担任粤东医院常务副院长。陈燕铭也开启了她长年如一日的两地工作模式：每周一在广州中山三院，周二至周五在梅州粤东医院。

陈燕铭到任后，带领中山三院专家团队在粤东医院深入开展工作，全力以赴促进优势医疗资源、高层次人才下沉。2016 年 11 月，粤东医院正式启动任重而道远的“创三甲”计划。

三级甲等医院是依照中国现行《医院分级管理办法》的规定划分的医疗机构级别，是医院的最高评审级别，代表了一家医院的整体水平和综合能力，共有 638 个

条款，包含了科室情况、工作制度、应急预案、科室管理、科教管理、质量与安全管理、医德医风、院感管理等方方面面，事关生命健康，每条每款都细致严格的规定和评审方法。

“致广大而尽精微”，在 2014 年至 2016 年，陈燕铭带领中山三院派驻专家团队与粤东医院全体干部职工反复研讨，不断推翻不断更新，制定、修订系列规范性文件，完善管理制度近 800 项、应急预案 60 项，开展多种形式的演练、培训和考核近 3000 场，完成 PDCA 项目近 200 个。通过不断查漏补缺、持续改进，医院行政管理水平、医疗质量、服务能力均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患者满意度也不断提升。这背后是全院团结一致、齐心协力，践行《希波克拉底誓言》的努力与付出。那段时间，全院上下都累得像是“被扒了一层皮”，每天下班后，还要加班加点地学习《十八项核心制度》《评审应知应会手册》等，对标对表梳理科室的优势与不足，找短板、补差距，脚踏实地把想法落到实处。有的医生回忆说：“当时每天晚上回家的时候孩子已经睡了，第二天早起上班的时候孩子还没醒，孩子一周也没见着我一面。”

决心和干劲儿有了，还要有正确的方向和方法。托管虽好，但粤东医院的未来不能一直作为“附属”而存在，中山三院专家团队固然为医院的发展打开了局面，但本质还是要激发粤东医院全体员工的内生动力，陈燕铭在思考：如何从“要我发展”转变为“我要发展”，从输血变成真正的造血，打造一支带不走的队伍？专家团队通过建章立制、奖惩激励、培训学习，凝练形成文化氛围，强化当地医务人员对中山大学文化、中山三院精神的价值认同和自我认同，推动当地职工“勤练内功”，极大地提高了粤东医院“原生”战队的持续创新能力。

在中山三院总部的领导下，陈燕铭带领专家团队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基础，粤东医院实现了“三年晋升三甲医院，六年广东省高水平医院，九年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跨越，成为粤东地区医疗新高地。

2020 年，陈燕铭再度临危受命，远赴江西南昌支援建设革命老区医疗事业，聘任为中山大学附属南昌医院院长、党委副书记。有了粤东医院管理经验的“他山之石”，她在开展工作时更加有条不紊，游刃有余。在对老区医疗情况、南昌医院现状有了深入的调查了解之后，她坚持认真贯彻落实党委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针对新老医院交接、职工情绪不稳、信心不足等问题，制定出“重点抓思想教育、抓基层党建工作”的工作方针，完成了 13 个支部党员活动室建设，其中眼科党支部作为“六好”基层党支部接受了南昌市委组织部的验收。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南昌医院诊疗量、手术量明显增加，逐步发展成江西地区及周边老百姓认同的医疗品牌。

家国情怀：她用暖心做好“侨”文章

作为华侨的子女，陈燕铭对于祖国的

陈燕铭当选中国侨联常委

热爱与感恩是从来没有改变过的。2020 年农历大年三十，新冠疫情刚刚暴发，作为广东省侨联常委、中山大学侨联副主席的她主动联系广东省侨联、广东省侨界海归协会与广东省侨界仁爱基金会，发动侨胞捐赠款物，并得到了各方积极响应。而当抗疫进入“白热化”，在前线的巨大消耗使得各类医疗物资变得极度缺乏的危急时刻，她更是迎难而上，日夜奔走，以实际行动践行着“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发动多方力量，与时间赛跑，想方设法为一线医护人员筹措抗疫物资。一批批医用口罩、N95 口罩、防护服、防护眼镜、手套、体温枪等防疫抗疫物品越洋而来，为一线抗战医护人员撑起安全屏障。

如今，已是中山大学侨联主席的她，为探索和推行“地方侨联 + 大学侨联 + 校友会”的工作模式，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智力需求、高校的人才需求、新归侨的发展需求相对接，多次带队到中山市调研，到梅州市开展义诊活动等。在第十一次全国归侨侨眷代表大会上，陈燕铭当选为中国侨联常委。

面对荣誉，她不改初心，依旧谦逊务实，励精笃行。她认为，在祖国建设中，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是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我希望能用不同的方式来传达正能量，充分发挥高校和研究所中科技强国、科技创新、科技攻关的主力军作用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回顾多年橘井杏林路，从一名普通医生，到对糖尿病的精深钻研，再到现在兼备专业与管理能力的医者，陈燕铭感慨万千。她最挂心的，还是饱受糖尿病折磨的病人，尽管现在医疗水平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缓解病人的痛苦，但人们对糖尿病早期以及各种并发症却知之甚少，以致于错过最佳治疗时间。有相当一部分病人的心理健康也是临床治疗中的一个极易疏忽的方面，更有一些患者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而“胡乱”用药等等现象依然存在，为此，陈燕铭呼吁全社会一起，积极营造良好的宣传氛围，提高大家对糖尿病危害和防治重要性的认识，让更多人了解和掌握糖尿病以及其他常见慢性病的预防措施和早期征兆，为最大程度地减少疾病对人生活的影响和建设健康广东而共同努力。

黄建华：字里人生，编舟渡海

文 / 《华夏》记者　钟敏仪

再次拜访黄建华教授，是在一片书海里。走进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北校区行政楼二楼一间简朴的办公室，我们见到了满头银发的黄建华埋首在书堆里。他佝偻着背，一双睿智的眼睛透过银框眼镜，正在逐行点校订正摊开在办公桌面的《汉法大词典》。

在这满室的书香里，我们带来了黄建华教授当选第四届世界广府人“十大杰出人物”的贺信。其实，这位原广州外国语学院院长、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首任校长，将一生奉献给了教育事业和辞书事业，早已荣誉等身：1986 年获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事部“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1989 年获“全国优秀教师”，1994 年获法国政府颁发的棕榈军官勋章，1999 年获“南粤杰出教师”，2000 年获得“全国师德先进个人”，2006 年被中国辞书学会授予“辞书事业终身成就奖”，2015 年获授“南粤楷模”荣誉称号……

千帆过尽，已近鲐背之年的他，眼里心里依然是浩瀚的词海。

缘结法语

1936 年，黄建华出生于广州一个贫寒家庭。因为他是家中长子，还有四个兄弟姐妹，所以自懂事起，他就每天跟着父亲干活补贴家用。他喜欢读书，但家中经济条件不允许，加上文化程度较低的父母不同意，因此他一直求学未果。

黄建华的第一次命运转折点发生在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这一时期，国家学风渐盛，黄建华家中经济也有所改善，从未放弃求学梦的黄建华再次向父亲提出上学请求。父亲的工友也帮忙劝说：“这个孩子很勤奋，让他读书吧。”最终他获得了走入学堂的机会。

黄建华修订《汉法大辞典》，字里行间都倾注了他的心血

黄建华倍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就像一块干海绵掉进了水里，如饥似渴地汲取知识。1957 年，他迎来了第二次改变命运的机会。这一年，他参加高考，恰逢中山大学刚筹备成立的法语专业招生。怀有文学梦的他，那段时间深受法国文豪莫泊桑、巴尔扎克等作品的影响，为法语世界的魅力所吸引，于是便投报了中山大学的法语专业。就这样，21 岁的黄建华成为中山大学第一届法语专业的学生，师从著名诗人、翻译家梁宗岱。从此，黄建华便与法语结缘。

“那一届只招了 10 个学生，师资力量雄厚，老师数量比学生还多。”黄建华回想起在中山大学求学的时光。完全没有法语基础的他，开始时学得很吃力，练发音练到“咬牙切齿”。后来在梁宗岱等老师的悉心教导下，黄建华以勤补拙，大多数时间都泡在图书馆，学习成绩便很快提上去了。大学的苦读，为他日后在教育界和法语翻译方面的成就打下了基础。

毕业后，黄建华留校任教。

1970 年，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对广东高校实行“调、并、迁、改”，中山大学外语系，暨南大学外语系、外贸系以及广州外国语学校并入广州外国语学院，同时更名为“广东外国语学院”（1977 年恢复广州外国语学院的校名，1995 年广州外国语学院和广州对外贸易学院合并组建成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黄建华与业师梁宗岱一起从中山大学转至广东外国语学院（以下简称“广外”）任教，开始了他的广外生涯。

在广外，他迎来了人生的第三个转折点。

早在 1971 年，中国已恢复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随着改革开放的崛起，中国在国际上有了更多的话语权，有更多机会参与联合国事务。黄建华就是其中的幸运儿。1977 年，黄建华被教育部推荐应考进入总部位于法国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担任译审。

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没有条件留学的他，很珍惜党和国家给予的这个机会，在完成工作之余，努力提升自己。黄建华回忆起他在巴黎的一件蹭课趣事，“我常常去法国的大学蹭课。”内敛的他一开始只去大教室蹭课，但后来不满足于大教室的课程，又跑到小课室去“偷师”。有一次，黄建华选了一间教室，只有五六个人。陌生的华人面孔，他很快就被老师发现了。后来，老师被他渴求知识的真诚打动，让他继续听课。时隔四十多年，黄建华还清晰地记得为这段插曲写了一篇《求知者的乐园》的文章发表于报刊。

在巴黎那个流光溢彩的浪漫之都，黄建华度过了四年的“国际公务员”时光，日子过得还算惬意，但他没有迷失初心。他按规定自觉将在联合国工作所得的外币工资都上交给了当时外汇匮乏的祖国。因此，那时候同事们叫他一起喝咖啡，他总是觉得不好意思。“因为总是朋友们请我喝，我没钱请他们喝，人家以为我抠门。”黄建华笑着回忆道。

1981 年，黄建华放弃了定居法国的

机会，毅然回国发展。

词典之路

黄建华第一次接触词典编纂工作是在1975年。他偶然被安排主持《新简明法汉词典》（1983年出版）的编订工作。那时候的他没有经验，只能边学边编。他说这是“从战争中学习战争”。自此，词典学在他的心里扎了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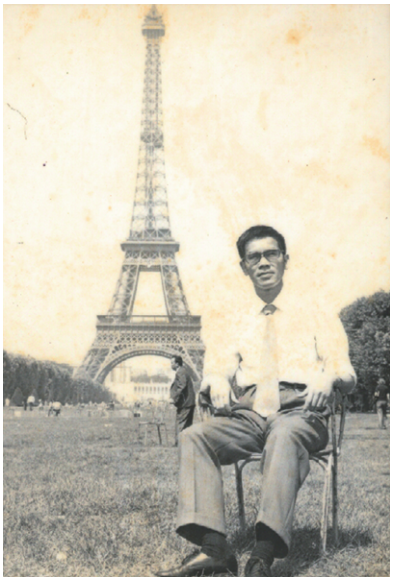
在巴黎工作期间，黄建华也没有忘记词典学研究工作。他一边搜集各种辞书词典和辞书学著作，一边抓住机会访问法国词典学家。其中，黄建华印象最深刻的是，拜访法国辞书编纂家、出版家罗贝尔。

黄建华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时，放在案头翻得最多的是法国规模最大的法语语文词典之一《罗贝尔法语词典》，其主编就是罗贝尔。“我想拜访罗贝尔先生，向他当面请教问题。”由于当时通讯不发达，黄建华只好找来电话本碰碰运气。电话本上有二三十个标注着“罗贝尔”的，他一个个挨着拨过去。幸运的是，他很快便打通了词典学家罗贝尔的电话。可惜的是，罗贝尔当下不在巴黎，只能另约见面时间。“我们是在他下榻的酒店见面的。”黄建华回忆说，罗贝尔回到巴黎后就约他相见。与罗贝尔的交谈，让黄建华更加深刻地意识到词典的重要性和未来的发展潜力。

回国后，黄建华便更加专注于词典学研究。

20世纪80年代，黄建华在广州外国

20世纪70年代末，黄建华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任译审，其身后是教科文组织大楼



黄建华在埃菲尔铁塔下留影

语学院创办了“词典学”这一新学科，使“词典学”成为原国际语言文化研究所主要学科，并培养了中国第一位词典学博士。如今，他桃李满天下，众多弟子已成为词典学领域的领军人物。

他还对词典问题做了诸多理论探讨，在《辞书研究》发表多篇文章，并于1987 年结集出版为《词典论》，成为中国首批系统论述词典编纂的专著，在辞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看来我的后半生再也不可能和词典分开了。”1988 年，黄建华在《辞书研究》的专栏里这样写道。他把词典称为“晚识的知己”，希望以自己的努力弥补早年错过的光阴。1989 年《词典论》获广东省优秀社科科研成果二等奖。2000 年，《词典论》修订本出版。

黄建华从书柜里抽出一本贴有“保留本”标签的韩文版《辞典论》。翻开简洁的封面，他给我们讲起了关于这个译本的来历。

2013 年春节期间，他接到一个陌生电话，对方说有一位韩国的教授希望翻译他的《词典论》，想征求他的意见。黄建华回复请其来函告知译者情况。之后此事却没了音讯，黄建华便以为此事不了了之。但过了几个月，他又接到来电，被告知《词典论》已翻译完成。2014 年 4 月，黄建华终于收到这份陌生的惊喜，才得知他的《词典论》已经韩国词典学会副会长、京畿大学国语国文系教授朴亨翼及其 3 名学生共同翻译完成并在韩国正式出版了，学术界称“给亚洲词典学理论研究注入新的活力”。

词典学对很多人来说仍然是陌生的，其成果更是难以被认可。在 2019 年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举办的“新时期辞书学与辞书发展研讨会”上，黄建华结合多年观察思考提出，因辞书工作和辞书成果评价脱节，导致这项光辉的事业难以吸引优秀青年学子。

“不少中外学者都反复强调语言学是一门领先的学问，但在现实生活中，情况似乎并非如此，且不说科研立项、拨款、评奖等决策运作方面许多时候都不如其他学科，就从纯学术角度而言，也常常显得比其他学科矮一截。”在《语言学论文集》小序中，黄建华表达了自己的忧虑。

虽然前路困难重重，但黄建华依旧奋笔疾书，为词典学发展鼓与呼。

编舟渡海

日本电影《编舟记》中有一句台词：“词语的海洋浩瀚无边，词典是那片大海中的一叶扁舟，人类靠着这叶名为词典的扁舟航海。”

辞海浩瀚，黄建华就是这编舟渡海者。

1998 年，年逾花甲的黄建华即将卸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校长职务。准备开始恬淡舒适的退休生活的他，却迎来一项艰巨的任务。

在词典学研究方面造诣甚深的黄建华接到一份来自北京的邀请——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请他主持编纂《汉法大词

为弘扬黄建华教授教学研究六十载之学术思想与学术精神，2021 年 10 月 16 日，中国辞书学会双语词典专业委员会在粤举办“《〈汉法大词典〉专题研究论文集》《黄建华词典学论文集》发布暨黄建华教授教研六十年研讨会”

典》。“国无辞书，无文化之可言。”词典是一个民族文化的基石，也是一叶可渡国界的扁舟，连接起丰富多元的世界文明，搭建起文化交流的桥梁。彼时，中国在自主编纂大规模汉法词典领域尚是一片空白。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抛出的橄榄枝，对他来说，是挑战，更是责任。

“编纂辞书是一项浩瀚的工程，不是一年半载就能见成效的，是一项要死心塌地去做才能做好的工作。”研究了大半辈子理论词典学的黄建华明白，这是一块“硬骨头”。一向治学严谨的他，并没有马上答应下来。他找了几位志同道合的年富力强的学者组成一个团队，才跟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签约接下了这个项目。然而，计划赶不上变化。一起签约的其他学者由于工作、身体等原因先后退出，编纂团队从最初的多人逐渐减少，最后独余黄建华一人。

着手研编词典前，黄建华先做了编辑方案，洋洋洒洒写了 15 页。他的构想是，《汉法大词典》不仅要“内向”，立足于中国读者学习法语的需求；也要“外向”，兼顾外国读者的需求，进而传播和推广中国优秀文化。

黄建华以《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和《现代汉语规范词典》作为选词本，同时逐个收入新词汇，包括方言词、港台词、科技词以及网络词等。但相较于法语翻译成汉语，将汉语翻译成法语要难得多。为精确翻译，黄建华自己摸索之余，还找了相关领域的专家和法国人商谈，字斟句酌，反复推敲。

自“编舟”以来，黄建华每天早上八点半到办公室，晚上十一点半才踏着夜幕归家，连节假日也不歇息。妻子和女儿都担心他的身体，常常劝他注意休息。女儿还用法语和中文写了一个“适可而止”的标语张贴在他的办公室，时刻提醒他不要太拼命。

白发苍苍的黄建华（中）上台接受第四届广府人“十大杰出人物”颁奖

2008 年，黄建华被查出患有肺癌，他不得不慢下来。手术、理疗、服药，一系列的治疗使黄建华的身体十分虚弱，但他仍然牵挂着《汉法大词典》的编纂工作。他曾问主治医生，他还能有多长时间？他计算着自己的生命是否能支撑到把词典编完。因此待病情稍有好转，他就抓紧时间伏案工作，与时间赛跑。然而病魔还是无情地煎熬着这位老人。2012 年，他再度住院，被确诊为肺癌第Ⅳ期，癌细胞已转移至骨头，让他食不知味、夜不安寝。他用坚强的意志抵抗着病魔，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仍然坚持从家步行到办公室，继续词典编纂。

终究，黄建华赢了这场与死神的赛跑。2014 年初，720 万字的《汉法大词典》初稿出炉。同年 12 月 8 日，《汉法大词典》新书发布会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举行。这部收词 11 万余条，700 多万字的《汉法大词典》，字里行间皆是黄建华的心血。这部词典是目前中国编纂的最大规模汉法词典，填补了业内空白。2018 年，《汉法大词典》荣获中国出版界最高荣誉——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

“编词典永远是个过程，不与时俱进地进行补充、修订，再好的词典也终将变成废纸。”《汉法大词典》出版数年后，如今白发苍苍的黄建华又踏上了词典修订的新征程，每日往返于相思河畔的小楼与行政楼之间，成为广外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他，是吾辈楷模。

侨批档案：抱诚为本传万里邮　守信立业牵游子情

文 / 刘雅琦　蔡燕婷（广东省档案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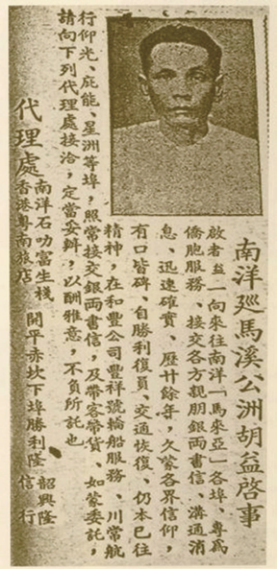
侨批业是指专门经营传递侨批的商业性服务行业，其发展经历了水客和批局两个阶段。无论是水客还是批局，都恪守“诚信经营”，始终把诚信作为立业之本，体现了海外侨胞笃诚守信、讲义修睦的高尚品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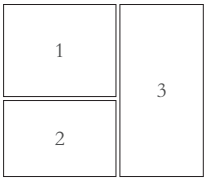
以诚信铺就的“水客”邮路

水客，就是经常往来于国内外，专为华侨带送侨批或物件的派送员。他们经常远渡重洋，四海为家，倚水为生，故名“水客”。在侨批业发展早期，由于各国金融邮讯机构尚未建立或极不完善，邮路不通，海外侨胞寄钱回家赡养亲眷的愿望只能由水客帮助实现。

水客在海外既无店号，又无分支机构，纯属流动性的个人经营，开展业务全凭个人信用。

水客的信誉度极高。出于对水客的信





1. 谢绍宣的水客证
2. 典型的水客封
3. 为广收侨批，水客会利用广告刊登信息，收揽批信。这是南洋“巡城马”（五邑地区对“水客”的称呼）胡益在侨刊上刊登的启事

任和熟悉，有时海外华侨甚至连侨批的收件地址都不写明。图 2 是一封典型的水客封，信封上没有收批地址，只写着“内信外银壹拾大元，敬烦李义云兄带至面交愚家叔姆钟氏开拆。由坝罗埠署仕康托”。信封的左上方盖着“李义云带信”的红印戳，此外再无任何印章和邮戳。

华侨、侨眷对水客信赖的基础是水客的个人诚信品德，水客业的兴旺发达恰恰印证了水客信誉之可靠。19 世纪至 20 世纪初，水客业逐渐兴盛，从业人员逐渐增多。仅在汕头一地，专送侨批的水客就超过 800 人；香港也有 200 人左右；梅州各县经营此业者先后累计达 952 人；五邑地区的水客则有千余人之多，频繁往来于省港澳与五邑侨乡之间。20 世纪 30 年代，每年经水客带回国内的批款多达国币 2000 万元，占全国汇款总额的 5.2%。作为侨批业先行者的水客，凭借个人诚信为海外华侨铺就出一条安全、放心的万里邮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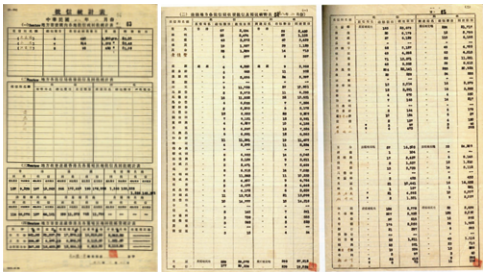
以诚信规范批局的运作规程

大约在 19 世纪 30 年代，为适应不断增长的侨批递送需求，经营侨批递送业务的批局应运而生并迅速发展，逐渐替代水客发展为侨批业的主流。据著名国学大师饶宗颐总纂的《潮州志·商业》统计，1946 年潮汕地区的批局共计 131 家，在南洋各地的潮帮批局达 541 家。在侨批业兴盛时期，潮汕地区 80% 的侨汇是通过批局汇入的。

在烽火战乱的年代里，批局恪守“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的信条，视诚信为立业之本，建立规范化的组织管理机制和信用制度，把一封封家书连同一笔笔汇款送到各镇各村、各家各户以及穷乡僻壤的侨眷手中，深受华侨信赖。

批局设有连接国内外的严密组织机构，一般会在海外华侨聚居地设立收集信款和分发回批的总局及分支机构，在国内侨乡等地设立经营侨批的头盘局（独立经营，直接在海外收信）、二盘局（接受海外各信局委托、办理转驳内地信件）、三盘局（受国内信局委托专营派送内地侨信）分别开展业务。

批局的运作流程严密，分为信款收集、头寸调拨、承转、派送解付等四个环节。尤其是“收”和“派”两个环节的流程十分规范，充分体现了批局的可靠信誉，让收寄两方都能放心。在信款收集时，汇寄人需严格填写收、寄方的姓名、地址、所汇款额，并附家书一封，家书中一般写有简短留言及所汇款额。汇寄人交妥有关资料后，收批者会给汇寄人一张收据作为凭证，再将汇寄人所填信息编号入



1939 年 2 月，汕头地方各批局收发批信及回批统计表，可见批局收发管理的规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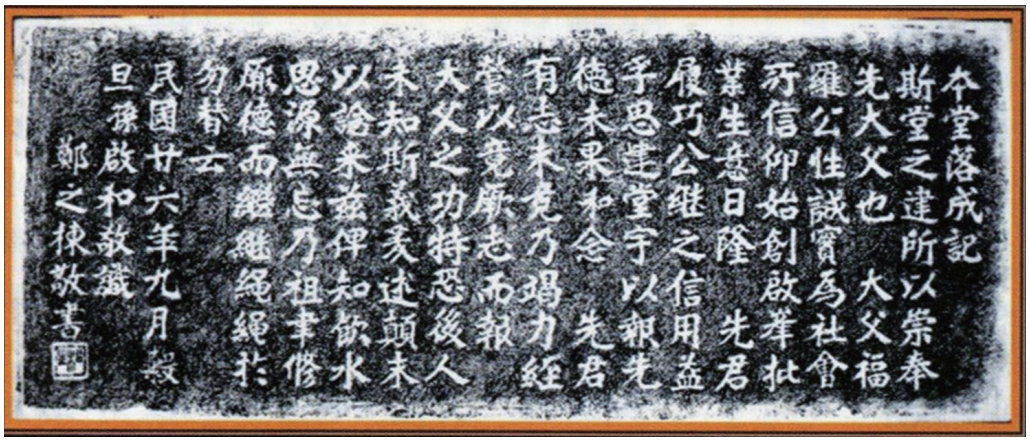
册。在派送解付时，批脚（批局的投递人员）会根据编号派送侨批。收款人收到批款后，即写回信一封，批局将其视为收款，俗称“回批”。有些批局会将“回批”对号按址送还汇寄人，同时取回先前所付给的收据。至此，整个流程才算完结。

1940 年，由印尼吧达斐亚（雅加达）梅州大埔籍郭善记信局批款兑银后撤回原票注销存据的“正票”“副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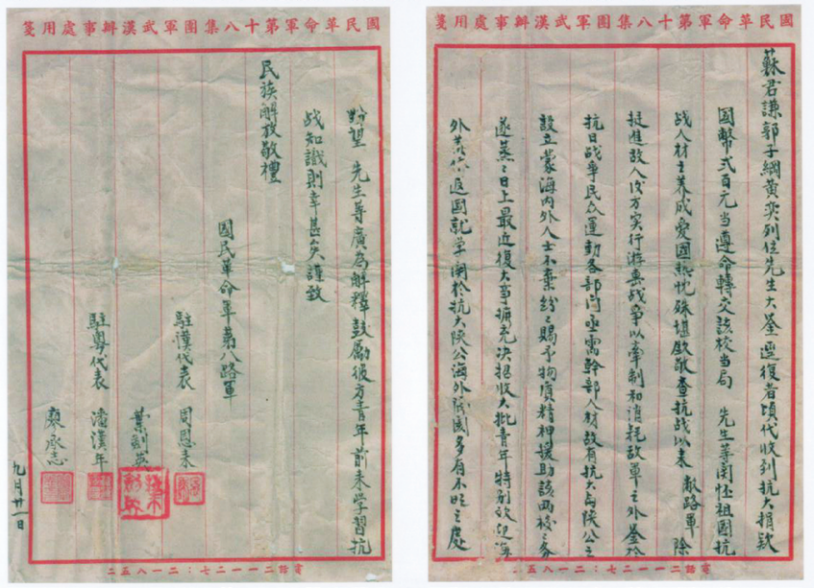
一诺千金的侨批汇寄

严格有序的组织流程为批局树立良好信誉提供了重要支持。但促使批局兴盛的，关键还是在于负责人和经办人的诚信品德。

魏启峰批局，是潮汕地区的著名批局之一。据杨群熙《潮汕地区侨批业资料》记载：“魏启峰批局鼎盛时期经办的侨汇总额约占全潮汕的一半。”该批局负责人魏启和视诚信为批局的命脉。有一次，暹罗（今泰国）批局寄来一批批信，但批款迟迟未到。魏启和与其长子魏茂中果断决定，无论以后批款如何，先由批局垫款，按批信所列汇款数额送至侨眷家中。此举深得华侨和侨眷的好评，批局“信用益孚”“生意日隆”。为了确保批局的良好



魏启峰批局碑文中赞颂祖父魏福罗和父亲魏履巧诚实的高尚品德：“大父福罗公性诚实为社会所信仰始创启峰批局生意日隆，先君履巧公继之信用益孚。”


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武漢辦事處用箋

蘇君謙郭子綱黃奕列位先生大鑒要復者頃代收到抗大捐款
國幣式百元当遵命轉交該校當局 先生等閭怡祖國抗
戰人材主美成愛國熱忱殊堪敬佩查抗戰以來 獻路軍除
挺進敵人後方實行游擊戰爭以牽制和消耗敵軍主外基於
抗日戰爭民衆運動各部同亟需幹部人材故有抗大為陝公主
設立蒙海內外人士不棄約之賜予物質精神援助該西校之參
遂基之日上最近復大事擴充決把收大批青年特別從沿海
外若尚返國就學開於抗大陝公海外歸國多有不曉之處

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武漢辦事處用箋

對望 先生等廣為解釋鼓勵彼方青年前來學習抗
戰知識則幸甚矣謹致
民族解放敬禮
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
駐漢代表 周恩來
駐粵代表 潘漢年
廖承志
九月廿一日

1938 年，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给信宁郁联社同人捐款支持延安抗大的回批

信誉，该批局用人也秉承以“德”为先的原则，一般都聘用知根知底、为人诚实可靠的人员作为批脚。由于选人以“德”、以“诚”为先，尽管许多批脚家境贫寒，生活艰难，却从未出现侵吞批款的情况。

广东省档案管里珍藏着一封来自延安的回批，在侨批档案库中，一般国内寄往国外的回批极为少见，像这样只见回批，不见来批的情况更是罕见。这封是 1938 年 9 月 21 日，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代表周恩来、叶剑英和驻粤办事处代表潘汉年、廖承志写给澄海信宁旅泰青年侨领苏君谦和他的同乡挚友郭子纲、黄奕三人的回批。当时国家正处于危难之际，苏君谦、郭子纲、黄奕三人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全民族抗日的主张，共同捐资国币 200 元，支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办学经费。这笔汇款是由建阳村在泰国开设的增顺批局用“口批”的方式寄汇的。因为当时日寇封禁形势严峻，倘若支援抗日的侨批被暴露，批脚、收件人等相关人员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所以用“口批”的方式寄汇较为稳妥。

“口批”作为一种特殊侨批，是对批局及批脚诚信的最佳试金石。一般寄批人只用“口头”向批局执事说定款额及收批人信息，批局执事在收批后直接面授最可信赖的批脚，再由批脚强记所带批款的数目和收批人的名字、地址。最能干的批脚能够一次记住几十乃至上百个“口批”。至于寄批人是谁？只有执事知道，批脚不必知晓。批脚到达目的地后，立即到兑汇的“银庄”用代号与密码“口头”支取，然后分送各处。千千万万成功寄汇的“口批”正是抱诚守真、讲信修睦精神的真实体现。

潮人过番

文 / 谢秋强（潮州市潮安区庵埠镇侨联会主席）

潮州人把出国谋生叫做“过番”，把出国谋生的人称为“番客”。潮州庵埠人过番，主要从水路上出海过洋，也有从陆路穿山越岭去到他邦。当然，大多数人还是乘着红头船过番的，那什么叫红头船？

其实，最初出海到南洋的远洋船只被称为海船，也称元宝船，到了清代雍正元年，朝廷为了便于管理，规定广东商船船头及大桅上部要漆红色，才被人们称为红头船。为什么船头漆为红色？是因为粤地位于中国南方，南方属火，用色为赤，赤即红色，故而船头用红油漆饰之。福建一带因住于东，东方属木，故用青色钩字，红头船的由来就是如此。

红头船最初为什么叫元宝船？因其造型头尾高翘，两边船舷弧形隆起比甲板高出很多，看起来像一个元宝，故而称其为元宝船。为什么船要建造如此之造型？据庵埠一些老船工和造船工人介绍，主要是为了阻挡海上汹涌的波涛。因为海上航行不比江河航行，江河上航行，波浪主要在前后，逆流大顺流小；而海上航行时常有波浪涌向船舷，为了阻挡波浪从船舷冲上甲板，致船舱进水，才将远洋船建成元宝形，这是古代造船人的智慧。

古代的元宝船（红头船）普通的大约长十丈，宽一丈多，高二丈多，船底有两层板，中间为空，一是起到浮力作用，二是如果搁浅触礁，第二层板也可以起到保护船体的作用。甲板下的船舱设有两层，每层高度比普通人身高略高，甲板后部设有观望房和贵客房，最后是舵室。舵室与观望房相通，但地面比观望房高出很多，顶棚也比观望房顶高出很多，因为只有这样，舵手才能看清海面情况。观望房主要住船老大和舵工。贵客房设在甲板之上，环境和空气较好，能住进此仓多是财主及其家属。据说贵客房能住四至八人，乘客每人有一个床位，属于是特殊待遇，故而每人收费相当于甲板下船舱睡通铺乘客之十倍。

最早的元宝船上的伙食（厨房）设在船头甲板下，因为当时造船者为了抵抗迎面而来的大波浪，船头设计得很高，为了不影响舵手视线，故而船头甲板上只能空置，不能建房，为了充分利用空间，便将甲板设为两级，前部高，中间低，前部甲板下之空间便成了伙食，伙食与观望房对向，若是发生什么火情，观望房也能及时发现。船头船尾甲板下设有水箱，据说，这两个利用船旮旯的水箱，一次能屯近万斤淡水，甲板上设有一条凹槽通水箱，下

雨时雨水可直接漏入水箱，可谓天然加水。厕所则十分简便，只在船尾舵位两边，伸出木板，中间挖空，如厕时直接从木板中间撒向大海，可见当时造船者之匠心。

红头船分货船、客船。货船船舱只有一层，此层载的货物主要是粮食、糖、香料等怕受潮的货物，甲板屯放的多是木材、藤条等不怕雨水雾气的物品。另一种虽说是客船，但常常客货两用，既载人也载货，如果船舱内乘客满员，货物便少收点，均屯放于甲板，若船舱内乘客较少，货物便多收点，船舱内人货混搭，总之，绝不空载少载，做亏本生意。

普通的红头船一般能乘载 100 人左右（含船工）和一二万斤货物，大型的红头船就不止这个数。当然，红头船也有一些比较大型的。据说，庵埠港曾停泊长十四五丈，宽二丈余，高五层的红头船。

庵埠地属亚热带，位于赤道低气压带和副热带之间，处于东北信风带的南缘。在夏季，南海是中国受台风影响时间较长的海域之一，这时间段潮州地区频繁受台风影响，农历八月份以后台风逐渐减少，因而过番者多是在农历八月份至十一月份出发。因南洋位于潮州之南，这时候北风正盛，此时，风正帆悬，顺水顺舟，正是下南洋好时机。出洋谋生的庵埠人便在庵埠港（清后期从樟林港），乘搭红头船，乘东北汛风出发，顺风一个半月方可抵南洋。而回乡却是与之相反，多是在春月，此时南风正直，正是从南往北的好时机。

庵埠人在什么时候，什么年代就有人过番？这无史可考，不敢妄断，在口口相传中，一些老者曾说元朝时文里村柯氏因惹了弥天官司，为了逃命，一夜之间合族外迁，分为两路，一路逃往丰顺，一路逃往海外。但传说总归是传说，就算是真，也缺乏相关资料佐证，故而不能以此断定元代就有庵埠人过番谋生。只能从各姓氏族谱去寻找，现发现较早过番到南洋的是文里村的鄞怀镜。鄞氏来自汴京，自宋代创居文里沙池后，生意兴隆，人家兴旺，子孙创居其他七个村，村村有鄞厝祠堂，而开基地沙池建有其大宗祠，称四德堂。鄞怀镜的出生时间，并非鄞氏族谱有载，而是在《凤廓郭氏族谱》中，发现一段记载：“十九世祖贞惠公，妣鄞氏妈，鄞怀镜之女也。妣生于万历丁未，终于崇祯戊辰。”从其女儿出生时间，推断鄞怀镜约生于万历初年。当时鄞家主要经营大米和糖类香料和调味品，明代后期在庵埠和南洋均有货栈。后来，鄞怀镜还创立了自己的船队。可惜，后来得罪郑成功，鄞家的家宅商铺被其所毁，家族人丁四处逃亡，也有一些改他姓，而鄞家原有的船只，全部被郑成功收归其船队，一方望族就这样沉落于世。

然后是郑希通，他生于乾隆 21 年，青年过番南洋，在庵埠和南洋均有货栈。

鄞怀镜和郑希通，这两位商界翘楚在当时均是响当当的富翁。

这是从众多族谱中，找到较早过番的史载文字，而这时间正是庵埠港最旺盛的时间。再之后就是大鉴村的陈美，相传也

是在乾隆年间，先当船工，往返于南洋与内地，后自己购船当老板，成了显赫一方的人物，其传说地方志书有载，但出生时间不明，其厝落至今还算保存完整。

庵埠人最初过番多是穷苦人，或者是商人，也有一部分是船工，随船出洋后留在他邦侨居，当然，也有惹祸而过洋避祸的。家道较富有，生活稳定之人家，清代中期之前极少有子孙去过番。后来这些较早到海外创业的先民，大多数还是事业有成，衣锦还乡，羡慕四邻，成为榜样。

潮州有一句俗语叫："鸭子跳东而西（意为跟风）。"一些人见人家过番者多创业有成，也就跟着到海外谋生，富裕人家也有人跟着过番。这样，过番的人也就渐渐多了起来，特别是在南洋有亲戚关系者，亲友更是成群结队前去投靠。

人们羡慕番客，是只知他们事业有成，福荫亲朋，大多数人不知华侨承受的苦难和艰辛。在科学技术落后，特别是陆路运输和航海业原始的古代，过番是生死相依的冒险旅程，陆路主要靠牛马车，但费用昂贵，大多数人凭双脚历经千山万水，步行至广西或云南出境，行程数千里，途中常遇地痞无赖的勒索和土匪的打劫，还有因为身体素质较差，很多人命丧于途中。一些人到了他邦，因长途跋涉，身体困倦，加上水土不服，一病不起，逝于他乡。如有亲朋在身边的，还有人照顾，收殓，若是身边没亲朋的……其境况实是让人不敢想象。

当时走陆路过番者，因中途遇匪盗被抢劫一空，且被殴打而致残无法回乡者甚多，留居途中事发乡村的大有人在，也有一些人乞讨到他邦或回家。

而水运即乘船也甚为凶险。风狂浪急、日晒雨淋的艰苦历程，让过番者九死一生。曾有一句老话："能乘船到达南洋，你就是阿爷（绅士）。"过去的阿爷，也就是乡里老大，在乡里最有话语权，故而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你成功了。

当时国内的航海技术落后，过番的船只体积较小，基本无设餐饮，虽有炉灶，但只是为船工们提供饮食，乘客基本无法与他们同餐，如要同餐，那收费十分惊人，而这些过番者大多是穷苦人家出身，只能自带食粮。那时过番者大多数人会带上一些炒米和炒面粉，再用一条浴布包上一笼甜粿背在背上，加上一些衣服被褥，俗称"包裹仔"，一个既可盛水，也可当碗的葫芦瓢和一个能装水的葫芦壳，就上船过番。这些粮食，就是整个旅程的粮食。有一些家穷者，带的干粮不够吃，就将带在身上准备到他邦后，撒于异域土地，能让自己顺服斯方水土的红井土拿去充饥，以致肚胀肚疼，有些人挺不过去便亡于船上。

船上淡水也紧缺，一般乘客一天只能得到免费的一二碗水，若要多喝，就要高价购买，因海上湿气大，晚上露水重，大家总会把毛巾系在两边船舷和桅杆上，天亮时毛巾吸满露水，成了湿巾，在缺少淡水的船上，成了旅客洗脸擦身之用水，下雨时，甲板成了公共浴场。

当时的航海业经常发生海难，这些海难既有天灾，也有人祸。天灾者有时是遇

万和桥是庵埠的庵江溪通往韩江的一座古桥。以前，番客都是乘船从这座桥底下过，再去换乘漂洋过海的大船

到突发的暴风雨而致船翻解体，有时是天气原因，如大雾难辨航道而触礁。人祸就是船工把舵不当致碰礁；或火头用火不当，致失火祸及乘客；再之就是倭寇和海盗拦截抢劫，船只若碰上倭寇和海盗，轻者钱财粮食衣物被洗劫一空，重者船毁人亡。明清时期的潮州，关于倭寇，关于海盗的传说多如牛毛，这些传说也多是出于番客之口，让行船者小心回避。

因为以上种种原因，好多人未到达目的地便葬身鱼腹，一去悠悠，家中亲人不知其所踪，以为他事业无成，不敢回家。还有一些成功者，在衣锦还乡的途中，遇海难而丧生。清代末期，就有一位旅居南洋的华侨，事业有成，寄钱回家盖了一座大厝，落成后他带着居于南洋的妻子和儿女，准备回乡举行进宅仪式，宴请亲友，但想不到途中遇上大风，船翻并解体，一家子就这样没了，这真是让人叹惜！如今，百余年了，他盖的三进双背剑大厝，还完好无损。

1860 年汕头开埠之后，庵埠港的红头船也就基本关停运，只存短途客运和内河货运，各国洋商和买办纷纷挤入汕头，各种招华工的活动非常频繁。洋船代替了红头船，万里波涛不再成为外出畏途，庵埠人过番和回唐山，都到汕头坐上安全快捷的电船（洋船）。

寻找归侨之歌创作者

文 / 《华夏》记者　钟敏仪

祖国啊！我们亲爱的母亲，时刻在想念着我们，日夜在关心着我们。

祖国啊！你不愿我们再流浪，千里迢迢特派船轮，迎接我们回家乡。

我们坐上了你的船，犹如摇篮愉快温暖，谁说我们祖国的春天，不来到我们的心田。

祖国啊！我们永远再不离开你，为了那幸福的明天，愿把一切献给你。

我们坐上了你的船，犹如摇篮愉快温暖，谁说我们祖国的春天，不来到我们的心田。

祖国啊！我们永远再不离开你，为了那幸福的明天，愿把一切献给你。

这是一首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回国的华侨之间传唱的歌曲——《祖国啊！母亲》。他们口口相传，从异国他乡一路唱回到祖国故土，传唱至今已有六十余载，是一首名副其实的归侨之歌。为寻找这首归侨之歌背后的故事，广东省侨联和阳江市侨联派出工作人员奔赴香港寻访相关人士，牵引出了一段悲壮的撤侨历史。

缘起

故事的开端，始于一个叫广东省岗美华侨农场的地方。

华侨农场，这个诞生于20世纪的名词，是中国在特殊历史时期设立的特殊单位。20世纪50年代开始，东南亚国家动乱频繁，有些国家甚至实施了排华和限制华侨政策，致使华侨华人流离失所，断绝生计。海外赤子的安危，祖国时刻惦念。彼时，正处于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排除万难，接回归难侨，并安置他们的生活，由此开启了新中国华侨农场建设的序幕。至20世纪70年代，为安置大规模排华产生的大批归难侨，中国政府在广东、广西、福建、云南等省区先后兴建了80多个华侨农场。其中，广东是安置归难侨最多的省份，成立了23个华侨农场。这些华侨农场犹如母亲的臂膀，将归侨难侨拥入温暖的怀抱。岗美华侨农场便是其中一个，护佑着归侨难侨的安宁，让漂泊无根的他们落地生根。

岗美华侨农场地处广东省阳江市中部偏南，位于江城区、阳春市、阳东县三地交界处，始建于1963年11月，由当时的阳春县岗美青年林场、合水林场、潭水葵场、马水农场合并组成国营阳春华侨林场，隶属广东省侨委管理。20世纪60年代开始，岗美华侨农场陆续接收了来自印

尼、越南、泰国、缅甸、马来西亚、新加坡、老挝、毛里求斯等 13 个国家和地区的归侨难侨近 4000 人，在这里开荒种粮，建设新家园。

六十载寒来暑往，曾经的荒山野岭早已蜕变为生机勃勃的发展热土，挂起了“阳江高新区岗侨工业园”的牌子，原农场前只留下一块“广东省岗美华侨农场”的石碑，铭记着那段数千名归侨挥洒青春热血的日子。而昔日从异国他乡归来的青葱少年少女也都已成家立室，甚至儿孙满堂，生活和美。

2022 年，阳江市侨联联合阳江广播电视台录制《家国情·赤子心——讲述阳江归侨的故事》专题片，将镜头聚焦于这个与祖国共奋进、与人民同奋斗的特殊群体，讲述他们的家国情怀，展现侨乡的幸福生活，传递家乡声音，讲好中国故事。是年 7 月 20 日，专题片开机仪式在岗美华侨农场举行。录制中，归侨代表不约而同地唱响的一曲《祖国啊！母亲》，扣动着现场每个人的心弦。“祖国啊！我们亲爱的母亲，时刻在想念着我们，日夜在关心着我们。祖国啊！你不愿我们再流浪，千里迢迢特派船轮，迎接我们回家乡……”朴实的歌词，简单的旋律，缱绻着归侨对祖国的深情，一字一句淌进阳江市侨联主席邝东晓的心中，荡起涟漪。他觉得这首极富感染力的归侨之歌可以用于今后的侨界活动中，便向现场演唱的归侨打听这首歌曲的创作者。结果大家一问三不知，甚至连这首歌的词曲都没有，只知道这首歌在归侨中广为传唱。几经打听，邝东晓才得知这首歌曲的歌名，也在归侨的反复传唱中记录下了词谱。后来，终于有印尼归侨忆起：“20 世纪 60 年代印尼排华，祖国派船到印尼接侨。归国途中的轮船上，华侨都跟着唱这首歌。”抓住一线索，邝东晓动了寻找这首归侨之歌创作者的念头，想探究这首歌曲背后的故事。

于是，便有了这趟寻找之旅。

线索

寻找的号角从山海之城的阳江吹响。

2022 年 11 月，传唱归侨之歌《祖国啊！母亲》暨寻找原创作者活动在阳江启动。消息很快在全国各省市侨联的圈子里传播开来，奔向五湖四海。“侨界的‘朋友圈’是万能的。”邝东晓说，他们很快就收到了来自海内外的各种报料。阳江市侨联在众多的报料里，抽丝剥茧，发现不少线索指向印尼的一所华文学校——雅加达振强学校。

雅加达振强学校创建于 20 世纪 50 年代，是在二战结束后，印尼华校得以复办，华人渴求华文教育，求学人数激增，华文教育迅速发展的情况下创立的华校之一。现居于香港的近 90 岁高龄的张茂荣是振强学校创建之初的职员。据他回忆，振强学校的前身是印尼洪义顺公会创办的自强学校。20 世纪 50 年代初，受国际形势影响，印尼华人社会分裂为两派，一派拥护新中国，一派亲台湾的国民党。1951 年，洪义顺公馆亲台湾一派占领了“自强”，另一派师生被迫离开，开始游击战

式教学。后得当时华人办的 Yang Seng Ie 董事会的支持，将该院在 Taman Sari 的分院让出改建成学校，振强学校便从此安定下来了。振强学校取“振作图强”之意，委任廖建为校长，黄清林为教导主任，徐育梅为校董会主席。为满足印尼日占时期失学青年的需求，振强学校开设了夜校，教授英文、会计、裁缝、摄影、汽车修理等课程。振强学校办夜校的消息，曾在当地轰动一时。张茂荣曾在一篇回忆文章里是这样描述的：“振强夜校成立于 1952 年，学校设备虽然简陋，但学生人数非常之多，是雅城（雅加达）规模最大的华人办的夜校。我印象最深的是，每当夜幕笼罩着大地，振强夜校如同万家灯火，十几个教室的灯一齐放光，上课钟一响时，学生们一个个涌进教室，接着老师们也走进各自的教室，开始讲课。振强夜校办得生气勃勃，有声有色，这是我身为振强夜校的教师感到最欣慰的一件事。”几个月后，顺应求学者的需求，振强学校办起了初中班，成为振强中小学校，之后短短几年就发展成为当地有名望的华校，而学校也凝聚了一批优秀的老师。音乐老师张锦江便是其中一位。

张茂荣的弟弟张欣荣，是印尼雅加达振强学校香港校友会副会长。2023 年 3 月，他从江苏省泰州市侨联原主席陈文武那里得知阳江市侨联正在寻找归侨之歌创作者。陈文武在回国前曾在振强学校读中小学，与张欣荣是同班同学。张欣荣点开《祖国啊！母亲》的歌曲视频，重复回放中，他发现这首歌曲跟他在振强学校读书时，音乐老师张锦江教的《可爱的印度尼西亚》，曲调韵律极为相似。张锦江在当时小有名气，音乐天赋极高，能作词作曲，且精通多样乐器。他创作的《亲爱的老师》《海燕》《可爱的印度尼西亚》等歌曲传唱度非常高，火遍雅加达华校，甚至印尼其他地区的华校。据传，《可爱的印度尼西亚》曾被翻译成印尼文传唱于印尼文学校。结合种种，张欣荣推断《祖国啊！母亲》的创作者可能是他的班主任老师——张锦江。

陈文武把张欣荣的想法反馈给阳江市侨联。得到消息后，邝东晓激动地第一时间致电居住在香港的张欣荣求证。综合张欣荣提供的线索和资料，归侨之歌创作者

上图：张茂荣回忆起与张锦江共事的日子

下图：张锦江曾是张欣荣在振强学校求学时的班主任

的形象与张锦江的吻合度很高。

因此，寻找的目标，便基本锁定了“张锦江”。

探寻

坐标：香港北角屈臣道 8 号海景大厦 B 座 802 室香港北京华侨联会会所。

2023 年 8 月 21 日，在张欣荣的热情张罗下，广东省侨联和阳江市侨联、阳江市电视台组成的“寻找归侨之歌——《祖国啊！母亲》原创作者活动”代表团与居住在香港的振强学校师生见面，举行了一场座谈会，探寻真相。

张欣荣翻开《雅加达振强中小学校五十一周年纪念画册》，里面有一页张锦江的专版，附有张锦江作词作曲的两首歌曲的歌谱和个人照片及简介：张锦江，又名张江，手提琴家，年青时，任振强学校音乐老师，谱写《可爱的印度尼西亚》《海燕》《亲爱的老师》等歌曲，唱遍当时印尼华校。1959 年回中国后，继续从事音乐教育工作。到香港后，进入香港交响乐团，现已退休。听闻振强纪念成立五十一周年，又谱写如《振强，一个骄傲的名字》等歌曲。照片中的张锦江一身深色西装外加领结的穿戴，抱着小提琴端坐着，高挺的鼻梁，一丝不苟的发型，有点严肃。但在张欣荣的印象中，张锦江平易近人、热情开朗。座谈中，振强学校的其他师生证实了这一点，这是后话。

1950 年，张欣荣在振强学校读五年级，张锦江是班主任。“那时候他 30 多岁，几乎全校的音乐都是他教的。”张欣荣说，虽然振强学校的音乐老师不止他一个，但他的水平比较高，会小提琴、钢琴、六弦琴，又会作词作曲，所以在学校里特别受欢迎。至今，张欣荣仍能哼唱出当年学过的张锦江作词作曲的《可爱的印度尼西亚》《海燕》《亲爱的老师》等歌曲。

1960 年，在振强学校读完初中的张欣荣回中国求学。他选择了繁荣的上海，直到考上了上海第一医学院医疗系，他在上海度过了六七年的时光。1968 年，他毕业后到了西安当医生，又待了六年。这期间，他通过校友了解到，张锦江老师一家人也早已回国，在北京华侨大学艺术系教书，“文化大革命”时被下放到云南

音乐家张锦江

“五七干校”。1976 年，张欣荣到香港定居，才知道张锦江老师已在三年前来香港定居，并受聘于香港管弦乐团担任小提琴手。

据张欣荣回忆，张锦江是在 1959 年年底回国的。1959 年 11 月，印尼政府突然颁布“总统 10 号令”，限制华侨在小城市和县城以下经营。当时侨居印尼的华侨有 250 余万，大多数在乡间做小生意。这项法令迫使数十万华侨关闭商铺，被迫离开乡间，失去生计。流离失所的他们或迁往大城市，或寻找回国之路。同年 12 月 21 日，中国驻印尼使馆外交大使向印尼当局发出严正抗议，并着手准备撤侨事宜。1960 年年初，印尼政府又出台了一项令人愤慨的外侨离境的法令。该法令规定，离境外侨每人最多只准带 3 套新衣，鞋子不超过 4 双，所有带走的物品都必须在离境前的半个月内送至指定地点查验，查验合格后才予以放行。印尼排华运动愈演愈烈，中国向自愿回国的海外游子敞开了怀抱，租用了香港、东南亚华侨和苏联的客轮，开展了新中国第一次接侨行动。

张欣荣猜测，《祖国啊！母亲》这首歌是张锦江老师在印尼排华期间创作的，“祖国派船来接侨民，他很感动。听说在接侨回国的船上，很多归侨都是唱着这首歌回国的”。

1948 年出生在印尼雅加达的黄银英，家境殷实，没有受到“总统 10 号令”的直接冲击，但其生活在小城市的舅舅却深受其害。“舅舅一家都投靠到我们家里来，十几个人挤在一个房子里，等着中国派船来接。”黄银英也猜测，这首歌是张锦江老师在这段特殊时期写的，为了感恩“祖国那么好，在那么困难的时候，还是派船来接我们”。

在黄银英、蔡顺爱、余英美、谢玉蓉、伍捷振等振强学校学生的回忆中，有一个共同点：张锦江虽然生活艰苦，但他始终积极乐观，心怀感恩。

来参加座谈会的人里，张茂荣“认识”张锦江的时间应该是最长的。张茂荣读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因家庭困难，下课后要去卖报纸补贴家用。“戴上草帽赤着

居港振强学校师生合唱《祖国啊！母亲》

脚，我就跑去《生活报》报馆等报纸。”就是在这个时候，张茂荣听说《生活报》来了个音乐青年，是个穷孩子，在排字间工作。后来，张茂荣进入振强学校做事务员，才得以与这个音乐天才见面，原来就是张锦江。“学校的文艺活动，他都参与，如组织合唱比赛、独唱比赛等。”张茂荣印象最深的是张锦江创作的《海燕》，“因为这首歌朗朗上口，很快就在当地华校传唱开来，并在一两年后传遍了整个雅加达，传到万隆、泗水”。

据张茂荣回忆，张锦江出生在印尼的一个弹丸小岛勿里洞，那里盛产锡矿。18 世纪末至 19 世纪初，广东沿海一带（梅县、兴宁、五华、河源、陆丰、揭阳、河婆等地）的乡民，多以客家人为主，以“卖猪仔”的名义来到这里为契约矿工。他猜测，张锦江的父母就是被“卖猪仔”到这儿的，家境贫寒，所以张锦江在振强学校当老师时也只能带着一家四口租住在学校附近河流对面的茅屋村落。“那里经常火烧，因为竹子很多。有一次，我在学校看见那里浓烟滚滚。”张茂荣担心张锦江出事，叫了几个身强力壮的学生，骑着

1	2
3	4

1. 钟维恩在家人的陪同下坐着轮椅为同事张锦江而来
2. 蔡顺爱说她坐船回国途中，在船上听到有人唱《祖国啊！母亲》
3. 张锦江的学生黄银英想起张老师教音乐的时光总是快乐的
4. 阳江市侨联主席邝东晓向张锦江儿子张云赠送纪念品

自行车赶过去。幸运的是，张锦江和他的家人都安然无恙。

“1957 年我离开振强学校回中国，那时候张老师还在振强教书。”在张茂荣的回忆中，张锦江是 1960 年回国的，“当时中国派船来接归侨，张老师最开始是工作人员，先送外地的难民回国，雅加达的人最后走。后来张老师也回国了，因为那时候华校被封，他没有学历，印尼文又不好，在印尼很难生存”。

许是勿里洞大部分是客家侨民，在振强学校师生的回忆中，张老师会讲客家话，他们也就理所应当地认为张老师祖籍梅县。后来张锦江儿子张云证实，其父亲祖籍潮州揭阳，1928 年出生于印尼。

“我跟张老师生活过一段时间，感到荣幸和自豪。”近 90 岁高龄的张维恩是振强学校的老师，也曾与张锦江共事。他说，从张老师创作的《可爱的印度尼西亚》和《祖国啊！母亲》等歌曲中，可以反映出张老师对出生地的热爱，对祖国的热爱。

在蔡顺爱的回忆中，她记得她刚好跟张锦江老师是同一班船回国的。1960 年，17 岁的蔡顺爱和好友搭船回国。在航行中，因为身体不舒服，蔡顺爱没有上甲板，但她依稀听到甲板上大家唱起了《祖国啊！母亲》。

关于张锦江准确的回国时间，振强学校师生回忆得不统一，目前也还没有史料证明。他的儿子张云是在北京出生的，对父亲侨居印尼时的情况也大多是从振强学校师生口中得知。在他的印象中，父亲是

张锦江夫妇与孩子

一个勤劳向上的严师，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是一个守训爱家的男人。“父亲曾经历经磨难，但他对未来生活的炽热没有消减，一直意志坚强地面对生活。”父亲的乐观和坚强深刻地影响着他。

座谈会在振强学校师生唱响《祖国啊！母亲》的歌声中结束。

这次寻访，虽然还没找到张锦江是《祖国啊！母亲》这首歌的原创作者的直接证据，但从受访者的回忆中侧面证明了一个事实：《祖国啊！母亲》确实是一首很有代表性的归侨之歌，体现归侨对祖国的一往情深。可惜的是，张锦江已于 2009 年 6 月 26 日在香港去世，我们无法向其求证，振强学校师生关于他的回忆。因此，《祖国啊！母亲》这首归侨之歌的原创者究竟是不是张锦江，目前尚无法定论。

邝晓东说，今后寻找活动将会继续，是为了更靠近真相，更是为了颂扬归侨的家园情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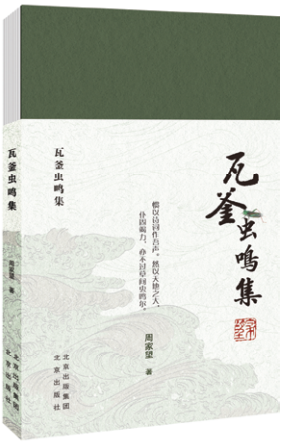
美真兼得“煮清香”

文 / 彭俐（北京日报社高级记者）

周家望的旧体诗，20 多年来，我时常读到。他饶有兴味地写，我饶有兴趣地读。我们既是一个单位的同事，更是彼此欣赏的诗友，“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诗中情，略相似。13 年前，他的第一部诗集《茶月诗情》出版，喜读之余，我便在《北京晨报》的副刊上，以《茶香月明家望诗》为题，向爱诗的朋友们推介了这位颇有才气的行吟诗人。2022 年中秋之际，家家欢乐，尽望明月，天地一片澄明，心中了无纤尘，蓝夜无边，友情深湛。当此花好月圆之夕，喜读他即将付梓的第二部诗集《瓦釜虫鸣集》，与 2010 年出版的第一部《茶月诗情》相比，诗意愈浓。

周家望是个“出头儿老”——他自幼习旧体诗，忘情格律，痴迷平仄，苦吟不辍，小有名气，大有所成。他曾对我说，首都师范大学的王世征教授、澳门大学的程祥徽教授、中国作协的陈建功先生，是他学诗路上的“三盏明灯”。在名师照灼之下，周家望的诗路温暖而明亮，得以在正途上不断地追寻正果。

诗人需要一个“有趣的灵魂”，要有情、有思、有爱、有想、有欲、有念、有喜、有怒、有悲、有惊、有哭、有笑……写诗，不是板起脸来说教，不是堆起笑来献媚，不是无病呻吟，不是东施效颦，不是舍其本逐其末，不是逞其能炫其技，不是寻章摘句老雕虫，不是诘屈聱牙嚼蜡头。诗，失其真、舍其美，不如不写。周家望的诗，美真兼得。在他的诗中，巧思妙趣时时闪现：“红云一捧秋山艳，紫气三分曙色明”，紫砂壶之美跃然！“泉淙琴次第，石暖鸟徘徊”，似入唐诗之境。“人生安好处，万里亦家山”，可谓旷达之情直抒胸臆。“蜀中多少农家子，庆幸秋风五丈塬”，是对正统史观的反弹琵琶吗？“古心常向清宵寄，枕上欣逢孟浩然”，神接古人的妙语，读之能不会心一笑？



周家望著作《瓦釜虫鸣集》于 2023 年 8 月出版

读唐诗有味，读家望诗有唐诗味，其味高古；读宋词有趣，读家望词有宋词趣，其趣翻新。

在此试举一例：千年虎丘塔（建于北宋建隆二年，即公元 961 年），何其有

幸，它自建成以来题诗代有才士，而此中脱颖者应有周家望。其诗《咏虎丘塔》（五言排律）超拔之气沛然，使人引颈翘首而感慨咨嗟——

吴郡云岩塔，千年东北倾。深林形在望，绝顶势峥嵘。景自三层阔，风从八面生。重檐接碧落，莲座掩黄英。云起身归隐，月来影纵横。桥青石着色，钟远夜添声。古寺尘缘近，禅堂世事明。山南灯火处，万点映长庚。

一首气势雄浑的五言排律，与千年虎丘塔相得益彰。此诗联律工稳，起承转合，铺排开去，与虎丘上的七级浮屠形成动与静、虚与实的对比美感。诗如塔立，塔如诗排，其灵动的韵律之美，景深的宏阔之美，在读者的脑际飞升："景自三层阔，风从八面生"；"云起身归隐，月来影纵横"，千年岿然不动的古塔，竟是如此变幻多姿，何其妙哉！自古排律之作多流于堆砌死板，鲜有名篇，能在法度森严的形式美上，自如地表达诗人思想感情，仿佛戴着镣铐舞蹈而自得其乐，已属不易，而"古寺尘缘近，禅堂世事明"一联，分明对云岩寺的烟火气语带机锋，尤为难得。

品鉴、衡量一篇当代人创作的旧体诗歌的优劣，有一个简单易行且屡试不爽的方法，那就是看你在朗声诵读一遍之后，是否不觉得牙齿磕绊、舌头打卷，也不感到意念模糊、隔膜一片，是否还有兴致想要再读一遍？再读，再读，再读，三五遍、七八遍地吟唱之后，舒畅的心情不减反增，犹如白鹳引吭、金蜂啜蜜一般，美滋滋地感受到一种高雅音乐的往复循环，如同一部交响乐程式化所提供的起承转合，音符串联的曲调起伏跌宕于耳畔，意象编织的彩绘错落缤纷于目前，而那种心灵陶醉的感觉久久盘桓缭绕，且挥之不去，如同用了酽茗醇酒，飘飘然与神明相遇，分明向东海三山而去，又像奔西天昆仑瑶池而来……此时此刻，谁能分得清人间仙界的分野？谁能知道尘世天堂的挡板？只是觉得"抑志而弥节兮，神高驰之邈邈"，似无古无今，而又无远弗届……读周家望的诗，读到会心处，或"欲辨已忘言"。

再看周家望的词作，至少豪放时有"苏辛"之口吻；婉约时见"柳秦"之风致，若说到了足以乱真的地步，或许言过其实，但其词味之隽永，却可思接先贤。下面这首《行香子·夜宿扬州》，让我喜欢得坐不住，乃至手舞足蹈——

水月如灯，来照烟塘。青丝柳，拂拭山房。寒蛩浅唱，回绕堤廊。向五亭桥，大明寺，小凫庄。

重游故地，楼台依旧；绿杨春，一样清香。倏然六载，鬓染微霜。念韶华浅，人易老，转苍凉。

古人咏月的诗篇，远远多于描写太阳和星星，这是一种十分有趣的文学现象。而且写月亮的大家、高手实在太多，让今人不好下笔，或无处下笔。李白有"白玉盘"的想象，李贺有"月似钩"的描摹，白居易有"月似弓"的刻画，李商隐有"月光寒"的感知，杜牧有"好烟月"的咏叹，米芾有"向西轮"的书写，如今，

家望以“水月灯”咏之，岂不善哉！喜欢细品这首词中的三种味道，既是茶味，也是禅味，更是诗味——“温润”“醇厚”“清爽”。同时，也向往词中所蕴含的一种生命气质和精神境界——“安静”“纯净”“虔敬”。这也正是周家望平时为人处世的常态，或者说是情怀。他是那种能够把诗歌的意境带入生命和生活中的诗人，是真诗人，是内外一致而又通透的难得的诗人。还是前边的那句话，周家望的诗，美真兼得。

周家望所创作的诗歌，体裁和题材一样“热闹有趣”。这部诗集，精选了他 12 年的创作篇什，其中既有唐式格律诗、宋式长短句，也有汉代乐府风格的古风、歌行，乃至元散曲、明昆曲样式的杂糅。看得出，这位仁兄有意识地力求推陈出新，不拘一格，力争做到土洋结合，古为今用，从而雅俗共赏又耳目一新。例如《雅典行并序》《甲午教师节偶得》《篁岭行》《戏题二月初一雪》《梅梦西溪》《梦中思》等，或国内观览，或世界旅行，或节日感怀，或季候吟唱，或民胞物与，或同调唱和……大千世界，皆为诗苑；百代岁月，可作词坛。我们不妨择其一首颇有特色的古风《扫地婆》，来略作评析，一听诗的标题，就令人莞尔——

花非叶落动诗心，街头吟哦街尾寻。街角转出扫地婆，手把扫帚步轻挪。橙色工装宽且大，高挽袖面三寸多。额头汗湿贴鬓发，鬓发苍苍背微驼……亡夫走后空寂寂，作息出入惟一人。村居翁媪沐良政，一月百元养老金。算来三元一日度，何期肉蛋可沾唇。纵有小恙不问医，姜汤热水自己愈。人虽古稀不觉老，腰板能直臂能举。忽然村中招工友，纷纷城里扫街去。月薪三千上三险，包吃包住无多虑。虚报年龄五十九，愿随同乡即日走……

至于这位可敬的、古稀之年仍愿自食其力的扫地婆后事如何，周家望自会一一告知。我想说的是，这是 21 世纪现代版的白居易《新乐府》吗？白香山笔下的翁妪多是悲剧形象，而周家望叙写的“扫地婆”，或许是一个更为复杂的悲喜参半的文学人物。此中一脉相承的，是关注底层百姓、关切民生的诗家情怀。记得周家望书房里曾撰写过一副对联：“窗外王维景，心头杜甫诗”，表达了诗者即使生活在恬淡闲适之中，也仍心怀黎庶、心忧民艰的士人心境。

最后，我想说的是：写一首新诗，识字三天可也；写一首形神兼备的旧体诗，读书三十年或许不够。

这是因为旧体诗不仅仅是古体韵文，它还是数千年中华古典文化、历史沿革、学术传统、天文地理、典章制度、思想信仰、民间风俗的凝结与浓缩。不具备广博渊深的学问功底，包括文学、史学、哲学“三位一体”的丰厚知识，就连读懂古人诗作——《诗经》《楚辞》，乃至汉赋、唐诗、宋词、元曲等都显得吃力，更不要说严格遵照古典诗歌的格律来创作。

古典诗词是中华民族的文字古董，仿佛琳琅满目的精金美玉，我们要不断地在内心里擦拭它们，感悟它们。

旅美作家冰凌小说《同屋男女》论述

文 / 顾偕（广州市作家协会原副主席）

冰凌，本名姜卫民，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毕业。曾任《法制瞭望》杂志编辑部主任。1994 年旅居美国，现任全美中国作家联谊会会长。

2023 年春节期间翻看了几篇冰凌谓之“幽默小说”的作品。最早知道这位先生大名，应在 20 年前。当时他在美国为中华文化的传播，倾力国际交流的桥梁工作。没料“民间大使”是位有着多部精彩著作不凡行世的人性探寻高手。

露西最初实质就是位颇具经济头脑的二房东。故事开场是有位叫赵重光的中国访问学者，因急于找房租住，竟而误入了一位“让人着迷而又让人敬而远之的女人”空间。怎想最初矜持不过也是一时装扮，不待多日这位东方人，似乎瞬间魔性般地就成了“已经迈进了中年”且“保养得好”“有着完美身材”的露西的激情对象。相互爱人天各一方，继而随着眼前本能的呼应，各自认同感的激活，终于这堆东西方的干柴烈火就烧成了一部情感史诗。无法免俗的“同屋男女”，自是多番心灵和身体的交流后，便再无伪装一次次共赴了人生欢愉的巅峰。

小说轻巧题旨隐含和折射的，其实仍是一个较为严肃的有关爱的永恒命题。欲望并非都是地狱的入口，中西之间纵然有不少差异的思想认识，未必就不能让一些人性的颂歌，在个别隐涉之处，多有类似自然主义情势诗意的激荡。不同肤色从来就不会妨碍和影响爱的坚执以及快乐的需要。即或进入到一种爱的原始方式，甚至彻底做到本质的自然袒露，想来人类就算有种极度的抵达，最后还是要唤起生命对所发之事有理智认知的，而绝不会精神昏然地就此停留在仅有满足什么的沉迷中。当有一日赵重光的妻儿来美探亲，就会让这位访问学者面临明亮的崩溃。当然这个世界谁都不会是肉体的道德家，人类也无纯粹的道德角色，可以完全拒绝欲望移位或是送上门的生理美餐。但文学内容在精神层面竭力要做到的，不是一直有的丰富

故事的展示，重要和关键的恐怕依旧还需要有更多事物元素发展内涵揭示的提醒，并使情节结构之类除了好看的微妙描述外，通过整体初衷的预设，更当有作品意义及价值观可能的提升。哪怕在此屋檐下“中美关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赵重光感到这样发展下去，将会出现问题”。

那么这篇小说究竟想讲的，仅仅真的就只是“同屋男女”简单的男欢女爱吗？抑或如《金瓶梅》里的“赤裸特工”那般，俩人整日沉缅于床帷，只会以感官幸福演绎人生高超的秘戏之趣？我们毫不怀疑盲目相爱也是需要热情的，何况不少爱往往还是死中复生。在长期封闭或隔绝期间寻求一种突破，两性相悦至少也不失为信任的起点。露西和赵重光都是有家室的，生命的快乐前行，可能永远是谁都较难按捺得住的意外延伸。问题是不慎滑入这样的“爱池”，人性是否就此便会失衡？纵然性爱总在强调着人性中另一种永恒的伟大，但男女肉体纠缠欢快之余，是否同样也会引发一些其他的结局遐想和更深的思索？露西和赵重光都算是知识分子了，虽有东西方思维模式的迥异，但自由意志在这类人身上，不管社会伦理怎样，他们短期在一个屋檐下“任凭风吹雨打”，想来也忘了陶醉的阴影，彼此开始“各敬一杯”将各自“送上天堂”。也许这是高妙沉迷的一种浪漫体现，但这方面的余韵回荡，却又同样并非儿戏更是要让人敬畏的。鱼水之欢久之，赵重光最终隐约不安地说出了“这是一种危险的游戏”，仿佛由衷意识到了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尴尬，就此也使这篇所谓的“幽默小说”有了问题嘲讪的理解和情节滑稽化的深刻意味。

人世间真正的至爱归来，可能也是种虚化的繁复隐喻。但只要不是本质阴暗的期待，任何怀抱希望的取得，应该都算是感性的胜利。《同屋男女》体现和宣示的，除了异性之间相互身体快乐的照耀，除了东西方本能融合，疯狂变幻中共同摈弃的人性做作，许多必须聆听的人性真切的一面，诸如“亲爱的，难道你还有力量吗？”“你正在进入一个粉色的梦乡。”一边是柔声相问，一边是轩昂作答，虽然这般美景不能持久，倒也有了人类逾越禁忌和更多精神层面的反思。当人生憾事的自然效果总是戛然而止，面对有时唯有于艺术上可以接受的命运，哪怕许多属于隐隐的作痛，恐怕这类无限的诱惑，依然可以堪称自然真理的典范。因为小说的一切细节自由，原则上只要不是意识落后或原始的，一直是挚诚的对美好不懈追求和忠实的理解，它就允许作者较好地来传达一些天下新的审美感受，让命运重新富有心灵，以描写的神妙，使生活原先似乎不可更改的难堪笨拙局面，在艺术上再度整体完美的展开。比如两具身体相依在床上或是浴缸，并非一味均是低俗化的同样可以洋溢起人类的某些内在美德。毕竟至大欢喜之类也是命运的安排，相宜是善良的尊严，高贵人格也不可能因为节制欲望，而更能衬映出生命的崇高或卓绝。人都有七情六欲，人类的深情一直也是个问题，不妨就由文学来研究和演绎。

《同屋男女》让我产生浓厚兴趣的，不是围绕着展开爱的一些琐碎情节纯然的铺排，尽管许多细节较为生动地脱离了惯常的

模仿图式，在翻云覆雨方面可能还不乏作者自己了然于心的体会。但作者最欲阐释的，应当远不止激情怀慕的这些。我仿佛不时看到了人性共处世界屋檐下，生命愉悦融合后总有的一些伤感，深情除了快乐，甚至更多时候依旧是沉重和严肃的。也许这便是任何的原初之人，天性永远无法泯灭的墨守成规。例如稍有逾越或不忠，像是时空就此也会紧张起来。而西方在许多领域的宽容与坦荡，就不会如我这般不少根本就是属于虚伪的坚执。所以这篇小说摆脱常识化审美，向读者沉稳基本展示的，不是一场美丽都会招致虚空的击打，爱剩下的也不是什么仅有在幻想与经历中的徘徊。矛盾于通俗层面已化为了理性的赋予，它照亮了作品的一些归结性问题，活脱脱还使绝非人生中心的性爱之类，竟然仍像高昂的生命情调，偶尔在沉闷的岁月，也要多彩地偷偷盘旋。

历经无数历史沧桑风雨和爱恨情仇，生命在时间的诱惑下，还将留心防备什么抑或继续热衷于什么，强劲的情感宣泄看似与社会无关，实质都是人性共处世界屋檐下，幸存的部分渺小的精神蓝图。于未来看，什么都情有可原。真实是事物彻底的精粹，人类无论是为性煎熬还是为爱在真正煎熬，符合真实，就有许多可爱且宝贵的一面。反之冷漠或贪婪的拥有，即使是以理想形式出现，最终能够印证的，或许仍然是黑暗原则的变形上位。人类同属这片苍老的屋檐，人性真不愿意总是看到无法解脱的这些。而爱的目的，想来终究是为了美好。作品还预设了不少有着中华标识的饮食文化方面的神秘和热闹的气氛，从心理学目的论来讲，主要也是为了烘托爱怎样出场，最终形成如何一种精神或是身体等情怀方面不自觉的吸引，在此就不另作深入品味了。

生存世相因为诸多无奈，唯有幽默或可自慰。冰凌小说大致读来，原则的来看说不上完全专属自我标签的那种。如果其作品真有什么幽默，我倒认为那应是一些经验的反讽，以及内容观点解构后的某些乐趣。更深的体现，则不外乎是内涵诸如性爱错位的尴尬，相互接近身体焦点时生命欲望的重复。故事越过了理性，不是都有的放怀大笑，而是缤纷空间，为什么又会是不该有的闹剧或悲催的喜剧发生。当然这也包括你对幽默实质怎么认识及对类似现象的如何理解。就像《男女同屋》，绝非一场简单的欲望告白，滋味百种或许呈现的内景，真有不少足可挖掘的幽默奥秘。文学以形象支配人生，许多来自生活的问题，毕竟都难真正具有人文浪漫的光彩，因此幽默可能也是种夸张与无奈的修辞。冰凌以其性情悠然的判断，意味深长地对人性总做一些乐观的揭示，并以“幽默”大观作以丰富的呈现，他较有极致的几笔看似松散的勾勒，至少在这篇《同屋男女》里，简洁的视角和深厚朴实的风格，足以能让我们领略到他颇高的叙述力量的。同样也会使许多读者不难看出，作家在写实运用方面一直还在精进着的技艺锤炼水平。

最后，任何小说的形象展示，都不可能像评论说得那么透彻，如前所述也不允许形象故事越过理性，让感性美学丧失胜利的可能。人性有机会共处一个世界屋檐下，我们不指望太多这等奇妙快事往复更新，权当一种多元文化贯通于身心的共振吧！

异乡人

文 / 郑植楠

合上相册，我决定出发去寻找一点陈迹。

说起澳门，是一个熟悉的地方。熟悉在家里的相册里，在父亲早年的信笺里、日常的闲谈里。

20 世纪 80 年代末，乡里挑选“年轻才俊”到澳门熨衣服，凭借娴熟的技术，父亲被选上，由此，他作为异乡人第一次踏上了这个陌生而未知的城市。几年下来，赚取人生第一笔小财富后，父亲回家娶了母亲并建了在当时为数不多的两层现代风格的房子。在那个家家户户集聚老厝的年代里，父亲的归来犹如“番客”。

于沿海城市而言，妈祖便是守护神。大抵沿海城市和港口都设有妈祖阁，澳门也不例外。记得奶奶跟我说，父亲去澳门那几年，每年三月份妈祖诞，她都会多买一些贡品祭拜。老人家的心思很朴素，就是希望独子平平安安。对她来说，澳门和潮汕的妈祖是一脉相承的，同样的亲昵。

小时候我经常坐在父亲的大腿上听他讲解在澳门拍的一张张照片——宿舍、工厂、澳门街景等等。透过照片，我对那个未曾谋面的城市又多了几分向往。父亲说，80 年代澳门的居住条件相当好，已经有彩电、冰箱、空调。我们家乡煮饭还在烧煤，更别提其他电器。那时候我总是问：“那你为什么要回来吖？”

2023 年五一后，怀着闲散的心态，我们一行 5 人前往澳门旅游。虽然之前来过两次，但都是走马观花，这次冥冥之中似乎被一股魔力牵引，带着些许的期待。

威尼斯人是我们的第一站。由于一行中有未成年，我们直接略过了赌场，径直上了二楼。高速发展的电商冲击了线下商店，澳门免税产品渐渐也黯然失色。同行亲人说，以前来澳门，不买几件奢侈品总觉得白来。

父亲说过，澳门最出名的当属犄角旮旯的地摊美食。他说当年住的宿舍对面就是一个美食广场，他每晚都会去那里闲逛一会，总得吃点什么再回去。循着隔空记忆的路线，我们一踏入美食广场，便看到满满当当的人排起了长队。特色牛杂、葡挞、猪扒包、港式奶茶……整个广场笼罩在一片喧闹声中。紧密矮小的店铺一间挨着一间，每一间排起的人流都拐到巷子里。猪扒包，外皮酥脆，内里肥而不腻。印象最深刻是港式奶茶，

浓郁而带点茶涩的口感，一口滑入喉底，饱满的茶香溢到鼻腔。

烈日照射下的人群变得朦胧，汗水噙到眼睫毛里，在打转，恍惚间我愣愣地站住了，仿佛和30多年前的父亲相遇了——那个年轻人，眼里有光，牙口也好，没有老花眼，一头浓密的黑发。他穿着格仔衫坐在街边的铁椅上，手里拿着竹签，牛杂一戳，吃一块。

沿着老城区的小巷，望着一爿爿小小的店面和老旧的楼房，我猜它们的年龄肯定比我大。逼仄的楼距、矮窄的楼梯、昏暗的楼道，我想象着一家人早出晚归，不知道土生土长的澳门人对生活有何种感慨，是充实呢，还是疑惑，抑或是迷失。城市与人之间是否会有新的构建，我想试着在这里寻找父亲生活过的蛛丝马迹。

去年我和大姐带着父亲重新回到阔别30年的旧地。我们带着父亲在小巷里来回穿梭，父亲嘟囔："找不到了，找不到了。不一样了，不一样了"。父亲说，现在变化好大，以前这里没有那么多旅游商业，最多是轻工业作坊。清静的石阶台上，父亲坐在上面歇脚，点起了一根烟。烟袅袅地从他指尖逸出来，原本复杂的情绪，仿佛一下缓解了。将烟头捻灭后，父亲指着前方的位置说："当年的羊毛厂应该是在这里，不大，但生意很好，里里外外都堆满了货。"

途经一个清朝老旧祠堂，出于好奇，我进去参观。屋主叫卢九。内堂分两阁，与潮汕的四马拖车格局类似，不同的是楼中有楼，二楼的内衬木雕凸显，整座祠堂显得古色古香。我查了一下资料：卢九，原名卢华绍，广东新会人，清末澳门富商。1890年。葡萄牙国王授予他骑士勋章，1894年，卢九获授Vila Viçosa勋章。1907年，卢九经营的宏丰公司业务萎缩，负债累累，他在家中上吊身故。多年后，其子卢廉若子承父业，笃志好学，其成就远远超过其父。父与子在衔接的时候，某种意义上代表着荣誉使命的继承，在那个年代的异乡人落地生根是否具有跨时代意义，我不得而知。现在这户曾经在澳门富甲一方的卢氏是否还有当地人记得，我没有继续寻求答案。

回口岸的路上，我们叫了一辆出租车，师傅是本地澳门人。师傅说："他是1964年生的，广东江门人，12岁那年偷渡来澳门闯荡。刚开始一个月只有200块钱工资，住在天桥下，90年代初，他终于有了澳门户口，从此生活得到改善，并陆续生下5个女孩。"孩子是他的骄傲，全部上了大学，一个在澳门当律师，一个在澳门当医生，其他三个都在美国。师傅用不标准的普通话说着他的骄傲。我笑着说："我爸比你大一岁，当年也是在澳门去留的问题上抉择过，最后选择了回家。"师傅摇着头说："那可惜了。"

我父亲是个传统的人，重男轻女。可能源于家族的三代单传，我的出生对于他来说尤为重要。自我懂事起，相比于大姐，他会满足我更多的愿望，大到学校的选择，小到生日礼物。他更喜欢守着一份安逸，总是跟我们强调做任何事都要"稳"。他觉得澳门的经历是他这辈子的

高光时刻，但是，我始终觉得他与澳门格格不入，3 年的打工生涯其实只是层面上简单的生活意义，并没有对他的思维重新建构，他还是那个他，那个从小村庄出来的异乡人。

前现代社会主要以农耕作为一个家庭的支脉，社会变化缓慢、四季更替，所有的经验都是可以传承的，这就意味着上一代留下的经验是足够的，不需要也不允许你去拓展。也许奶奶和父亲都不愿做不肖子孙，所以，面对奶奶的坚持，父亲最终还是选择了回乡。我问过父亲：“你为什么当时不留在澳门？”他说：“留在澳门哪来的你们，何况你奶奶只生了我一个独子，她不同意。”

小时候我们经常拿两本厚厚的书去当枕头，那是父亲从澳门带回来的，一本是看风水的，一本是算命的。没想到这两本书在父亲退休后悄然地改变了他的兴趣爱好。他一有空就坐下来研习，拿个本子写写，有时甚至废寝忘食。几年下来他自己也记了几本小册子。有一天晚上吃饭的时候，父亲突然拍了一下大腿，似顿悟地道：“我命里缺铁，年轻的时候应该从事跟铁有关的行业。”母亲白了一眼：“你应该去收破铜烂铁。”去年澳门回归 23 年庆典，看着电视里国旗和澳门区旗冉冉升起，父亲自言自语：“命里有时终须有。”我想，或许在那一刻，他释然了。

作为一个异乡人进入一个新的城市，或许这是一种命运的预言。有的留下来，落地生根，融入了新城市，构建了与城市新的关系；有的匆匆一过，渐渐地向生活做了妥协，留下的只是相册和回忆的文字。与这个城市而言，留下也好，离开也好，它都会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去诠释与人的关系，或亲密的，或陌生的，或恐惧的，都需要我们去适应城市。一代又一代，最后开花结果。